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九十六本，第二分
出版日期：民國一一四年六月

殷墟末期直棱紋與鳳鳥紋有關的青銅器——從「分器」角度的考察

黃銘崇[*]

本文是基於筆者前文論證西周前期的青銅器有「分器」現象而進行的後續研究。反過來從關中地區西周早期墓葬中出土的一些青銅器來推測殷墟末期的青銅器。

首先筆者關注三個目前已知的「禁」組，並且針對「出戟禁組」進行了綜合研究與復原。接著研究禁組上的直棱紋鳳鳥紋卣，以及帶有直棱紋與鳳鳥紋的幾種器類，包括：直棱紋鳳鳥紋觶、四耳乳釘紋簋、直棱紋附耳鼎、直棱紋鳥紋尊與卣、直棱紋簠、棘羽鳳鳥紋器等，論證這些器形中的多數都是殷墟末期的器物，而且直棱紋與鳳鳥紋的運用是殷墟末期強化青銅器紀念性的一個方法。

如何證明這些器中多數是殷墟末期器物？總結地說，本文討論的青銅器：一、同一器類中有傳世品也有出土品，出土品中很多出自不同類型的分器墓；二、銘文都是商貴族的名號元素，如族徽、親稱，特別是使用日干；三、器類最早在殷墟III或 IV 期出現；四、曾在安陽孝民屯青銅器作坊發現模或範；五、科學檢驗部分關鍵器的芯土，發現芯土的各種化學成分分析圖落在「安陽區塊」，說明是安陽製造；六、此種裝飾炫麗的器類或紋飾突然停止不再演化，顯示受到政治動亂或政策改變的影響。以上現象都說明一件事情，這些器物雖然有部分出土於西周初期的墓葬，但是它們其實是殷墟末期在安陽大邑商作坊製作，因為「分器」才被分別帶到關中。由於本文討論的具有直棱紋與鳳鳥紋的器類，多半屬於「炫麗風格」，但還有更多被帶到關中的殷末青銅器屬於「保守風格」，筆者判斷，以直棱紋加鳳鳥紋，搭配其他紋飾與器形元素，如出戟、加附耳、大耳等是殷墟末期青銅器創造紀念性（monumentality）的配方。

最後從棘羽鳳鳥紋方彝切入，發現方彝除了與大、小卣構成禁組之外，也與觥、尊形成另一種組合，另外尊與大、小卣的組合也起源自商代，延續到西周早期。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商代晚期在禮制上逐漸脫離動態飲酒禮儀，進入靜態祭祀與擺設，這是殷墟末期青銅器組合的重要發展。

關鍵詞：分器　禁組　直棱紋　鳳鳥紋　殷墟末期

---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導論

筆者在研究所讀書的時代有機會近距離地觀察哈佛大學賽克樂博物館（Sackler Museum, Harvard University）的〈出戟直棱紋方彝〉（圖 3，禁上左邊的方彝），以及分別典藏於波士頓美術館（Museum of Fine Art, Boston）和美國華盛頓特區弗利爾藝廊（Freer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現稱：國家亞洲藝術博物館）的兩件〈四出戟鳳鳥紋卣〉（圖 3，禁上中及右的大、小卣），三件都有罕見的「出戟」，由器身凸起，引人注目。當時西方學術界對於這三件銅器的年代與風格認定為西周早期的「炫麗風格」（flamboyant style）青銅器。[1] 西周早期銅器的特徵包括方座器、渦尾饕餮紋、大出戟等都是其典型。此一「風格」之命名，應當是受到在中國封閉幾十年以後，首次在西方世界舉辦的大規模青銅器展覽圖錄——*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中 Robert W. Bagley 對於西周早期銅器之描述，所謂「炫麗」（flamboyance）是在既有的商式的外形之上，特別突出的把手、三維的動物型鈕，誇張的扉棱、出戟，以及近於三維的紋飾等。Bagley 所列舉炫麗風格之例主要是當時參展銅器，包括陝西出土的〈何尊〉（06014），[2] 其饕餮紋凸起近於浮雕，扉棱高起而誇張；出土於陝西扶風周原遺址莊白窖藏的〈旂觥〉（09303），扉棱浮誇，把手裝飾華麗；出土於遼寧喀左北洞村二號窖藏的〈蝸尾饕餮紋罍〉，鼎蓋有立體的蟠龍裝飾；出土於北京房山琉璃河的〈伯矩鬲〉（00689），鬲的基本造型之外，此器有蓋，蓋上與鬲身皆有立體的牛角饕餮紋，蓋頂把手亦做成立體牛首；同遺址出土的〈伯作乙公簋〉（03540），在一個有蓋簋的基本造型上，加上特殊的象紋，兩個把手鑄成鳥形，下段則獸首吐出象鼻，兩個把手以及兩個獸首吐象鼻的足，將整個簋往上撐起等。[3] 這些器物，多數確定為西周早期器，相較於當時所知的晚商，即便是與等級最高的殷墟婦好墓出土銅器相比較，也還是相當地炫麗。

---

[1] 筆者第一次接觸到此一名詞是在擔任巫鴻 Early Chinese Art 的助教時，教授在課程上講授的。

[2] 本文銅器名稱之後的括號為「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https://bronze.asdc.sinica.edu.tw/qry_bronze.php）的編碼，編碼五位數者與《殷周金文集成》編碼相同。後來加入者分成兩個系列，較早者編為：NA＋四位數字；較晚者編為：NB＋四位數字。謹此說明，以下不再加註。

[3] Robert W. Bagley, “Vessels of the Early Western Zhou Period,” in *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An Exhibition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 Fong Wen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80), pp. 200-202.

Jessica Rawson 在 *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一書中又將「炫麗風格」作了進一步地闡釋。她以有銘文確定為西周早期的器物為起點（清單見於該書〈附錄二〉），指出這些器物的共同特點；比方大而帶有彎勾的扉棱、新奇的動物類型包括自然界可見的以及商代那種想像式的動物、蝸尾饕餮紋等，不同於商代的饕餮，它們具有可塑性而無法與器物的造型融為一體，或者局部突出於器身之外，或者紋飾呼之欲出猶如欲跳脫器身（例如〈叔德簋〉〔03942〕、〈伯矩簋〉〔03533〕）。她的結論如下：周在克商以前已經有很強的銅器工業，在克商以前已經能夠生產高品質的青銅禮器。她也認為兩個寶雞禁組可能都不是從同一個脈絡出土，[4] 因為有些器物仍屬於「保守」風格（也就是她所認定的「商式」），有些則具有「炫麗」風格。她更用了相當大的篇幅討論區域性銅器鑄造傳統，特別是所謂「南方傳統」對於西周銅器鑄造的影響。[5]

Bagley 與 Rawson 對於西周銅器的認識與討論不是憑空起高樓，而是建立在過去學者研究的業績之上，關於銅器的斷代功勳卓著者如郭沫若、[6] 容庚、[7] 與陳夢家等，而陳夢家的貢獻尤其重要。[8] 陳夢家的《西周銅器斷代》一書主要是以出土青銅器以及有銘文青銅器為主，建立器型與紋飾的「標準」。但是，當時出土西周早期青銅器的數量有限，所以，仍然採取過去以銘文中人物決定標準器的方法。不過他對於西周銅器斷代的研究討論還有許多是隱藏在《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簡稱《美帝》），[9] 這本書原版的印刷品質不佳，松丸道雄改編為《殷周青銅器分類圖錄》，以較好的圖版取代，大幅提升了這部書的可看性。[10] 在該書中松丸道雄對於陳夢家研究殷周青銅器的業績做了仔細分

---

[4] 關於寶雞出土青銅器，見陳昭容主編，《寶雞戴家灣與石鼓山出土商周青銅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5）。

[5] Jessica Rawson, *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Vol II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5-73. 筆者並不同意她的看法，會在以下討論過一些西周早期墓葬與銅器類型之後，再回頭檢討相關問題。

[6]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東京：文求堂書店，1935），頁 28-66。

[7]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劍橋：哈佛燕京學社，1941），頁 28-66。

[8] 關於西周銅器斷代的回顧，亟需一個有系統的研究討論，限於篇幅，筆者不擬在此詳論。

[9]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北京：中華書局，2004）；陳夢家，《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北京：科學出版社，1962）。

[10] 陳夢家編，松丸道雄改編，《殷周青銅器分類圖錄》（東京：汲古書院，1977）。

析，本文不再贅述。[11] 陳夢家在《美帝》中對銅器所進行的斷代，其實是後來所有西周銅器斷代的基礎。他之所以能夠對於很多庋藏於西方博物館的器物進行斷代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掌握了一批黨毓琨在寶雞鬥雞臺盜掘出來大批銅器的資訊（1928），而且他假設從陝西出土的青銅器基本上屬於西周時期。[12]

Bagley 與 Rawson 以陳夢家的斷代為基礎，提出「炫麗風格」在考古美術上是很重要的一步，使得青銅器的研究沒有停留在斷代上，以一個簡單扼要的文字描述此時代青銅器的風格。今天看來，西周早期銅器的「炫麗性」（flamboyance）是無庸置疑地，因為他們所舉的例子中有很多都是確定進入西周紀年以後，在洛陽或關中作坊製作的銅器也夠炫麗。但此種「炫麗性」的來源，以及年代較早的炫麗青銅器並非如 Rawson 所言來自南方地區性的鑄銅傳統；相反地，有很多學術界過去認為是西周早期的銅器，包括有不少炫麗風格的銅器，現在看來根本就是安陽孝民屯等鑄銅作坊鑄造的，而西周王朝接收安陽青銅工業，因此將炫麗風格延續到西周早期。

這樣的說法主要是建立在過去數年的研究上：首先，李永迪等對於殷墟孝民屯出土陶範的研究，發現有不少孝民屯出土的陶範與炫麗風格銅器的特徵相符。[13] 這項發現證明很多「炫麗風格」的青銅器是「安陽製造」。其次，筆者曾經整理分析所有已經發表的西周銅器墓，從它們的銘文內涵與器物的風格分辨「分器墓」，證實《尚書》序〈分器〉所說武王克商以後劫掠大邑商，將搶奪來的銅器與玉器分給有功將士。[14] 這項研究，解釋了為何許多安陽製造的銅器，卻葬在關中地區西周早期周系貴族的墓葬中。然後是近年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寶雞石鼓山墓地的發掘，以及陳昭容等對於寶雞戴家灣兩次被盜銅器的整理與研究，兩者可謂互相「發現」。石鼓山 M3 屬於「典型分器墓」，M4 則屬於「局部分器墓」。同

---

[11] 松丸道雄，〈殷周銅器と陳夢家氏の研究〉，陳夢家編，松丸道雄改編，《殷周青銅器分類圖錄》（東京：汲古書院，1977），頁 1-14。

[12] 陳昭容，〈寶雞出土青銅禁及其相關問題〉，李宗焜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 4 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5），頁 291-336；陳夢家，〈附錄三・陳夢家筆記手稿影印本〉，陳昭容，《寶雞戴家灣與石鼓山出土商周青銅器》，頁 486-495。

[13] 李永迪、岳占偉、劉煜，〈從孝民屯東南地出土陶範談對殷墟青銅器的幾點新認識〉，《考古》2007 年 3 期：52-6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安陽孝民屯（三）・殷商遺存・鑄銅遺物》（北京：文物出版社，2020）；岳占偉、李永迪、申明清，〈試論殷墟晚期青銅禮器的兩個發展方向〉，《江漢考古》2017 年 3 期：89-108。

[14] 黃銘崇，〈從考古發現看西周墓葬的「分器」現象與西周時代禮器制度的類型與階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3.4（2012）：607-670；84.1（2013）：1-82。

時也說明過去戴家灣的器物群出土的墓葬基本屬於前述兩類。此外，近年在殷墟考古發現了一些殷墟 IV 期的遺跡，包括四合院建築物有被燒毀的現象，說明克商以後周方軍隊曾經放火焚燒大邑商。另外也有殷墟 IV 期青銅器可能因為逃難而被埋藏於窖藏中，還有部分青銅器被擲入水井中，以免被劫奪。[15] 這些倖存的安陽出土殷墟 IV 期青銅器也與西周前期「分器墓」出土青銅器的特徵大體相同，但因係劫餘器物，反不如「分器」之精彩。另外，含有最精彩的殷墟末期青銅器的，應該是大邑商附近王陵區以及帶有墓道的貴族墓葬，它們幾乎全部都在晚商到西周早期的階段被挖掘，最終葬在周貴族的墓中。

所以，本文是基於筆者前文論證西周前期的青銅器有「分器」現象而進行的後續研究。反過來從關中地區西周早期墓葬中出土的一些青銅器來考察殷墟末期的青銅器，[16] 若與孝民屯出土的鑄銅遺物並觀，可以讓我們觀察到殷墟末期青銅器的風格與禮儀上的變化。經過反覆考量後，逐漸覺得「殷墟末期青銅器」這個題目範圍過大，因此以下將特別專注在與直棱紋與鳳鳥紋有關的銅器，以及與之相關的一些組合的問題，並對組合差異所見到的禮儀上的不同略作討論。「殷墟末期青銅器」未來還有很大的討論空間。

一．寶雞石鼓山墓地出土青銅器與分器概念的修正

在進入殷墟末期青銅器的個案討論之前，我想先對寶雞石鼓山 M1～M4 的性質及其重要性再行評述，並且對「分器」的概念與範圍略做修正。[17] 陝西寶雞石鼓山 M1 是一座「典型分器墓」，墓中共有五件青銅禮器：〈菱格乳釘紋鼎〉（005）、[18]〈菱格乳釘紋簋〉（004）、〈囧紋罍〉（002）、[19]〈亞共叙父丁尊〉

---

[15] 何毓靈，〈殷墟劉家莊北地青銅窖藏坑性質探析〉，《南方文物》2014 年 1 期：96-100。

[16] 本文所謂殷墟末期的青銅器，大體上與考古學者劃定的殷墟第 IV 期相當。

[17] 關於「典型分器墓」、「局部分器墓」、「周軌墓」等分類的定義，見前引黃銘崇，〈從考古發現看西周墓葬的「分器」現象與西周時代禮器制度的類型與階段〉。

[18] 無銘文的銅器器名以其主要裝飾紋樣命名。括號內的三碼數字為考古簡報中器物的編號。

[19]「囧紋」，馬承源稱為火紋，本文以商代的囧字寫法與此種圖像相同，故稱「囧紋」。

（NB0822，001，亞共。叡父丁）、[20]〈守卣〉（NB0823，003，守）。[21] 都是Rawson所謂「保守型」的器物。有銘文的兩件，銘文中之「亞共」與「守」為常見的商貴族族徽。[22] 與〈亞共叡父丁尊〉同銘的〈亞共叡父丁角〉（09008）現藏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Asian Art Museum），《殷周金文集成》訂為商代晚期。[23] 其餘三件無銘文的器，也是殷墟常見的器物。

石鼓山 M2 是一座「局部分器墓」或「周軌墓」，禮器有〈菱格乳釘紋鼎〉（002）、〈菱格乳釘紋盆式簋〉（001）、〈直棱紋雙耳簋〉（003）三件。其中〈菱格乳釘紋盆式簋〉確定為克商以前（先周）到西周前期早段間關中地區作坊製作的（下詳），但是〈直棱紋雙耳簋〉則品質甚佳，可能是殷墟末期安陽製造，或周公遷殷民（包括工匠）於洛陽與關中後殷遺工匠的作品。

石鼓山 M3 規模較大，屬於典型分器墓，青銅禮器共 28 件，被分別置於幾個壁龕中：一號壁龕（K1）的銅器包括〈鳥父甲鼎〉（NB0824，001，鳥。父甲）、〈直棱紋扉棱鼎〉（002）、〈菱格乳釘紋盆式簋〉（003），共三件。二號壁龕（K2）則有〈正鼎〉（NB0825，005，正），〈萬甗〉（NB0827，006，萬）、〈菱格乳釘紋盆式簋〉（007，008，009）3 件、〈菱格乳釘紋雙耳簋〉（010）、〈素面鼎〉（011），共七件。三號壁龕（K3）中銅器包括戶禁組銅器，有〈戶方彝〉（NB0829，024，戶）、大、小〈戶卣〉（NB0830，NB0831，023，020，戶、戶）、〈斗〉（022）、小禁（方座，021）、大禁（025），六件一組，排列在一起。同一壁龕其餘青銅器包括〈臣辰侁父癸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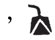
---

[20] 有銘文的青銅器括號中第一個數字是「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的器號，第二個數字為墓中器物的編碼，其後為銘文。銘文的族徽以句號分開。無銘文者為三碼墓中器物編碼。有銘文的銅器，依據一般有銘銅器命名法。

[21] 石鼓山考古隊，〈陝西寶雞石鼓山西周墓葬發掘簡報〉，《文物》2013 年 2 期：4-54。

[22] 以「族徽＋日干」與「伯、仲、叔、季＋某＋父」分別作為商人與周系貴族的區分標準，可以見黃銘崇與張懋鎔以下諸文的討論。黃銘崇，〈商人日干為生稱以及同干不婚的意義〉，《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8.4（2007）：705-754；黃銘崇，〈晚商王朝的族氏與族氏政治〉，《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東亞考古的新發現》（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頁 1-94；張懋鎔，〈周人不用族徽說〉，氏著，《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頁 223-230；張懋鎔，〈周人不用日名說〉，氏著，《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頁 217-222；張懋鎔，〈再論「周人不用族徽說」〉，氏著，《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第 3 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頁 27-30；張懋鎔，〈再論「周人不用日名說」〉，氏著，《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第 3 輯，頁 23-26。

[23] 見「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https://bronze.asdc.sinica.edu.tw/rubbing.php?09008）。

（NB0836，012，臣辰侁。父癸）、〈冉父乙卣〉（NB0833，13，冉。父乙）、〈單父丁卣〉（NB0832，017，單。父丁）、〈饕餮紋斗〉（100）、[24]〈川卯卣〉（NB1703，014，川。卯）、〈 父甲壺〉（NB0835，016，。父甲）、〈X 作父癸尊〉（NB0828，014，冉。X 賜賞用作父癸彝）、〈亞羌父乙罍〉（NB0837，019，亞羌。父乙）、〈冉盉〉（NB0838，026，冉）、〈直棱紋觶〉（098），除「戶組」以外共十件，整龕十六件。四號壁龕（K4）包含〈象鼻鳥紋方座簋〉（27）、〈菱格乳釘紋鼎〉（28）、〈中臣登鼎〉（NB0826，081，中臣登鼎帝后），共三件。六號壁龕（K6）有〈重父乙卣〉（NB0834，030，重。父乙）與〈辰臣侁癸盤〉（NB0839，032，臣辰侁。癸）兩件。[25] 28 件青銅禮器中 16 件有銘文者都是商式銘文，包括族徽、日干等特徵，推測為殷墟末期安陽製造的青銅器。只有 4 件菱格乳釘紋盆式簋、1 件素面鼎、1 件菱格乳釘紋鼎可能是關中作坊在克商前後製造的，此點本節最末會再討論。此墓的特殊之處在於擁有 15 件酒器，包含 2 件飲酒器：1 爵、1 觶。相對地只有 11 件食器，6 鼎、4 簋、1 甗。2 件水器：1 盉、1 盤。為重酒組合（15/28）；此組合與石鼓山 M4 偏食器組合（38/50）有很大不同。原因是前者為「典型分器墓」，主要的銅器都是「分器」所得，因為商人重酒器，所以分器得到酒器機率較高。後者為「局部分器墓」，時代較晚，已經有關中或洛陽作坊出土的青銅器，呈現更多周系青銅器組合的面貌。

石鼓山 M4 是局部分器墓，但是分器所得的器物仍相當多。[26] 青銅禮器同樣都置於壁龕中，一號壁龕（K1）有〈菱格乳釘紋盆式簋〉（103）、〈史母庚壺〉（NB1816，101，史。母庚）、〈列旗饕餮紋甗〉（102），共三件。二號壁龕（K2）則有〈饕餮紋鼎〉（215）、〈子父丁鼎〉（主要紋飾為饕餮紋，NB1811，202，子。父丁）、〈囧紋鼎〉（204）、〈鼎〉（殘破，213）、〈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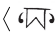
---

[24] 有學者提倡以「獸面紋」取代「饕餮紋」，本文則一律使用「饕餮紋」，其原因見黃銘崇，〈「饕餮紋」的再思考：一個方法的省思〉，《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32（2012）：1-102。

[25] 石鼓山考古隊，〈陝西寶雞石鼓山西周墓葬發掘簡報〉，頁 4-54；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寶雞市文物旅遊局、上海博物館，《周野鹿鳴：寶雞石鼓山西周貴族墓出土青銅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4），頁 55-77。其中〈川卯卣〉在報告中未描述，可見於《周野鹿鳴》，No. 41。

[26] 王占奎、丁岩，〈石鼓山商周墓第 4 號墓初識〉，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周野鹿鳴》，頁 13-19。

耳菱格乳釘紋簋〉（208）、〈雙耳夔紋簋〉（201）、〈菱格乳釘紋簋〉（乳釘鈍圓，207）、〈無耳饕餮紋簋〉（206）、〈饕餮紋盂〉（211）、〈饕餮紋垂葉紋甗〉（203）、〈帶蓋囧紋罍〉（大，205）、〈帶蓋囧紋罍〉（小，209）、〈犧尊〉（大，212）、〈犧尊〉（小，214）、〈饕餮紋有肩尊〉（210），共十五件。三號壁龕（K3）有〈附耳直棱紋鼎〉（309）、〈列旗饕餮紋鼎〉（313）、〈 父丁鼎〉（NB1810，305， 。父丁）、〈蟬紋鼎〉（306）、〈（變形）饕餮紋鼎〉（315）、〈子父丁鬲鼎〉（NB1812，303，子。父丁）、〈尖刺菱格乳釘紋盆式簋〉（301）、〈象鼻鳥紋方座簋〉（314）、〈饕餮紋盂〉（308）、〈 父辛甗〉（NB1814，307， 。父辛）、〈列旗饕餮紋甗〉（311）、〈鳥紋甑〉（302）、〈天罍〉（囧紋帶蓋，NB1815，304，天）、〈囧紋帶蓋罍〉（小，312）、〈弦紋盤〉（310），共十五件。四號壁龕（K4）有〈菱格乳釘紋盆式簋〉（401）1 件。五號壁龕（K5）有〈亞韋作乙方鼎〉（NB1813，503，亞韋。作乙尊）、〈菱格乳釘紋方鼎〉（501）、〈鳥紋帶雙耳簋〉（502）、〈臣辰侁父乙壺〉（NB1817，504，臣辰侁。父乙），共四件。六號壁龕（K6）有〈簡化饕餮紋鼎〉（602）、〈菱格乳釘紋盆式簋〉（601，603，604）三件，共四件。八號壁龕（K8）有〈菱格乳釘紋鼎〉（801，802）兩件、〈棘羽鳳鳥紋有蓋簋〉（804）、〈菱格乳釘紋盆式簋〉（805，806，807）三件、〈帶鈴直棱紋簠〉（808）、〈 簠〉（NB1936，803， ），[27] 共八件。總計所有壁龕中有 50 件青銅禮器。

和 M3 表現完全不同，M4 的青銅禮器中食器 38 件：15 鼎、16 簋、4 甗、1 甑、2 簠。酒器 9 件，都是陳列器，無飲器。水器 3 件。有銘文者至少有 9 件，包括〈子父丁鼎〉兩件、〈臣辰侁父乙壺〉、〈亞韋作乙方鼎〉、〈天罍〉、〈 父辛甗〉、〈父丁鼎〉、〈史母庚壺〉、〈 簠〉，這些有銘文的器，銘文內容均為商貴族族徽、親稱與日干，明顯地都是商貴族所作器物。[28] 有些禮器雖無銘文，但看來可能是晚商殷墟生產的器物，也有些器物則明顯為關中地區作坊尚未加入商工匠以前生產的，品質與殷墟生產者差別極大；也有少數還是模仿

---

[27] 此件簠有銘文，但需照 X 光方可辨認，是丁岩告知的；當時尚未照射 X 光。筆者根據丁岩所提供的線索在庫房觀察時認出，字跡為很細微的凸線紋，而且字體很大，所以不易辨識。現場張天恩博士同意此一判斷。後收入張天恩主編，《陝西金文集成・8》（西安：三秦出版社，2016），No. 0955。

[28] 王占奎、丁岩、劉軍社、辛怡華、郝明科、王小梅，〈陝西寶雞石鼓山商周墓地 M4 發掘簡報〉，《文物》2016 年 1 期：4-52。

本墓中既有的殷墟生產的器物（下詳）。整體的評估，石鼓山M4的年代比M3略晚，但不會相差太久，M3是「典型分器墓」，M4則屬「局部分器墓」。整體而言，石鼓山墓葬群的四座墓葬，時代應該相差不遠，是關中或洛陽青銅器作坊開始大規模生產以前入葬的。這群銅器精美與粗糙並存，「炫麗風格」與「保守風格」並存，這與Rawson早先的判斷不同。

從石鼓山例證所得的另外一個重點是，過去在撰寫「分器」論文時，筆者不太確定克商以前的周方，是否有青銅禮器的作坊。從石鼓山出土的青銅器群看來，這群銅器中大多數的製作品質相當高，從器形到紋飾的製作都相當的精細。但是有另外一群，主要是菱格乳釘紋盆式簋，及一部分變形饕餮紋鼎，紋飾製作粗疏，與前面這群銅器相比，有明顯的落差。而且，擁有這些製作粗糙的鼎與簋者，並不一定是中下層貴族，因為石鼓山的M3與M4都是身分顯赫的貴族。特別是M3時代為西周前期早段偏早，其中的菱格乳釘紋盆式簋應該是在克商前就獲得的，與克商所得一併被下葬。菱格乳釘紋盆式簋是最常被討論的「先周青銅器」，[29] 其紋飾精粗有別。紋飾精者，通常器壁較厚，且有銘文時都是族徽或日干這種商貴族的銘文，它們也出土於殷墟以及其他商遺址；紋飾粗糙者器壁較薄且只出現在關中地區。[30] 以往學者不確定這樣的銅器生產，是否能夠往前推到周王朝建立以前，現在看來已無疑問，因為在西周前期，年代最早的典型分器墓中，甚至有些更早的墓中就已經出土疑為關中作坊生產的器物。[31] 張懋鎔等認為周方在克商以前就已經開始用鼎制度，並且舉陝西甘泉閻家溝以及武功梁家堡的先周墓葬為例，兩者都有三件簡化獸面紋鼎，且大小相次。[32] 同墓還出土弦紋簋三件，素面簋兩件，其鑄造與菱格乳釘紋盆式簋的水準相當。[33] 換言之，先周青

---

[29] 鄒衡，〈論先周文化〉，氏著，《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頁316-317；武者章，〈先周青銅器試探〉，《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09（1989）：155-184。

[30] 郭妍利，〈斜方格乳釘紋簋類型及其相關問題〉，《中國歷史文物》2009年3期：46-59；李宏飛，〈論商周之際的乳釘夔紋盆形簋——關中地區先周時期銅器群探索之三〉，《四川文物》2021年2期：46-56。

[31] 丁岩、王占奎，〈石鼓山商周墓地M4再識〉，《文物》2016年1期：64-70。本節簡單描述周克商以前的青銅器鑄造技術，為避免文章內容過度龐雜，更多細節則需另外為文，此處不深入討論。

[32] 張懋鎔等，〈西周重食文化的新認識——從甘泉縣閻家溝新出青銅器談起〉，《考古與文物》2009年1期：32-38。

[33] 王永剛等，〈陝西甘泉縣出土晚商青銅器〉，《考古與文物》2007年3期：11-22。

銅器鑄造的不足之處是工匠在鑄造紋飾的能力與殷墟工匠相去甚遠，所以只能鑄造素面、弦紋、只有圓眼的簡化獸面紋，以及施作不佳的菱格乳釘紋。

在石鼓山 M4 還有一個現象，就是銅器的原件與複製件並存於同一墓中，且複製件的品質明顯地劣於原件。石鼓山 M4 有兩件體量相當的饕餮紋鼎（215，315）。一件紋飾完整，剔地起凸的主紋線條較佳，雲雷地紋施作較優。另一件則僅有浮起的主紋，線條生澀，無地紋。丁岩認為製作優良的是原件，另一件則是關中作坊的仿作，此一觀察很重要。[34] 其後李龍俊撰文認為這兩件都是根據石鼓山 M3 的一件饕餮紋鼎（001）——〈鳥父甲鼎〉而作，並且進一步指出石鼓山 M3 與 M4 中存在多件仿製品。[35] 換言之，關中作坊在克商以前已有鑄造青銅禮器的能力，主要是素面或乳釘紋鼎，偶爾模仿饕餮紋鼎，如武功滹沱村出土的〈變形饕餮紋大鼎〉，[36] 菱格乳釘紋盆形簋、弦紋盆形簋等，也鑄造過卣、觚等器形，[37] 但其品質與大邑商的作坊有較大落差。除了紋飾的主要圖像線條不流暢以外，通常沒有雲雷地紋。這是技術落後所致，而非贊助者的財力或身分高低之故。從石鼓山 M4 考察，即使是已經克商，但還有一段時間，周王朝關中地區的工匠對於紋飾的掌握仍無把握。換言之，周方在克商以前，其工匠即已克服禮容器製造的形制方面問題，也製造了一些青銅禮器。但是，仍然容易出現澆不足的問題，所以先周墓中出土的銅鼎，常見鼎足的末端澆不足，需要後補。他們也尚未掌握製造精美紋飾的技巧；即使參考原器，也無法複製。此一關中地區鑄造青銅禮器技術上的落後，一直到周公完成東征，將部分殷遺民，包括工匠移入關中以後，才完全改觀，關中作坊也能生產紋飾精細、品質極高的青銅禮器。完整的評估需要更細緻討論，也需要更多的考古材料。

利用「分器墓」中的銅器來討論殷墟末期青銅器有幾個基礎，首先是在殷墟孝民屯出土與西周前期早段典型分器墓或局部分器墓的器物相關的陶範。其次是安陽殷墟遺址出土與分器墓相同或類似的器物。再其次是安陽以外的晚商遺址或墓葬出土器物與分器墓出土器物相同或類似。在這些基礎上，我們可以從器物的演化考慮，大體上把殷墟末期器物在器形與紋飾的某些特徵勾勒出來。

---

[34] 此點也是丁岩在寶雞庫房考察石鼓山銅器時指出的。

[35] 李龍俊，〈陝西寶雞石鼓山墓地出土銅器仿制現象研究〉，《考古》2018年5期：101-108。

[36]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圖 127，頁 112，解說頁 19。

[37] 陝西甘泉下寺溝先周時期墓葬出土粗糙的卣、觚等器類，可能是周方自己鑄造的器物，見王永剛等，〈陝西甘泉縣出土晚商青銅器〉。

二・大禁、小禁與大禁上的器物

石鼓山 M3K3（墓三的第三號壁龕）出土 16 件青銅器，包括方彝、大、小兩鳳鳥紋卣、大、小兩禁還有一個斗，由於出土時大禁在下，其餘在上，自左至右為方彝、大卣、小卣＋小禁，另斗置於前方。其方彝與大小兩卣銘文都是「戶」，故本文稱為「戶氏禁組」（圖 1）。此外同壁龕右邊還有 9 件酒、水器，包括一罍、一盉、三卣、一尊、一壺、一爵與一觶（無銘文），這些銅器的銘文族徽不一、受祭者不一，器的組合除了禁組以外，沒有特別的意義，充分展現出筆者所謂「分器」的特徵。換言之，只有銘文為「戶」的三件與一件斗、一件小禁是原本放在禁上的，考古出土時的組合，是陪葬時將所有酒器都擺在上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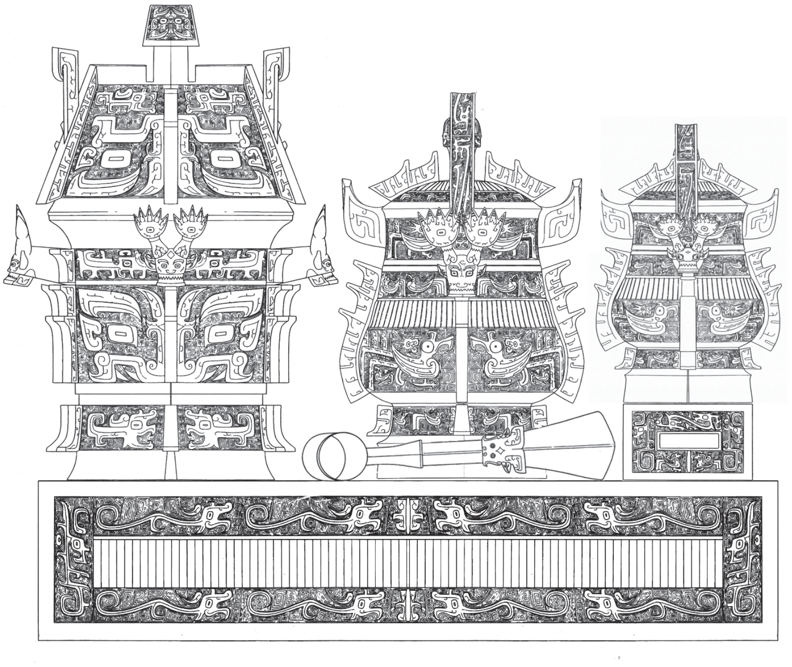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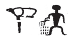


圖 1：「戶氏禁組」的〈戶方彝〉、大〈戶卣〉、
小〈戶卣〉＋小禁與斗的陳設方式
（筆者根據考古報告發表的線圖改製）

「戶氏禁組」壁龕的出現讓我們意識到現藏於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的 15 件銅器，[38] 可能同樣出自寶雞戴家灣一帶，同一時代同一等級墓的一座壁龕中，其中包括「鼎氏禁組」大禁上的一個尊、大、小兩個鳳鳥紋卣、一件小禁、一件斗。小〈鼎卣〉同樣放在小禁上（圖 2）。[39] 除了禁上的銅器以外還有 9 件銅器，包括一斝（）、一盉（子。父乙）、兩爵（亞 ；無銘文）、一觚（亞。匕己）、四觶（天。父乙；酋。父甲；中作匕己彝。亞址；無銘文）。另外有數件尖頭的匕，年代明顯地較晚，應該是盜掘者混入的。這些酒器的族徽、受祭者也都不一，器的組合也沒有特別意義，同樣反映筆者所謂「分器」現象。根據「戶氏禁組」壁龕中的銅器與「鼎氏禁組」及附加銅器間的相似性，筆者認為目前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柉禁組的 15 件銅器很可能是 1901 年從寶雞戴家灣的一座「典型分器墓」的一個壁龕中被盜掘出來，其狀況可能與石鼓山的 M3K3 相似。被盜出以後，具有陝西地緣關係且熱衷古代青銅器收藏的端方全數收羅，甚至拍了一張官員與銅器組的合照，而幸運地保留其部分脈絡。最終輾轉售給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並且一起展出。[40]「鼎氏禁組」復原顯現出此種「觚形尊」搭配大小卣會顯得略矮。

---

[38]「鼎氏禁組」是 1901 年被盜掘出土的，端方全數收集，日本學者認識到此組器物的重要性，曾有數位親訪端方宅進行研究，並出版研究成果。其後，梅原末治曾進行過有系統的考察，但是因為當時沒有考古發掘資料比對，所以資料收集詳盡卻無結論。見梅原末治，《柉禁の考古學的考察》（京都：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1933）。中文全文翻譯見〈附錄八：梅原末治柉禁相關文章中譯〉，陳昭容，《寶雞戴家灣與石鼓山出土商周青銅器》，頁 524-557。日本學者的研究見梅原末治論文，本文不再贅述。

[39] 相關事件最詳細的描述，見陳昭容，〈寶雞出土青銅禁及其相關問題〉；陳昭容，〈前言〉，《寶雞戴家灣與石鼓山出土商周青銅器》，頁 26-45。過去 Rawson 認為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柉禁組 15 件器物不一定出自同一墓葬，甚至不是同一地區。現在看來是誤判。這組器物的出土使得以前懷疑「鼎氏禁組」與另一套「出戟器禁組」的可信度爭論可以休矣。

[40] 陳昭容，〈前言〉，《寶雞戴家灣與石鼓山出土商周青銅器》，頁 26-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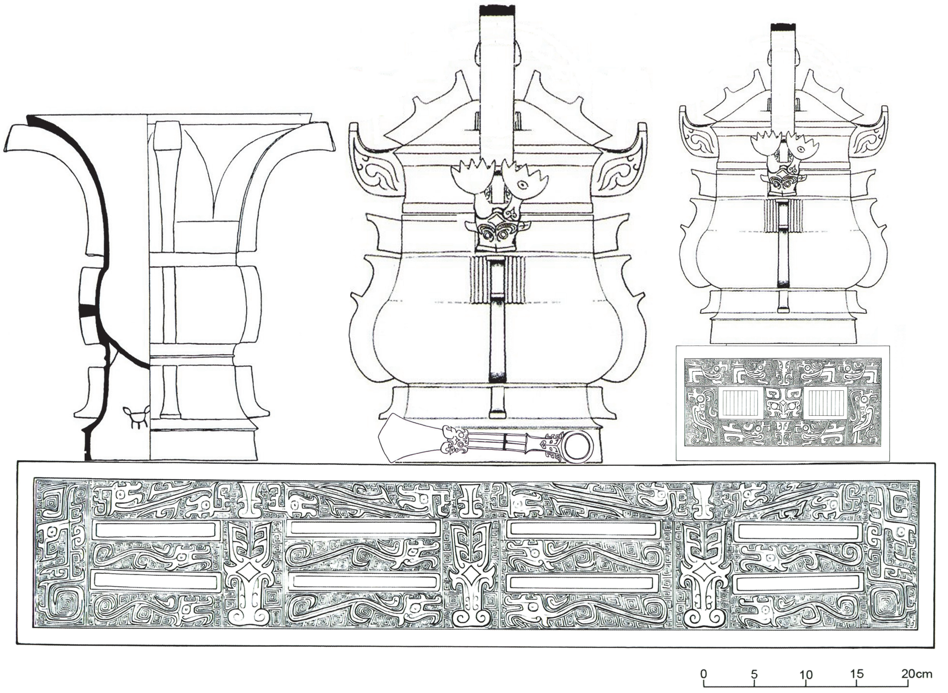


圖 2：「鼎氏禁組」的〈鼎尊〉、大〈鼎卣〉、
小〈鼎卣〉＋小禁與斗的陳設方式
（筆者根據《寶雞戴家灣與石鼓山出土商周青銅器》與
梅原末治發表的線圖改製）

此種「禁組」的發現並不止前述兩次。1926～1928 年前後，軍閥黨毓琨也在寶雞戴家灣一帶盜掘，出土品包括現藏美國波士頓美術館的一件小〈四出戟鳳鳥紋卣〉。另一件大〈四出戟鳳鳥紋卣〉藏於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弗利爾藝廊，形制與紋飾和波士頓美術館所藏完全相同，但尺寸較大，應該是大小成套的卣。由於小〈四出戟鳳鳥紋卣〉曾經出現在梁思永保存的一張照片中，這張照片包含多件青銅器，放在一個大〈夔龍紋禁〉上，[41] 這件禁現藏於天津市藝術博物館。陳昭容認為這兩件卣很可能是天津〈夔龍紋禁〉上搭配成套的大小兩卣。她也指出這件禁上面理當有三件大銅器。比對「戶氏禁組」，合理推測其第三件應該是現藏

---

[41] 梅原末治，〈陝西省寶雞縣出土の第二柉禁〉，《東方學紀要》1（1959）：1-15。中譯本見〈附錄八：梅原末治柉禁相關文章中譯〉，陳昭容，《寶雞戴家灣與石鼓山出土商周青銅器》，頁 558-569。

哈佛大學賽克樂博物館的〈出戟直棱紋方彝〉，[42] 或許也同樣有一斗，與一小禁上置小卣，本文稱為「出戟器禁組」。筆者推測，「出戟器禁組」很可能也是從類似的壁龕中出土的，而且可能也伴隨了一些其他的酒器。不過，「出戟器禁組」本身可以復原（下詳），其他伴隨出土的器物，因為同時盜掘多座墓葬出土器物甚夥，而且被雜置一起，即便有一張從天津流出的寶貴照片，但是已經遠離它們原本出土的脈絡，故不易復原。

「戶氏禁組」的出土，改變了我們對於禁相關組合的看法，一方面確立「鼎氏禁組」包括〈鼎尊〉、大〈鼎卣〉、小〈鼎卣〉，以及小〈鼎卣〉下墊一小禁，其上有一斗的組合。另一方面也為「出戟器禁組」的組合研究帶來新的刺激。「出戟器禁組」包括天津的〈夔龍紋禁〉，上放置賽克樂的〈出戟直棱紋方彝〉、弗利爾的大〈四出戟鳳鳥紋卣〉與波士頓的小〈四出戟鳳鳥紋卣〉，這三件器的尺寸彼此配合，高者全高約 50 公分，且都有罕見的出戟，均飾以直棱紋。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比對材料是寶雞石鼓山 M3「戶組」的出土狀況，顯示「戶組」的禁上為一件方彝與大小兩件卣，方彝的蓋上亦有出戟，小卣又以方座墊高。[43]〈出戟直棱紋方彝〉的每個角落與中央都有扉棱，頂蓋各個角落的扉棱最上面的勾特別拉長。器身與蓋都有四層紋飾，從上到下分別是鳥紋、夔龍紋、直棱紋、夔龍紋。直棱紋帶較寬，形成本器的主要特色。蓋頂的鈕為四阿屋頂的形狀，飾以饕餮紋。方形圈足相當高，飾以夔龍紋。本器最大的特色，是與前述兩件相同的出戟，共四戟，在側面直棱紋帶的兩個四分點上，與器身平行伸出。[44] 這些「附加」元素，讓此器一反方彝靜謐的特性，直接攫取觀者的視覺焦點。

陳昭容認為這三件出戟器是天津禁上的三大器物很有說服力；不過，她也指出此一說法的問題，就是天津禁上有三個橢圓形孔，邊緣浮起，三個孔同大，出戟方彝與大出戟卣的圈足可以各罩住一孔，但是小出戟卣的圈足則無法完全蓋住這個橢圓孔，放在上面會不穩定。除非在小出戟卣下也同樣有一個禁（獨立的方座），將小卣墊高，罩住圓孔。筆者認為這件小禁很可能是丹麥哥本哈根國立博物館（The National Museum of Denmark）的帶方座的〈告田觥〉的下段方座。此組器在前述照片中被放在第二件禁上，應該是同時被盜掘的器物。此方座與上面的〈告田觥〉是可以分離的，而且根據照片可確定方座與大禁和小出戟卣同出。

---

[42] 張昌平，〈關於商周之際的長梁青銅器〉，《南方文物》2015 年 2 期：170-175。

[43] 陳昭容，〈寶雞出土青銅禁及其相關問題〉。

[44] 陳昭容，《寶雞戴家灣與石鼓山出土商周青銅器》，頁 84-85。

更重要的是觥有方座絕無僅有，只此一件。且李學勤與艾蘭的觀察，方座上的橢圓形凸起比觥之圈足略小，或許本非一套。[45] 可能的狀況是這些器物出土以後，被古董商東拼西湊，這件方座就一直被當成〈告田觥〉的一部分。筆者以下將根據陳昭容與周亞所提供的相關尺寸與圖像進一步討論與復原。

到目前為止傳世與出土的大、小禁都各有三件，原應分屬三組。三件小禁分別是三件大禁上小卣下的方座，座頂部都有橢圓形的凸起，上面放置的是橢圓形圈足器。三組卣的方座，戶組小禁的尺寸 17.4×14.4×10.3 cm，其四面各有一長方形孔，紋飾基本相同，孔上為尾部相連的顧首龍紋，孔下為相對的几字形角鳥紋，兩側為顧首升鳥紋。禁頂部中央有一立體橢圓形的凸起，夾在中央的方形素面空間內，四面均飾以尾部相連的顧首龍。[46] 鼎組小禁尺寸為 21.6×17.5×14.6 cm，頂部素面無紋，上有一橢圓形凸起，高約 2 cm，邊緣略有傾角。前後與兩側的紋飾各不相同，前後的中央為直棱紋，直棱紋的中心夾饕餮紋。上排為几字形羽冠的鳥紋，有四隻兩組，面向中央的篦形紋，兩側為几字形羽冠的立鳥，下排為兩隻面向中央篦形紋的几字形羽冠鳥紋，邊緣素面。兩側面因為寬度比正反面窄，所以紋飾有一些調整，中央的長方形左右有兩方形孔，中間夾篦形紋。上排中央為饕餮紋以及面對饕餮紋的几字形羽冠的鳥紋。兩側為几字形羽冠立鳥紋，下排為面對面的几字形羽冠鳥紋。[47]

以上三組一是考古出土，另一則是流傳時一直保持整組器，都無疑問，唯有出戟禁組需要進一步討論。出戟禁組的丹麥〈夔龍紋小禁〉上的橢圓形凸起的長短徑為 13.4×9.5 cm，與波士頓小〈四出戟鳳鳥紋卣〉圈足的長短徑 15.6×13.4 cm 比較，我們確定小〈四出戟鳳鳥紋卣〉是可以放在〈夔龍紋小禁〉上，卣可以罩著小禁上浮起的孔，不會互卡。[48] 這件小禁頂面橢圓形凸起的四邊為素面的方形，外側也有一圈素面帶，中間夾著紋飾，每側各兩組尾部相連的顧首龍紋。正反兩面中央為直棱紋，上排中間夾篦形紋，兩邊有面向篦形紋的夔龍紋各一，下排亦同。左右則為几字形羽冠的顧首升鳥紋。側面為排成田字形的四個方孔，上排中間夾篦形紋，兩邊有面向篦形紋的夔龍紋各一，下排亦同。中排亦為面向中

---

[45] 李學勤、艾蘭，《歐洲所藏中國青銅器遺珠》（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頁 341-342，No. 95。

[46]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周野鹿鳴》，頁 243-245，No. 109。

[47] 照片及相關資料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網站："Ritual Wine Container (Yu) with Lid and Pedestal" (https://www.metmuseum.org/collection/the-collection-online/search/42165)。

[48] 陳昭容，《寶雞戴家灣與石鼓山出土商周青銅器》，頁 268-269。

央的夔龍紋，被豎向中排的往上的夔龍紋所分隔開。左右兩側為几字形羽冠的顧首升鳥紋。

丹麥〈夔龍紋小禁〉的尺寸為 28.7×21.2×12.6 cm，正面比其他兩件小禁要寬，其原因可能是上面所置的小卣出戟，其總寬度加上出戟達 30.5 cm，出戟的卣與下面寬達 28.7 cm 的小禁看起來不至於頭重腳輕。從高度上考量，小〈四出戟鳳鳥紋卣〉高 35.2 cm，加上禁高後總高為 47.8 cm，比大〈四出戟鳳鳥紋卣〉（高 50.7 cm）略矮，而大〈四出戟鳳鳥紋卣〉又比〈出戟直棱紋方彝〉（高 51 cm）略矮，但依此種方式排列三組大致差不多，並排一起份量也相當（圖 3）。再者，三件出戟器（方彝、大卣、小卣）的寬度分別為47.8、41.8、30.5，加總寬為 120.1 cm，加上器與器的間隙，大約就是大禁的寬度 126 cm。考量天津〈夔龍紋大禁〉上有三個孔，賽克樂〈出戟直棱紋方彝〉的圈足兩徑與口徑相當，口徑為 25.5×21.6 cm，弗利爾大〈四出戟鳳鳥紋卣〉的方形圈足外徑 22.9×19.2 cm，丹麥〈夔龍紋小禁〉方形圈足外徑 28.7×21.2 cm；相對地，天津〈夔龍紋大禁〉三個橢圓形孔，左孔外徑為 19.5×16.5 cm，中孔外徑為 20.6×16.7 cm，右孔外徑為 19.7×16.5 cm，[49] 三件器的圈足都可以罩住大禁上的三個橢圓孔。天津大禁上三個孔的實際位置，如果根據戶組的出土狀況，而將三件出戟器自左至右依方彝、大卣、小卣＋小禁的順序排列，會出現出戟方彝與大卣的出戟從正面看有空間上的重合的現象；不過，因為方彝的出戟是與器的側面呈垂直方向伸出，但是卣的出戟，卻是約 45 度角斜出，所以方彝的出戟可以避開大卣的出戟也可以避開大卣的扉棱，不會有彼此衝突的問題（見圖 3）。李永迪等指出與丹麥〈夔龍紋小禁〉相近的禁或方座的陶範在安陽殷墟孝民屯鑄銅作坊出土過，顯示此類小禁應該是在安陽生產的，安陽孝民屯作坊也還出土更多與這三件大禁不同的大禁範，[50] 說明這種「禁組」在殷墟末期應當相當受到商王朝高級貴族的喜好。

---

[49] 三孔外徑的數據見周亞，〈寶雞出土青銅禁的觀察與分析〉，氏著，《周亞吉金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頁 270-279。

[50] 李永迪，〈安陽殷墟孝民屯出土青銅禁範〉，發表於美國芝加哥大學、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寶雞青銅器博物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合辦，「寶雞戴家灣、石鼓山與安陽出土青銅器及陶範」學術研討會（北京：美國芝加哥大學北京中心；寶雞：陝西省考古研究院，2015.11.30-12.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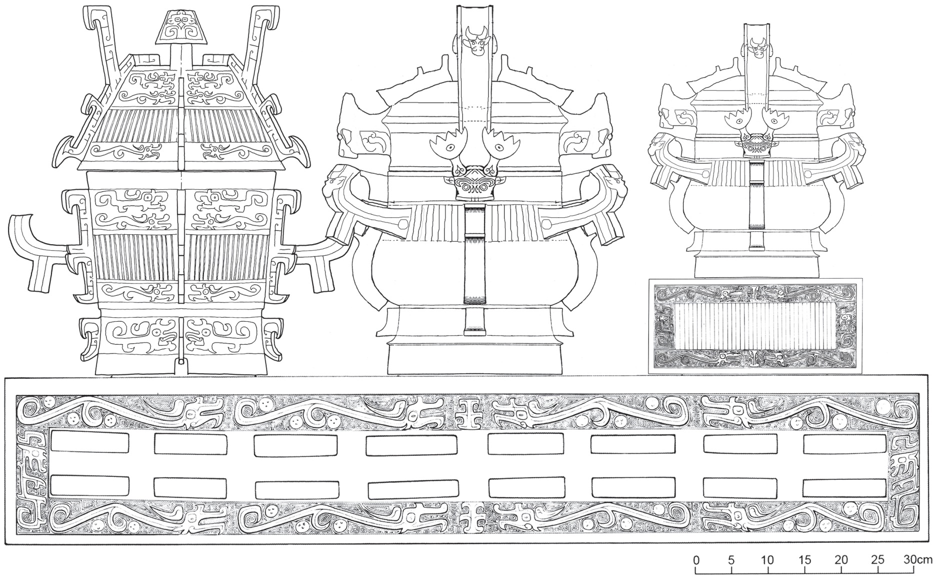


圖 3：「出戟器禁組」的方彝、大卣、小卣＋小禁的陳設方式
（推測原來應該還有一件斗；方彝為筆者依比例繪製，
大小禁根據陳昭容，《寶雞戴家灣與石鼓山出土商周青銅器》，頁 257, 269，
兩卣根據梅原末治，《柉禁の考古學的考察》，圖版 9, 14 改製）

關於這三個禁組的年代，筆者認為「鼎氏禁組」的時代最早，「戶氏禁組」次之，「出戟器禁組」年代最晚，基本上時代愈晚的禁的寬度愈寬，高度也愈高。相對地，每組上個別器，也同樣隨著時代愈後紀念性愈高，例如「出戟器禁組」的三件器本身，就以出戟的方式強化了紀念性。「鼎組」與「戶組」分別屬於「鼎」與「戶」兩個商貴族族氏，「出戟器禁組」未署族名，筆者認為此種等級高卻未署族徽的重器很可能屬於不需署族徽的商王族所有。這可能反映殷墟末期商王室與貴族對於紀念性的需求提高，靜置擺設的需求也提高，王室對於視覺要求更高。西周早期在開始區分「殷」、「周」雙軌之前，周人貴族還是喜好此種禁的組合。湖北隨州葉家山 M28 曾經出土一件漆禁，隨同八件酒器（二尊、二卣、二爵、一觚、一觶）、一件〈曾侯諫盉〉（NB0609）與一件漆觚一併放置禁

上出土。[51] 這也是一個局部分器墓，漆禁上的銅器與漆器有些是分器所得，有些則是曾侯諫為夫人做的。漆禁上原本應該放置的是一件〈曾侯諫作媿尊〉（NB0610）與兩件〈曾侯諫作媿卣〉（NB0611，NB0612），其配置與前述鼎氏禁組相同。不過，在葬禮中加上的一尊（無銘文）、二爵（父辛； 父辛）、一觶（ 母辛），一〈目雷紋觚〉（無銘文），漆觚則是根據〈目雷紋觚〉做的，[52] 在葬禮拼湊一組酒器。

最後我們發現〈鼎尊〉放在禁上比起大〈鼎卣〉與加上方座的小〈鼎卣〉體型感覺略小，其紀念性就顯得略遜一籌（參看圖 2）。此一問題讓我們注意到陝西韓城梁帶村 M27 出土的一件〈帶出戟蓋饕餮紋尊〉（圖 4，中），[53] 有器與蓋，器是相當一般的饕餮紋尊，有四個扉棱，它的正面應該是面對一個完整的饕餮紋，也就是正面有一條扉棱。蓋看起來不是與器同時鑄造的，而是後加的。雖然它是圓形，但是卻與方彝的蓋一樣有五脊（所謂「四阿」屋頂形），下段飾以直棱紋。在正脊中央加了一個圭形的出戟，另在四脊的直棱紋帶也出了四個戟，四個戟像是鳥的羽尾。看來這個尊的原型，在商代可能也是放在禁上的三件器之一，或許因為不夠高而被加上出戟蓋（加蓋總高 61.9 cm）。這件蓋的正向，應該是正脊的方向，也就是蓋上圭的正面（見圖 4 左的復原）。

---

[5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隨州葉家山 M28 發掘報告〉，《江漢考古》2013 年 4 期：3-57。

[52] 盧一等，〈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出土漆器整理與研究〉，《江漢考古》2024 年 1 期：50-59。

[53] 孫秉君、蔡慶良合著，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震旦藝術博物館編，《芮國金玉選粹——陝西韓城春秋寶藏》（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頁 260-2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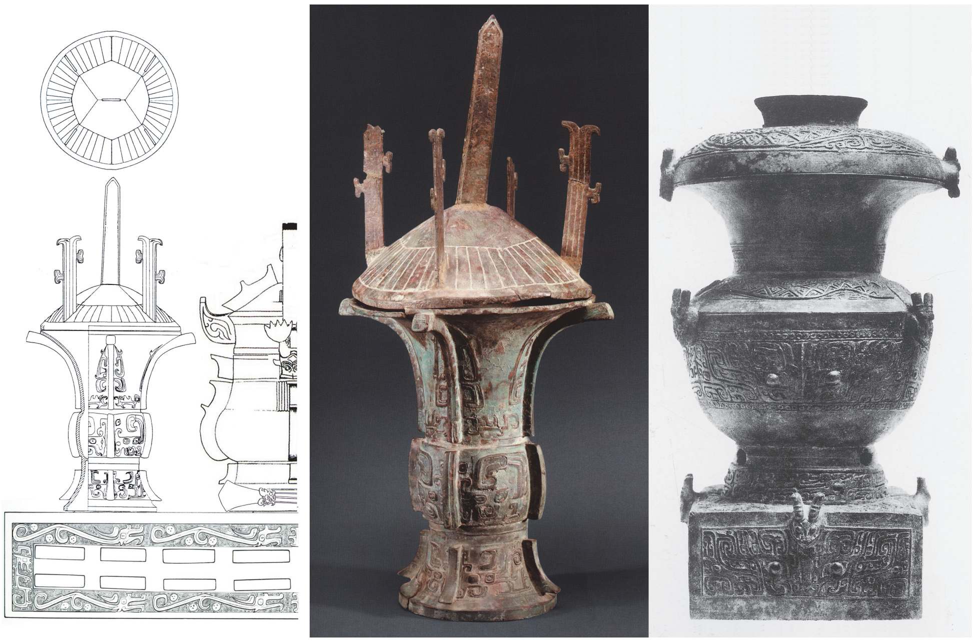


圖 4

（左）陝西韓城梁帶村出土的有蓋尊原件樣貌復原以及放置在禁上的想像復原（筆者繪製）

（中）陝西韓城梁帶村出土的有蓋尊，推測是西周前期早段的仿製

（右）容庚《善齋彝器圖錄》著錄的一件有蓋方座有肩尊，可能也是放置在禁上的靜置組合

筆者曾經指出梁帶村 M27 雖然年代已經進入西周後期的禮制改革以後，但是卻包含三件早期的器，一為這件〈帶出戟蓋饕餮紋尊〉，次為〈棘羽鳳鳥紋卣〉（下詳），再為〈饕餮紋角〉。陳小三認為這三件器是春秋時代的「復古」的作品。[54] 他的觀察犀利但結論可商。這三件銅器比起商周時代其他器物紋飾施作品質不佳，主要圖像以剔地起凸方式施作，沒有地紋，主圖像線條不流利，明顯地是仿作品。不過，為何在春秋時代要有此「復古」作品？為何復古技術與同一時代鑄銅工匠的技術落差如此之大？他並未提出解釋。前面已經指出石鼓山 M4 的

---

[54] 陳小三，〈韓城梁帶村 M27 出土卣、尊的年代辨析——附論扇形鉞與特殊的鳳鳥紋飾〉，《文博》2011 年 1 期：26-31；陳小三，〈再談韓城梁帶村 M27 出土一組銅器的年代及相關問題〉，《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20 年 5 期：45-56。

兩件獸面紋鼎，一件紋飾完整，剔地起凸主紋線條流利，雲雷地紋施作優良。另一件也僅有浮起的主紋，線條生澀，無地紋。丁岩認為一是原件，另一則是關中作坊的仿作。換言之，關中作坊在克商前已有鑄造青銅禮器的能力，主要是素面或乳釘紋鼎，其品質與大邑商的作坊有巨大差別。在克商後最早階段，大邑商工匠尚未進入關中以前，關中地區的鑄銅工匠可能以熟識的貴族所擁有的青銅器為參考仿作。據此推論，梁帶村 M27 的這三件器，可能是西周早期，還在「典型分器」或「局部分器」階段時的拷貝品，被保留到春秋時代才下葬。關中地區的作坊只有在此一時期及以前（即先周時期）才可能做出如此不成熟的產品，在周公東征遷殷民以後，有一部分殷地工匠被遷移到關中，關中地區青銅鑄造水準立即大幅提升，即使模仿或復古其品質也不可能太粗劣。推測此尊與其蓋的「原件」，應當都是殷墟末期之物，原本組合的面貌是尊的左側有大卣及小卣＋小禁。這件尊加上出戟蓋後高達 61.9 cm，原本整組觀看紀念性應該很強（圖 4，左），這件仿製品的原件也許還在西周前期的芮國高級墓葬中。

以上討論的這三套禁組，應當都是從寶雞當地西周前期墓葬的一座放置酒器的壁龕出土。在安陽孝民屯商代青銅作坊中出土相當多的禁與鳳鳥紋卣的範。但此種禁的器類，突然停止不再演化，一直到春秋時代。或許外觀閃亮的銅禁被顏色突出的漆禁取代。

三．直棱紋鳳鳥紋卣的序列與年代（圖版 1）[55]

以上三個「禁組」上的卣都是大小兩件，而且在形制上相似，大者通高約 50 cm，小者通高約 35 cm。它們都是器體斷面為橢圓形的卣，提梁設在短向，也就是正反面為寬片，而提梁的犧首就在器物的正、反面上。[56] 器有四組扉棱，扉棱厚實明顯。器身橫分三段，上段窄，飾以較小的走鳥紋（鳥紋橫向，看似快速行進的鳥），中段飾以直棱紋，下段鼓腹，飾以較大的鳳鳥紋。圈足部分亦飾以走鳥紋。器蓋以母子口相扣，蓋的兩側有變形上翹的鳥喙，蓋頂有短柱，上有半南瓜形的捉手，有四組扉棱。蓋的垂直段飾以走鳥紋，頂部斜披橫分成三段：上段

---

[55] 本節所討論的鳳鳥紋卣之相關資訊見表 1。圖像見圖版 1。關於鳳鳥紋的分類還可以更細緻，筆者此處僅依據本研究需要進行大類區分。

[56] 有研究者稱此種卣為「縱置提梁卣」，見孫明，〈商周縱置提梁銅卣賞析〉，《收藏家》2018 年 1 期：9-14。

飾以鳥紋，中段飾以直棱紋，下段飾以走鳥紋。以上三禁組提梁卣犧首的角都是「巴掌形角」。大鳳鳥紋方面「鼎氏禁組」的兩卣的主要鳳鳥紋（鼓腹上的）本文稱為第 I 類大鳳鳥紋，鳥具有「几字形角」，而且在器身四分之一的空間內，得以容納兩隻背對的第 I 類大鳳鳥紋。所以，器以四個扉棱為中心，看起來都是兩鳥相對（圖版 1：I）。但是「戶氏禁組」與「出戟器禁組」則在同樣空間內僅有一隻第 II 類大鳳鳥紋，所以僅有正反兩面是兩鳥紋相對，正面包含兩種主要元素，相對的鳳鳥紋與巴掌形角犧首，使得此種卣的紀念性更強烈。這裏的第 II 類鳳鳥紋的特色是鳥角為巴掌形角，尾部也較明顯，有下鉤的主幹，上面還有數個戟勾狀分支。尾部的下方，藏有一隻反向的小鳥（圖版 1：II）。出戟組的特色就是在每段直棱紋的中間，還斜出相當長的勾戟，主幹上彎，在彎曲之前伸出一長方形的下垂。另外，出戟組的卣提梁彎曲處，還飾以一立體的牛首。

早年 Max Loehr 純粹從風格演變考察，認為前述小〈四出戟鳳鳥紋卣〉屬於晚商的第五種風格。[57] 其後陳夢家根據自戴家灣出土而將此種器訂為西周早期，以後所有學者從之。最近在殷墟孝民屯鑄銅作坊出土不少模與範，與此種鳳紋卣的鑄造有關，包括：出戟的模與範、器身主要紋飾鳳鳥紋的尾部以及頭部（圖版 1：II），卣蓋兩側凸出部分前端的牛首紋飾，卣蓋鈕範，以及提梁末端的巴掌形角犧首裝飾等部位。[58] 更重要的是「戶氏禁組」赴上海進行修復與展覽的期間，廉海萍曾在大〈戶卣〉的蓋一側上翹的「鳥喙」部位殘缺口採取其泥芯進行分析，[59] 檢測內容包括化學組成、礦物組成和微觀形貌，與她的團隊採取的安陽苗圃北地陶範與侯馬陶範，以及其他團隊檢測過的周原陶範樣本進行比對，發現大〈戶卣〉的泥芯的幾種微量元素分析都落在「安陽區塊」，而不在侯馬區塊或周原區塊，證明〈戶卣〉以及整個「戶氏禁組」是在安陽製造的。[60] 以上種種證據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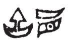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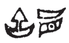
[57] Max Loehr, *Ritual Vessels of Bronze Age China* (New York: Asia House Gallery, 1968), pp. 98-100.

[58] 李永迪等，〈從孝民屯東南地出土陶範談對殷墟青銅器的幾點新認識〉，頁 52-63；岳占偉、岳洪彬、劉煜，〈殷墟青銅器的鑄型分範技術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殷墟新出土青銅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8），頁 33-54。

[59] 筆者稱此為鳥喙，原因是在另外一種器型，梟形卣的演變中，鳥喙部分到晚期變成上翹鳥喙。而且在某些具有上翹鳥喙的卣蓋，有時鳥喙會與卣蓋上的饕餮紋整合成兩鳥首背對背的形象。

[60] 廉海萍，〈陝西寶雞石鼓山西周墓葬 M3「戶」組銅器製作地探討〉，發表於美國芝加哥大學、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寶雞青銅器博物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合辦，「寶雞戴家灣、石鼓山與安陽出土青銅器及陶範」學術研討會（北京：美國芝加哥大學北京中

顯示此種鳳鳥紋卣，包括大出戟鳳鳥紋卣是在殷墟生產的，它們並不是西周工匠的新發明。本節收集具有類似特徵的鳳鳥紋卣，共得23件，依據鳥紋的類型，犧首的角形、出戟與否，提梁中段是否有裝飾，以及銘文內容進行排比分析。年代較早者先敘述，考古出土品先於傳世者，所有器都會顯示於圖版1，並且在表1中列出相關資料以簡化討論。

出土的脈絡最清楚，時代最早者為河南安陽殷墟郭家莊 M160 出土的〈亞址卣〉（NA0224，圖版 1：1），歸屬於殷墟 III 期。[61] 銘文：「亞址」，為商貴族族徽，器蓋同銘。[62] 主紋飾為第 I 類鳳鳥紋，提梁兩端為茸角（或稱酒瓶形角）犧首。與它相同的有 1965 年輝縣褚丘出土的〈且辛卣〉（04821，圖版 1：2），現藏新鄉市博物館，銘文「且辛」，為受祭者名號，器蓋同銘。與〈亞址卣〉在外觀上的差別僅在於直棱紋較疏，以及次要紋飾帶的鳥紋細節不同。[63] 傳世者有美國 Worcester Art Museum 典藏一件〈舌卣〉（04767，圖版 1：3），[64] 銘文一字「舌」，器蓋同銘，為商貴族族徽，此器與數件帶有「舌」銘文的銅器據傳為殷墟一座墓出土的。[65] 帶有族徽「舌」的銅器亦大量出土於河南滎陽小胡村，小胡村墓地是舌氏的族墓地。[66]〈舌卣〉與〈亞址卣〉的差別在於圈足的紋飾為夔龍紋。第四件為美國明尼亞波里斯藝術博物館（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的〈亞卣〉（未收，圖版1：4），銘文三字「亞」，可能是族徽加私名。這件卣與〈亞址卣〉的差別亦僅在次要紋飾帶。[67]

心；寶雞：陝西省考古研究院，2015.11.30-12.04）。「安陽區塊（block）」指的是在三維或二維圖中，樣本屬於特定區域，如安陽的樣本數據會集中在一起故稱區塊。

[61] 有銘文的銅器，器名後括號內的號碼為「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的編碼。

[6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安陽殷墟郭家莊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頁 89-93，彩版 9。

[63] 河南出土商周青銅器編輯組編，《河南出土商周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頁 290，No. 367。

[64] Phyllis Ackerman, *Ritual Bronzes of Ancient China* (New York: The Dryden Press, 1945), plate 8; Robert W. Bagley,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470, fig. 87.3.

[65] 董作賓，〈王孫舌考〉，《董作賓先生全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77），頁 1177-1185。

[66] 賈連敏等，〈河南滎陽小胡村墓地商代墓葬發掘簡報〉，《華夏考古》2015年1期：3-13, 2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滎陽小胡村商周墓地》（北京：中華書局，2022）。

[67]「未收」指「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尚未收錄。此器見於明尼亞波里斯藝術博物館網站：“You wine vessel” (https://collections.artsmia.org/art/17432)。

與〈亞址卣〉有進一步差異者如湖南寧鄉黃材王家墳出土的〈戈卣〉（04707，圖版 1：5），銘文一字「戈」，為商貴族族徽，器蓋同銘。主紋飾仍屬第 I 類大鳳鳥紋，不過提梁兩端為羊角犧首，羊角呈片狀展開。[68] 同樣主裝飾者還有兩件，一為《博古圖》著錄的一件〈𢦒父癸卣〉（04991，圖版 1：6），銘文「𢦒。父癸」，器蓋同銘，「𢦒」為族徽，銘文包括族徽、親稱與日干，為受祭者名號。[69] 由於出版於舊著錄線圖，紋飾細節不明。但推測主要兩種細節與〈戈卣〉同。提梁的裝飾為蟬紋而非夔龍紋，且圈足為素面。臺北私人收藏一件〈亞貘卣〉（未收，圖版 1：7），銘文「亞貘」，器蓋同銘。與前述其他鳳鳥紋的差別主要在提梁表面的裝飾，原本單一的夔龍紋變成連續背朝背成對夔龍，彎曲的兩尾部中夾著一只蟬紋。[70] 此外紐約的 Eskenazi 拍賣公司曾經拍賣過一件〈豫卣〉（未收，圖版 1：8），後為香港御雅居所收藏，其銘文「豫賜貝，用作父乙尊彝。鳥」，器蓋同銘，「鳥」為商貴族族徽，作器者「豫」，受祭者為「父乙」。〈豫卣〉主要兩種裝飾與〈戈卣〉相同，提梁的裝飾亦為蟬紋。[71]

寶雞戴家灣出土的「鼎氏禁組」的大〈鼎卣〉（04745，圖版 1：9）與小〈鼎卣〉（04746，圖版 1：10），銘文「鼎」一字，「鼎」為商貴族族徽。[72] 整體而言朝著更為「炫麗」的方向發展，主要紋飾為第 I 類大鳳鳥紋，犧首則為巴掌形角犧首，提梁紋飾既非夔龍紋，亦非蟬紋，而是尾部連結的反向顧首龍紋，且扉棱更加凸出。日本神戶白鶴美術館藏的〈直棱紋鳳鳥紋卣〉（圖版 1：11），與兩〈鼎卣〉主要裝飾均相同，但提梁的轉彎處還增加了立體的牛首。[73]

---

[68]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4・商4》（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頁 158-159，No. 160-161。

[69] 北宋・王黼等，《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明翻元至大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卷 9，頁 7。

[70] 朱鳳瀚，〈亞貘卣〉，《璀璨青銅：德能堂藏吉金》（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8），頁 62-67，No. 11。

[71] Daniel M. Eskenazi, *Eskenazi: Ancient Chinese Bronzes and Sculpture* (London: Eskenazi, 2005), pp. 10-13. 此器後收入香港御雅居，見洛菲編輯，《吉金御賞（五）：商邑翼翼——商代青銅器》（香港：御雅居，2016），頁 60-67；張懋鎔，〈豫卣研究〉，洛菲，《吉金御賞（五）》，頁 68-71。

[72] 這兩件卣的圖像見於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網站："Ritual Wine Container (Yu) with Lid"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2166)；"Ritual Wine Container (Yu) with Lid and Pedestal"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2165)，上面有這兩件銅器各面照片與詳細的相關資訊。

[73] 白川靜監修，中村純一編集，《白鶴英華》（神戶：白鶴美術館，1978），頁 24-25，No. 6。

第 II 類大鳳鳥紋比起第 I 類的視覺性更強，而且器有絕對的正、側面性——就是兩個大鳳鳥都正對扉棱的那一面為正面，它的提梁終端的犧首以及中段的牛首都在同一面。具有第 II 類大鳳鳥紋的卣自簡至繁包括寶雞石鼓山 M3K3 出土的〈川卯卣〉（NB1703，圖版 1：12），[74] 銘文「川。卯」兩字，「川」可能為商貴族族徽，「卯」或為私名。其鳳鳥紋屬於第 II 類，提梁兩端飾以羊角犧首。寶雞石鼓山 M3K3 出土的〈單父丁卣〉（NB0832，圖版 1：13），銘文「單。父丁」，器蓋同銘，[75]「單」為商貴族族徽。主紋是第 II 類鳳鳥紋，提梁兩端亦為羊角犧首。傳世器有上海博物館藏〈冉父丁卣〉（05071，圖版 1：14），銘文「冉。父丁」，器蓋同銘。「冉」為商貴族族徽，受祭者「父丁」。其鳳鳥紋屬第 II 類，提梁兩端飾以羊角犧首，陳佩芬訂為商代晚期。[76] 現藏於日本東京出光美術館的「寧女母日辛」器，共七種器物，銘文皆同，其中的〈寧女母日辛卣〉（NA1790，圖版 1：15），銘文「寧女。母日辛」，器蓋同銘。作器者寧女，受祭者母日辛，明顯是商貴族。鳳鳥紋屬於第 II 類，提梁上的犧首雙卷角，提梁飾以連續的菱形紋，樣式比較簡單。部分紋飾帶的鳥紋以夔龍紋代替，時代訂為晚商。[77] 此組器，有爵、觚、卣、方彝、方尊、圓尊以及簋，方尊與方彝可能有配套的關係。[78] 有助於我們理解殷墟末的器物組合。形制更繁瑣者為寶雞石鼓山 M3K3「戶氏禁組」的兩件〈戶卣〉，大〈戶卣〉（NB0830，圖版 1：16）高 50 公分。[79] 小〈戶卣〉（NB0831，圖版 1：17）高 36 公分，形制與紋飾皆同，器蓋銘文皆一字「戶」，「戶」為商貴族族徽。主要紋飾在器之垂腹，[80] 飾以第 II 類鳳鳥紋，具有巴掌形角的犧首。蓋的兩側上翹的「鳥喙」更為突出，且其外緣裝飾著半浮雕的牛首。

下一步的發展是在大約 45 度角的方向延伸出四個大出戟，這組器沒有出土品，首例是上海博物館典藏的〈四出戟鳳鳥紋卣〉（圖版 1：18），主要紋飾為

---

[74]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周野鹿鳴》，頁 164-165，No. 41。

[75]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周野鹿鳴》，頁 158-161，No. 39。

[76] 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夏商篇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 323-325，No. 157。

[77] 出光美術館編，《中國の工藝：出光美術館藏品圖錄》（東京：平凡社，1989），No. 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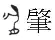
[78] 出光美術館，《中國の工藝》，頁 243。

[79]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周野鹿鳴》，頁 236-239，No. 107。

[80]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周野鹿鳴》，頁 240-242，No. 108。小卣與小禁合體見頁 246。

第 II 類鳳鳥紋，提梁兩端為具有巴掌形角的犧首。此件器物出土地點不詳，但因與波士頓和弗利爾的兩件出戟卣形制相同而被訂為西周早期。[81] 其次，《陶齋吉金錄》著錄一件〈婦⿵門豩卣〉（05350，圖版 1：19），銘文「婦⿵門豩作文姑日癸尊彝。 」，[82] 此件卣的器身與上海博物館藏的出戟卣器身完全相同，但蓋的樣式不同，側邊為直棱紋，頂面則為鳥紋，頂蓋有圓形捉手。同樣出土地點不詳，《殷周金文集成》訂為商代晚期。波士頓的小〈四出戟鳳鳥紋卣〉（圖版 1：20）以及弗利爾的大〈四出戟鳳鳥紋卣〉（圖版 1：21），外觀相同，無銘文。主要裝飾為第 II 類鳳鳥紋，提梁兩端為具有巴掌形角的犧首。在四個大出戟的外側以及蓋兩側的「鳥喙」外緣，都裝飾著半立體的牛首。

日本奈良國立博物館也收藏了一件〈婦⿵門豩卣〉（未收，圖版 1：22），銘文內容與《陶齋》著錄的〈婦⿵門豩卣〉相同，但行款不同。此器可謂弗利爾〈四出戟鳳鳥紋卣〉的「巴洛克化」，意思是基本元素均類似，但所有的細節都變得更花俏、更誇張與更富戲劇性。以扉棱為例，曲度變得誇張，每一個凸起的面都裝飾一個牛角獸面，而其牛角獸面也變得風格化，與前述比較寫實的牛首不同，但勉強可以看出是內捲角。器身的鳳鳥變得更立體，鳥首昂起，頭冠基本上為几字形角羽冠，但末端開出巴掌狀的「花」，可另歸為第 III 類鳳鳥紋。出戟上也不再是簡單的兩道平行弦紋，而是將出戟做成獸首鳥身，其「垂」的部分為鳥尾。此器通高超過 51 公分，從以上大小卣成套的尺寸比例看來，應是大小套卣中之大者，另或有小卣與小禁，以及與之搭配的尊或方彝。它們可能放置在一個大禁上而形成宏偉的一套器物。此器的時代被訂為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83]

除了以上完整件之外，河南信陽溮河港撈出一群青銅器，其中有一件〈 卣蓋〉（NA0304，H=19.8 cm，圖版 1：23），銘文「既冊。肇貯。用作父乙寶尊彝」，僅存蓋但極可能也是此種直棱紋鳳鳥紋卣，器身亡逸。比較以上所有蓋，這件蓋比較高，扉棱十分誇張，一勾一翹都很分明。蓋頂紋飾有三層，上、下皆第 I 類鳥紋，中層為直棱紋。蓋緣四分，兩側有上翹的「鳥喙」，蓋緣的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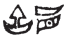
---

[81] 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西周篇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 180-181。

[82] 清・端方，《陶齋吉金錄》（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正白旗滿洲端方石印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卷 2，頁 37。

[83] 奈良國立博物館編集，《阪本コレクション中國古代青銅器》（奈良：奈良國立博物館，2002），頁 32-33；奈良國立博物館編集，《奈良國立博物館藏品圖版目錄・中國古代青銅器篇》（奈良：奈良國立博物館，2005），No. 69，頁 32-34，解說頁 132。

紋飾為鳥紋，但尾部變化出現一個獸首，變成前鳥後獸的怪物。[84] 由於沒有器身，難以分類。以往都將這組既冊族氏器訂為西周早期，而且區分所謂「父乙組」與「父丁組」，其實「父丁組」的族徽各不相同，實無法成組。而「父乙組」中〈疒父乙卣〉（NA0299）與其他「父乙」組器無關，應當排除。其餘有七件作器者為「晨」，包括一簋（NA0298）、一甗（NA0300）、兩尊（NA0301 尚可、一不完整）、一觥（只存蓋首，根據鑄造特徵與銅器顏色被認為屬於此組，或與尊配套）、兩角（NA0302，NA0303），多為酒器。〈 卣蓋〉的作器者非晨，但受祭者同為父乙。晨與 為同輩，同時作器給父乙，視為同組是合理的。這組器的製作品質極高，只有晚商的大邑商與西周早期的成周鑄銅作坊有這種功力。不過，西周早期能夠鑄造品質如此高的酒器的商遺貴族應當有更冗長的銘文記述自己的功績。筆者認為此器當為直棱紋鳥紋卣，而且可能是大邑商作坊鑄造。此器具有極強的紀念性，很可能是禁組上的三器之一，是大卣。筆者推測為大邑商鑄造的銅器有一種驗證的方式，因為此器的左右兩個鳥喙同樣有一側斷裂，露出芯土，可以與大〈戶卣〉一樣，進行芯土的檢測，以得知是否為安陽製造。如果是安陽製造，那麼以上觀點就有極大的可能。

以上鳳鳥紋卣總共 23 件（詳表 1），三種尺寸，一種作為禁上的大卣，尺寸約為 50 公分左右甚至更高。一種作為禁上的小卣，尺寸為 35 公分左右。加上約 15~20 公分的小禁，與方彝或尊並觀能保持尺度上的平衡。另一種是單獨的小卣，尺寸約為 25 公分上下。23 件中有銘文者 19 件，銘文內容基本上都是商貴族的族徽或日名，顯示它們的贊助者都是商貴族。根據以上討論，此類卣有相當清楚的發展軌跡，最基本的形制包括〈亞址卣〉、〈戈卣〉、〈且辛卣〉、〈舌卣〉、〈豫卣〉、〈戉父癸卣〉、與〈亞卣〉屬於此類，鳳鳥紋是第 I 類，犧首是一般的茸角、羊角或虎耳犧首，也就是比較傳統的殷墟式犧首。接著往兩個方向發展，基本上都更為「炫麗」，一是鳳鳥紋發展成第 II 類，但犧首不變，包括〈冉 父丁卣〉、〈寧女母日辛卣〉、〈單父丁卣〉、〈川卯卣〉，確定看面在雙鳳鳥面對的一側。另一個方向是犧首發展成誇張的巴掌形角犧首，例如白鶴〈鳳鳥紋卣〉、大、小〈鼎卣〉，同樣是確定正面，依賴的是誇張的犧首。這

---

[84] 歐潭生，〈河南信陽縣溮河港出土西周早期銅器群〉，《考古》1989 年 1 期：10-19；花原，〈信陽出土商周青銅器銘文介紹〉，《中原文物》1991 年 2 期：94-104；李伯謙主編，《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10・河南下》（北京：龍門書局，2018），頁 290，No. 302。

兩種改變接著合流，鳳鳥紋為第 II 類，同時有誇張的巴掌形角犧首，大、小〈戶卣〉就屬此類。然後在前述特徵上，在直棱紋的中段加上出戟，弗利爾、波士頓與上海的三件〈四出戟鳳鳥紋卣〉與陶齋的〈婦闋卣〉屬之。終極發展是鳳鳥紋變成第 III 類，所有特徵皆朝誇張方向發展，奈良的〈婦闋卣〉是唯一的例子。

奈良〈婦闋卣〉顯然是這類出戟卣中年代最晚者，其年代至關重要。「婦闋」作器且銘文相同者，包括奈良這件加上過去未著錄者，總共有 10 件，顯然是同一作器者婦闋的器物，受祭祀的是她的「姑」，也就是丈夫的母親，日干為癸。同銘文的這套器，除了奈良的出戟卣以外，都被訂為商代晚期。筆者認為，所有的婦闋器都應屬於殷墟末期，也就是說，以上討論的所有鳳鳥紋卣，基本上都是殷墟 III 期偏晚到 IV 期間安陽製造的。婦闋組器物雖然殘缺不全，但是可以讓我們一窺殷墟末期器物組合之一隅，其中食器有一甗一鼎。其餘均為酒器，包括兩爵、兩袋足斝、兩卣、一罍（存蓋）。婦好墓中所見的最高級組合，有肩尊、罍、斝搭配十件的爵與觚。但婦闋組可能有一套禁組，兩件袋足斝、兩件卣，以及多件爵，可惜殘缺不全，難窺全貌。根據奈良〈婦闋卣〉的年代研判，上述 23 件鳳鳥紋卣都是殷墟末期安陽地區作坊的產品，其變化都在殷墟 III 到 IV 期之間。殷墟 III 期晚段只是開端，殷墟 IV 期才是全盛，而且紋飾與造型逐漸邁向更「炫麗」或更高的「紀念性」演變。

另外從器物演變的角度看，鳳鳥紋卣具有相當類似的特徵，有很清楚的發展方向，從相對的素樸「古典」到「巴洛克化」，其後突然終止，沒有更進一步地複雜化或退化的現象。這種演化突然地結束，可能與重大政治事件發生——也就是商王朝的首都陷落有關（以下有多種器物有相同狀況）。出土的狀況有三類：一為安陽及晚商文化範圍出土，但缺乏最晚期的器物；二為關中地區，特別是寶雞附近出土，都是殷墟最晚期的器物；三則是南方出土。寶雞戴家灣與石鼓山出土的三套禁組都出自「典型分器墓」，也就是說，它們的入葬年代都在西周克商（1046 BCE）以後 25 年之內。如果此種器物組合，在西周早期前段如此受重要貴族的喜好，為何突然消失？筆者認為最能夠合理解釋的是三個禁組皆為「分器」所得，其特殊之處是它們在分器封賞的時候並未被拆開，分別賞賜，而保留了原來的成套器物。這樣的厚賞，只有功勞最大的貴族才能得到，比較晚商到西周早期的墓葬青銅禮器，一墓中出土 28 件青銅禮器已經是相當高級的貴族，寶雞石鼓山 M3 墓主得到如此厚賞，理所當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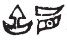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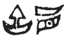
由於鼎組與戶組有單字的銘文，不少學者藉此推測墓主，筆者以為在方法上都相當牽強，此處不擬討論。關於鼎氏與戶氏，查詢「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可看出，鼎氏為活躍於商代晚期的商貴族族氏，鼎氏的銅器出現在周人的大本營，說明他們為克商戰役以後被劫掠者。[85] 戶氏的資料較少，「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中著錄兩件〈戶卣〉（04858，04859），年代確定為商代晚期。還有一件出土於寶雞賈村鄉靈龍村的〈戶當盧〉（12082），要說戶氏為 M3 墓主的族氏則無法解釋另兩件被訂為晚商的戶器，以及戶禁組被科學檢驗認定是安陽製造的事實。但如果戶氏為被劫掠的商貴族，則器物出土於關中亦合理。整體評估，戶氏亦當為商貴族族氏，是克商戰役被劫掠的對象，與墓主無關。

總結地說，分析鳳鳥紋卣所得現象如下：一、23 件中 19 件有銘文，都是商貴族的名號元素；二、器類最早在殷墟 III 期出現；三、在安陽孝民屯青銅器作坊發現模或範；四、科學檢驗一件關鍵器的芯土，發現芯土的微量元素等分析圖均落在「安陽區塊」，而非「關中區塊」或「侯馬區塊」；五、此種裝飾炫麗的卣突然停止不再演化。以上現象都說明一件事情，這些器物雖然有部分出土於西周初期的墓葬，但是它們其實是殷墟末期在安陽大邑商作坊製作，因為「分器」才被分別帶到關中。由於這些卣在所有卣當中屬於「炫麗風格」，還有更多的卣屬於「保守風格」，從跡象判斷，以直棱紋加鳳鳥紋，搭配其他紋飾是殷墟末期青銅器創造紀念性（monumentality）的配方。

---

[85] 用「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查釋文「鼎」，時代：商代晚期或西周早期，包括：〈鼎父己尊〉（05648，05649）、〈鼎父乙爵〉（08419，08420）、〈鼎父丙爵〉（08439）、〈鼎父己爵〉（08566）、〈鼎父辛爵〉（08638，08639，08640）。查釋文「鼎」，時代：商代晚期，包括：〈鼎方彝〉（09837，NA1815）。查釋文「鼎」，時代：西周早期，包括：〈鼎鼎〉（01188，05649）、〈鼎觚〉（06724）。以上僅取銘文中的「鼎」字與〈鼎卣〉和〈鼎尊〉相同者，另尚有鼎字寫法不同者未計。

表 1：鳳鳥紋卣

器名	鳳鳥紋	犧首	出戟	器高 (cm)	銘文	出土／現藏／著錄
1.〈亞址卣〉	I	茸角	無	35.8	亞址	河南安陽郭家莊 M160 出土
2.〈且辛卣〉	I	茸角	無	25.5	且辛	河南輝縣褚丘出土。新鄉市博物館，河南新鄉
3.〈舌卣〉	I	茸角	無	24.5	舌	Worcestor Art Museum, Worcestor 傳安陽殷墟一座墓葬出土（王孫舌墓）
4.〈亞卣〉	I	茸角	無	24.8	亞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 Minneapolis
5.〈戈卣〉	I	羊角	無	37.7	戈	湖南寧鄉黃材出土。湖南省博物館，湖南長沙
6.〈㦰父癸卣〉	I	羊角	無	36.2	㦰。父癸	《博古圖》9.7
7.〈亞貘卣〉	I	羊角	無	27	亞貘	德能堂，臺北
8.〈豫卣〉	I	羊角	無	40.5	豫賜貝，用作父乙尊彝。鳥	Eskenazi, New York 拍賣公司。後由香港御雅居收藏
9.〈鼎卣〉	I	巴掌角	無	47	鼎	寶雞戴家灣出土，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10.〈鼎卣〉	I	巴掌角	無	34.3	鼎	寶雞戴家灣出土，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11.〈直棱紋鳳鳥紋卣〉	I	巴掌角	無	34.5	－	白鶴美術館，神戶
12.〈川卯卣〉	II	羊角	無	26	川。卯	寶雞石鼓山 M3K3 出土，寶雞青銅器博物院，陝西寶雞

器名	鳳鳥紋	犧首	出戟	器高（cm)	銘文	出土／現藏／著錄
13.〈單父丁卣〉	II	羊角	無	39	單。父丁	寶雞石鼓山 M3K3 出土，寶雞青銅器博物院，寶雞
14.〈冉 父丁卣〉	II	羊角	無	35.3	冉 。父丁	上海博物館，上海
15.〈寧女母日辛卣〉	II	羊角	無	22.3	寧女。母日辛	出光美術館，東京
16.〈戶卣〉	II	巴掌角	無	50	戶	寶雞石鼓山 M3K3 出土，寶雞青銅器博物院，寶雞
17.〈戶卣〉	II	巴掌角	無	36	戶	寶雞石鼓山 M3K3 出土，寶雞青銅器博物院，寶雞
18.〈四出戟鳳鳥紋卣〉	II	巴掌角	有	27	—	上海博物館，上海
19.〈婦闌卣〉	II	巴掌角	有	35.2	婦闌作文姑日癸尊彝。	《陶齋吉金錄》2.37
20.〈四出戟鳳鳥紋卣〉	II	巴掌角	有	35.2	—	Museum of Fine Art, Boston
21.〈四出戟鳳鳥紋卣〉	II	巴掌角	有	50.7	—	Freer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
22.〈婦闌卣〉	III	巴掌角	有	51.4	婦闌作文姑日癸尊彝。	奈良國立博物館，奈良
23.〈 卣蓋〉			無		既冊。 肇貯用作父乙寶尊彝	河南信陽溮河港出土，信陽博物館，信陽

四・直棱紋觶（圖版 2）

如果以上這些直棱紋與鳳鳥紋裝飾的卣都是商代晚期大邑商作坊的產品，那麼同樣以直棱紋與鳳鳥紋組合為主要裝飾的器類除了鳳鳥紋卣以外，還有直棱紋鳳鳥紋觶，其紋飾安排的方式與直棱紋鳳鳥紋卣有密切關係，可以接續討論。此種帶有直棱紋的觶從器形的特點可以分為兩類：一種是口沿方唇有蓋，另一種則是薄唇無蓋。從紋飾看，器身紋飾帶橫向有兩道、三道與四道幾種。以下我們以紋飾道數的多寡，由多至寡敘述，並以考古出土者為先。

瑞典斯德哥爾摩東方博物館藏一件〈直棱紋鳳鳥紋觶〉（H_b=13.3 cm，圖版 2：1b），由四扉棱將器垂直四分，扉棱分成足、腹、頸三段，各段間斷開。主紋飾帶在垂腹部為前節所述之第 I 類鳳鳥紋，其上為直棱紋，直棱紋之上為鳥紋，鳥紋之上敞口部為蕉葉紋。圈足飾以鳥紋。[86] 梅原末治首先指出這件器的蓋就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安陽殷墟西北崗 M2046 發掘出的一件〈直棱紋鳳鳥紋觶蓋〉（H_c=6.3 cm，圖版 2：1）。[87] Bagley 認為這件器＋蓋的年代應與前述〈舌卣〉相當。[88] 陳芳妹與石美德再進一步的追究，仔細量度以後，確定器與蓋的尺寸相合，為同一件觶的器與蓋。[89] 這件蓋同樣有四道扉棱將蓋四分，中間一短柱，頂部有蕈菇形囧紋捉手。紋飾下層為鳥紋，上層直棱紋，由於各面直棱紋均與鳥紋帶垂直，遂產生四組交角。蓋與器以子母口相接。[90]

柏林東方藝術博物館藏一件〈萬父丁觶〉（未收，H=13.2 cm，圖版 2：2），銘文目視不清，根據 X 光片確定為「萬。父丁」，萬為商貴族的族徽。主紋飾帶在垂腹部，為第 II 類鳳鳥紋，其上為直棱紋，再上為第 II 類鳳鳥紋帶，鳥紋之上敞口部為蕉葉紋帶。圈足為第 II 類鳳鳥紋帶。[91] 以上兩件具有四道紋飾

---

[86] Ch’en Fang-mei (陳芳妹) and Mette Siggestedt (石美德), “The Collection of Shang Period Bronzes in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a Catalogu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77 (2009): 102-103.

[87] 梅原末治，《河南安陽遺寶》（京都：小林寫真製版印刷所，1940），頁 40。

[88] Bagley,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p. 471, figs. 87.4 & 87.5.

[89] Ch’en and Siggestedt, “The Collection of Shang Period Bronzes in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90] 李永迪等，《殷墟出土器物選粹》（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9），頁 380。

[91] Herbert Butz, *Frühe chinesische Bronzen aus der Sammlung Klingenberg* (Berlin: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1993), pp. 56-57, 74.

帶。這兩件顯然與前述鳳鳥紋卣關係密切，只是觶的器形較小，所以在四分之一圈的空間中，僅容得下一隻第 I 或尾部縮短第 II 類鳳鳥紋，而卣的器形較大，可以容得下背對背兩隻第 I 或全形未簡化的第 II 類鳳鳥紋。以上兩件為直棱紋觶中紋飾較複雜者，前者年代為殷墟 III 期，後者則屬殷墟 IV 期。

山東滕州前掌大 M38 出土一件〈 保 觶〉（NB0379，H_b=13.7 cm，H=18.9 cm，圖版 2：3），器銘「羽鳥 保母丁」，蓋銘「 保 」。器口方唇，有子母口蓋。腹部上段飾以直棱紋，下段主紋飾為第 IIb 類鳳鳥紋，鳥的角為酒瓶形角。頸部為鳥紋，圈足為夔龍紋。蓋頂為六瓣南瓜形。蓋心紋飾為斜向施作的直棱紋，因此產生了四組角。[92] 此件有三紋飾帶。蓋有兩扉棱，但器沒有扉棱，且銘文不同，卻相關。推測可能是同家族的兩件器被配湊在一起。

與前述三件相關的直棱紋觶考古出土者包括：孝民屯南地 M907 出土兩件直棱紋觶，第一件〈直棱紋觶〉（M907:11，H=19 cm，圖版 2：4），高圈足，有蓋，子母口。垂腹部飾以直棱紋，頸部為饕餮紋帶，其上為蕉葉紋。圈足飾以雲紋。蓋有一蘑菇形鈕，上飾囧紋。蓋頂飾以放射狀的直棱紋。時代訂為殷墟 III 期或 IV 期。[93] 第二件〈直棱紋觶〉（M907:6，H=18.7 cm，圖版 2：5），高圈足方唇，有子母口蓋。垂腹部飾以直棱紋，頸部為第 I 類鳳鳥紋，以上為蕉葉紋。圈足飾以獸面紋。頂蓋有一蘑菇形鈕，飾以囧紋。蓋面飾以順向的直棱紋。時代訂為殷墟 III 期或 IV 期。[94]

日本金澤東馬三郎舊藏，著錄於梅原末治的《日本蒐儲支那古銅精華》與林巳奈夫的《殷周時代青銅器の研究》的一件〈羞觶〉（06028，H=18.6 cm，圖版 2：6），銘文一字「羞」，器內底、外底，蓋內同銘，蓋銘陽文。[95] 器形紋飾與前兩器相近，器身垂腹部飾以大片直棱紋，頸部飾以鳥紋，頸部以上飾以蕉葉紋，圈足飾以夔龍紋。紋飾主體突出，無底紋。以上三件的蓋都飾以直棱紋，但

---

[9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滕州前掌大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頁 295, 297，圖版 121: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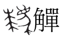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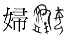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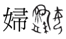
[9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452，圖版 74，圖 71.1。

[9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青銅器》，頁 473-474，圖版 200；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1969-1977 年殷墟西區墓葬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9 年 1 期：27-146，圖版 1-20。

[95] 梅原末治，《日本蒐儲支那古銅精華・二》（大阪：山中商會，1959），No. 120；林巳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4），觶 120。

處理的方式不同，孝民屯 M907:6 的蓋從上往下看，是同一方向的直棱紋。孝民屯 M907:11 的蓋則是向心的直棱紋，中心部窄，邊緣部寬。〈羞觶〉則分成四象限，每一象限各自拉平行線，產生四組交角。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一件〈直棱紋鳥紋觶〉（H=13.5 cm，圖版 2：7），方唇，圈足墊高，推測原有蓋，已失。垂腹飾以直棱紋，頸部飾以第 I 類鳳鳥紋，以上飾以蕉葉紋。圈足則為夔龍紋。[96] 日本千石唯司舊藏一件〈直棱紋鳥紋觶〉（H=13 cm，圖版 2：8）。[97] 與故宮博物院所藏紋飾相同，但扉棱只有一對，在器的前後。《流散歐美殷周有銘青銅器集錄》著錄一件〈戉箙觶〉（06166，H=13.6 cm，圖版 2：9），銘文「戉箙」，[98] 為商貴族族徽。器敞口方唇，腹部飾以直棱紋，頸部飾以鳥紋，圈足亦飾以鳥紋。瑞士玫茵堂收藏的一件〈直棱紋觶〉（H=12.4 cm，圖版 2：10）。[99] 頸部飾以鳥喙下勾的鳥紋，頸部以下至圈足為較密的直棱紋，圈足飾以虎紋。以上七件可以算是前三件的「降階版」，因為沒有腹部下半段的鳳鳥紋，其視覺效果也就不如前三件。而〈戉箙觶〉因為沒有頸部的蕉葉紋，鳥紋也缺乏地紋，視覺效果也不如故宮與千石舊藏的觶。

寶雞竹園溝 M7 出土〈觶〉（NA0819，H=12.1 cm，圖版 2：11），銘文「 作父己彝，㝨冊」，[100] 薄唇，器身有兩段紋飾，上段第 I 類鳳鳥紋，下段包括垂腹為直棱紋，圈足亦為第 I 類鳳鳥紋。寶雞石鼓山 M3K3 出土〈直棱紋觶〉（H=13.5 cm，圖版 2：12），薄唇，器身有兩段紋飾，上段第 IIa 類鳳鳥紋，鳥首的角不是巴掌形角，而是酒瓶形角。下段包含垂腹為直棱紋，圈足亦為第 IIa 類鳳鳥紋。[101]《長安獲古編》著錄一件劉喜海舊藏的〈冊婦觶〉（06428，H=13 cm，圖版 2：13），[102] 銘文「⿸广寿冊。婦」，腹部為直棱紋，頸部與圈足為鳳鳥紋。《陶齋吉金錄》著錄〈告田觶〉（06191，圖版 2：14），銘文「告田」為商貴族族徽。[103] 器的腹部為直棱紋，頸部一圈紋飾，上下兩道連珠紋，中間夾著一道紋飾，線圖上難以辨識，由其他同類器物觀察，應當是一種鳳鳥紋。圈足尚有弦紋。「⿸广寿冊」與「告田」都是晚商重要族氏，兩個族氏有很多青銅器成為周人的戰利品。

---

[96] 樋口隆康監修，飯島武次編集，《故宮博物院・第十二卷・青銅器》（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98），頁 20-21，圖版 11。《故宮商代青銅禮器圖錄》未收，應當是從一般斷代，訂為西周早期。

[97] 難波純子（內田純子），《中國王朝の粹》（姬路：北星社，2004），頁 30-31。筆者曾在紐約拍賣公司見到《中國王朝の粹》的第一件〈日丙觥〉，顯示千石氏在出清他的青銅器收藏，故云「舊藏」。

[98] 劉雨、汪濤，《流散歐美殷周有銘青銅器集錄》（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頁 176。

[99] Tao Wang (汪濤), *Chinese Bronzes from the Meiyintang Collection* (London: Paradou Writing, 2009), pp. 44-45, No. 18.

[100] 陳昭容，《寶雞戴家灣與石鼓山出土商周青銅器》，頁 223。

[101] 陳昭容，《寶雞戴家灣與石鼓山出土商周青銅器》，頁 220-223。

14 件中 7 件有銘文，全部都是商貴族的族徽、日名、親稱等商人名號系統。器類在殷墟 III～IV 期出現，然後突然停止不再演化。筆者認為這些直棱紋鳳鳥紋觶與直棱紋鳳鳥紋卣相同，都是晚商在安陽殷墟製造的。由於進入周王朝後禮制上的改變，觶這種器形在西周早期也起了變化，器形變高瘦，也不再有蓋。[104] 所以此種直棱紋鳳鳥紋觶或其他的直棱紋觶，沒有進一步演化或改變，像時空膠囊一般，時代都鎖定在殷墟末期。

五‧四耳乳釘紋簋與相關簋形器（圖版 3）

陝西寶雞紙坊頭 M1 出土的〈四耳乳釘紋簋〉（H=23.8，W=40 cm，圖版 3：1）器身橫分為三段，上下段皆飾以乳釘紋，中段飾以直棱紋。垂直方向則四分，有四個巨大的耳。圈足高而厚實，分兩段，下段素平垂直，上段略外侈與下段相接，裝飾了四對面向扉棱的夔龍紋。四巨耳是此種簋最重要的特徵，其主體其實與一般簋耳相同，為一馬蹄鐵形耳附加在簋身上，在彎曲處上有立體的牛首，耳下有一方形的「垂」。其特殊之處是立體的牛首直立，在兩角之間以平板連結，在此一平板的正反兩面皆有浮雕牛首。大牛首之下有一個平台，平台之

---

[102] 《長安獲古編》其實一名兩書，分別是劉喜海（1793-1852）藏器的目錄與圖錄。此書的混亂應該與劉喜海在編輯藏器圖錄時驟逝有關。圖錄有兩卷，僅有劉氏藏器的三分之一，劉氏家族出版後劉鐵雲再補。另藏器目錄一卷，錄完整器名與相關尺寸，胡琨編輯，閒宥出版的。本文的線條圖是從兩卷的圖錄來的，因為只有圖沒有其他資料，故尺寸是根據目錄記載五寸六分計算的。劉喜海，《長安獲古編》（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北京劉鐵雲補刊東武劉氏原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卷 1，頁 40；劉喜海藏，胡琨編，《長安獲古編》（民國三年〔1914〕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庚冊觶」條目。

[103] 端方，《陶齋吉金錄》卷 3，頁 31。

[104] 針對觶的演變，必須要對所有紋飾的觶進行更有系統的分析討論，超出本文討論範圍，此不具論。

下，又有一牛首。耳垂的兩側，亦各飾以一牛首。耳身以凹線紋刻出鳥羽和鳥尾。[105] 這就是「六牛首耳」——簋形器中最誇張的一種耳。本來乳釘紋與直棱紋簋是平淡無奇的，但是加上四個誇張的耳以後，一方面體量加大，四面都可以見到耳的正面，造型十分搶眼。

類似器形 1926～1928 年在寶雞戴家灣也出土過，現藏弗利爾藝廊的〈四耳乳釘紋簋〉（H=23.5，W=36.8 cm，圖版 3：2），器口方唇，器身橫分三段，上段乳釘紋，中段直棱紋，下段亦乳釘紋，乳釘紋十分突出，每枚乳釘的形狀幾乎呈砲彈形。垂直方向則八分，有四個巨大的耳，耳與耳中間，在乳釘紋的段落，又有厚實的扉棱（此點與紙坊頭者不同）。圈足高，厚實，分兩段，下段素平垂直，有八個長方形的扉棱。上段略外侈與下段相接，裝飾了八對向扉棱的夔龍紋。四耳為馬蹄鐵形耳附加於簋身，在彎曲處上有立體的牛首，下有一方形的「垂」，垂外側作成波浪形，左右兩面各飾以牛首。大牛首直立，兩角之間以平板連結，在此一平板上，正反兩面皆有浮雕牛首。大牛首下，耳的側面亦飾以一牛首。耳垂的兩側，亦各有一牛首，一個耳的牛首共有六個。耳的兩側上下各以凹線紋繪出獸首，中間則是凹線紋的立鳥紋。[106] 2013 年寶雞石鼓山 M4K2 出土〈四耳乳釘紋簋〉（H=29.7 cm，圖版 3：3），[107] 這件比弗利爾同型器大，兩者相似度高，僅有耳垂前方非波浪形，而是直線。圈足的紋飾更像典型的夔龍紋，另外在器身下段乳釘紋間的扉棱變得更複雜。

這類的簋原本也被列入西周早期炫麗風格的主要例證；不過，李永迪等指出此種簋有幾個部位的陶範在殷墟孝民屯鑄銅作坊出土，包括器身的乳釘紋與直棱紋，以及下段乳釘紋與圈足的夔龍紋部分，四耳的牛首紋大「耳垂」。[108] 除此之外，應該還包括耳部的前方牛首角部一塊板，板的背後有一牛首，這部分的範在孝民屯作坊也發現（圖版 3：4b）。孝民屯出土陶範說明了此種簋並非西周早

---

[105]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 6・西周 2》（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頁 158-159；盧連成、胡智深，《寶雞𢐗國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頁 30-33。

[106] John Alexander Pope et al., *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 Vol. 1 Catalogue*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ublication, 1967), pp. 368-369；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 5・西周 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頁 52；陳昭容，《寶雞戴家灣與石鼓山出土商周青銅器》，頁 298-401；國家亞洲藝術博物館網站："Ritual grain server (*gui*) with spikes, ribs, and, dragons" (https://asia-archive.si.edu/object/F1931.10/)。

[107]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周野鹿鳴》，頁 98-101，No. 19。

[108] 李永迪等，〈從孝民屯東南地出土陶範談對殷墟青銅器的幾點新認識〉。

期的發明，而是殷墟末期在安陽鑄造的。雖然以上三件都沒有銘文，無法直接證明這三件器是商貴族所作，在前面例子中筆者說明炫麗而無銘文，例如前述「出戟器禁組」，很有可能是王室的器物，因為王室不需要署族徽。這幾件器橫幅約 40 到 50 公分，有很高的紀念性，氣勢撼人。設想，如果這是周人所發明的炫麗銅器，先周禮制本就用簋，周王朝建立以後也持續使用簋，並且以之為身分等級標記，為何此一傳統沒有繼續下去？換言之，此類器物沒有持續在西周流行顯示這類器物是晚商殷墟製作，因為成為被擄獲的戰利品而葬在關中地區。

此種簋的炫麗性主要是由於使用了「六牛首耳」，也就是一個耳的各處總共裝飾了六個牛首。玫茵堂舊藏，贈予法國巴黎基美博物館的一件〈六牛首耳乳釘紋簋〉（H=15.2 cm，圖版 3：5）也具有此種特殊的耳。[109] 這件簋的主要紋飾為乳釘紋，乳釘呈圓尖錐形，相當突出，乳釘紋上有一道連續的夔龍紋面向扉棱。圈足厚實，紋飾為走鳥紋。俯視器身四分，四分點分別有一對耳與一對扉棱，扉棱厚實凸起。這件簋的特殊之處，在於其雙耳，就是這種「六牛首耳」，使得它的紀念性大大加強。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的一件〈六牛首耳直棱紋方座簋〉（H=27.2 cm，圖版 3：6），[110] 其上部為直棱紋簋，直棱紋以上為鳥紋帶，圈足飾以走鳥紋。器身四分，有雙耳與雙厚實的扉棱。耳為「六牛首耳」，扉棱的最上段外側亦飾以牛首。其方座中央為直棱紋帶，上段為几字形羽冠鳥紋四隻兩兩相對，兩側為顧首升鳥紋各一，下段為相對夔龍紋兩隻。方座的平面四角亦飾以牛首紋。

前述三件四耳乳釘紋簋，可以歸納如下：一、陶範在安陽孝民屯作坊出現；二、僅在西周最早期的墓葬中出現；三、體量很大，卻都無銘文，但視覺上非常炫麗。筆者認為是孝民屯作坊製造的商王室的器物。從這幾件器可以看得出殷墟末期簋形器創造紀念性的配方之一，是把直棱紋帶與乳釘紋帶加在一起，再利用兩對六牛首耳創造體量與形成視覺焦點。

至於使用六牛首耳的另兩件器，蘇榮譽根據扉棱與器耳的作法，認為此種器物的作法具有南方特徵，懷疑或者是殷墟有來自不同地點的工匠。[111] 以往筆者

---

[109] Huei-Chung Tsao, ed., *Trésors de la Chine ancienne: bronzes rituels de la collection Meiyintang* (Paris: Musee Guimet, 2013), pp. 144-145, No. 88.

[110] 陳芳妹，《商周青銅粢盛器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5），頁 228-229，No. 29。

[111] 蘇榮譽，〈論西周初年的牛首飾青銅四耳簋〉，陳昭容主編，《寶雞戴家灣與石鼓山出土商周青銅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5），頁 513-523。

也會毫不猶豫地將這兩件斷代在西周早期的早段。但仔細推敲，現在認為這兩件簋不排除可能也是殷墟末期安陽的產品。最主要是西周時代大量地使用簋，但這種六牛首耳的簋雖具有強烈的紀念性，卻未流行。這種「驟逝現象」，可能是強大的外力因素所致，最可能的就是劇烈的戰爭——牧野之戰導致許多原本發展中的藝術與技術斷裂。以往認為方座簋一定是西周時期，現在看來也未必，方座的範也在孝民屯作坊出土過。[112] 容庚《善齋彝器圖錄》也曾經著錄過一件〈帶蓋方座有肩尊〉（H=62.8 cm，銘文偽刻），其下就有方座（圖 2，右），從尊的造型，推測其年代不晚於殷墟 III 期。[113] 而且這件〈帶蓋方座有肩尊〉必須與前述大禁上的器物並觀，它很可能就是擺在禁上的尊的一種變異，因為商人視有肩尊與觚形尊為同類器物。此件尊自帶方座並加上蓋以增加高度，方能與大卣、小卣＋小禁並排。換言之，小禁或方座器之產生，與禮制上靜置以敬神，取代動態的飲酒禮儀有關。此部分當然是推測，有賴未來更多出土脈絡的證實或否定。

總之，方座簋出現的年代可能必須重新檢討，而廉海萍所用的檢測方法也可以用於臺北故宮〈六牛首耳直棱紋方座簋〉、基美〈六牛首耳乳釘紋簋〉以及所有西周早期的方座與有耳簋，因為它們的斷面為 U 形耳的內側都有泥芯包在凹槽中，不影響到外觀與使用，所以都不會清除，可以取得泥芯檢測。只要是礦物化學成分的三維點落在安陽區塊，就可以確定是安陽製造。另外，有些簋耳有「耳垂」——在耳的下方有一塊方形或接近方形的，在埋藏過程中不會受到污染。這是未來可以有系統地推動進行的檢測泥芯以確定青銅器產地的計畫。

六・直棱紋附耳鼎（圖版 4）

1926～1928 年寶雞戴家灣出土的器物中，具有「炫麗」風格的還有一種附耳的直棱紋鼎，[114] 過去傳世者有四件據說是從戴家灣一座墓葬中出土的，其一為現藏於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的〈直棱紋附耳鼎〉（H=44 cm，圖版 4：1）

---

[112] 李永迪等，〈從孝民屯東南地出土陶範談對殷墟青銅器的幾點新認識〉，頁 52-63。

[113] 圖見 Bagley,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p. 120, fig. 172. Bagley 並不疑此件之真偽，且用來討論 Freer 藏的一件蓋。原版見容庚，《善齋彝器圖錄》（北平：燕京學社，1936），No. 134，解說頁 38a。這件器也有可能是大禁上陳設的尊。

[114] 附耳是指鼎的雙耳附在器身兩側，通常斷面呈 L 形。有別於直耳，立在鼎的口沿上。

體量較大，[115] 另外三件較小，為現藏美國國家亞洲藝術博物館的〈直棱紋附耳鼎〉（H=23 cm，圖版 4：4）、[116] 上海博物館的〈川鼎〉（01232，H=23 cm，圖版 4：6）、[117] 與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川鼎〉（01231，H=23 cm，圖版 4：5）。[118] 1979 年遼寧喀左小波汰溝窖藏也出土過一件尺寸較大的〈直棱紋附耳鼎〉（H=41 cm，圖版 4：7），這座窖藏未正式發表，最近在《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20》中發表這件器，令人驚艷。[119] 2012 年寶雞石鼓山 M3K1 也出土一件〈直棱紋附耳鼎〉（H=44 cm，圖版 4：3），[120] 2013 年寶雞石鼓山 M4K3 又出土一件〈直棱紋附耳鼎〉（H=43.8 cm，圖版 4：2）。[121] 看來這種大型的直棱紋鼎在一座墓中只「分到」一件。[122] 這些器在形制與紋飾上與一般的鼎有幾點不同，一是附耳，耳從口沿以下伸出然後垂直而上。二是器身六分，每個分界線都有相當厚實的扉棱，而且扉棱的兩邊與中間凸起呈鉤狀，相當誇張。三條腿上段有半立體的饕餮紋，饕餮紋下兩道弦紋。饕餮紋的中線也有一道蠻厚的扉棱，形狀與器身的扉棱相同。器身的紋飾橫分為三段，上面是夔龍紋，共六隻，兩兩相對，以與兩附耳呈直角的腿對面的那道扉棱為中心，這是此類鼎的正向。夔龍紋下為一道直棱紋，是此種鼎的最重要特色。直棱紋下面有一道蕉葉紋。以上每件的扉棱與蕉葉紋的細節略有小異。整體而言，此種直棱紋鼎十分搶眼，在發掘過程的照片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此種器物在壁龕的銅器堆中仍顯得耀眼。

在殷墟孝民屯鑄銅作坊也出土此種直棱紋鼎的陶範，一件包括口沿、夔龍紋、直棱紋、垂葉紋等部分，另一件則為直棱紋與垂葉紋的部位（圖版 4：a-b）。可見此種炫麗的直棱紋鼎也是從殷墟末期開始出現於安陽，不是西周時代的發明。喀左窖藏的直棱紋鼎，是這些窖藏性質的一個重要指標。喀左這些窖藏

---

[115] 照片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網站：“Ritual food vessel (ding)” (https://searchcollection.asianart.org/objects/3817/)。

[116] 高解析度照片見國家亞洲藝術博物館網站：“Food vessel (*ding*)” (https://asia-archive.si.edu/object/S1987.37/)，為賽克樂藏品；又見 Rawson, *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Vol. IIB*, pp. 244-249。

[117] 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西周篇上》，頁 38-39，No. 209。

[118]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青銅器圖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頁 78，No. 56。

[119] 李伯謙主編，《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20》（北京：龍門書局，2018），頁 172，No. 274。

[120]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周野鹿鳴》，頁 124-128。

[121]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周野鹿鳴》，頁 104-105，No. 20。

[122] 陳昭容，《寶雞戴家灣與石鼓山出土商周青銅器》，頁 302-319。

的主人，是創造「魏營子文化」的一群草原畜牧者，他們很可能在周君季歷的時代就被周方收攏，其後參與了克商的戰役，而且有很大的功勞，所以也分到這種氣勢十足的青銅鼎。[123] 討論喀左附近的窖藏坑內的銅器，需要較大篇幅，未來有機會再深論。

西周前期早段也還有仿製品，上海博物館的〈⋈鼎〉（01234，H=19.5 cm，圖版 4：8），器較小，紋飾的施作水準較差。陳佩芬指出其扉棱的形制有西周中期的特徵，[124] 是一件入西周以後的仿作品。筆者以為此種仿作與前述石鼓山獸面紋鼎，以及梁帶村出土的卣、帶蓋尊、角的仿作相同，都是在典型分器時期與局部分器時期，由關中原有的小邦周工匠所鑄造，其品質遠不如原件。即便西周早期有根據原件的仿造，不過，此種耀眼的鼎顯然也沒有成為西周的一個傳統，像曇花一現，不久就消失了。

仿作品不計，七件直棱紋鼎中有兩件銘文為「川」字，應當是一種族徽。銘文有「川」的相關器，在 1926～1928 年盜掘中還出過兩件，一為現藏英國格拉斯哥 Burrell Collection〈川甗〉（未收，H=42.4 cm），根據《寶雞戴家灣與石鼓山出土商周青銅器》的描述，其箅的裝置使用半環，鑄造過程比較麻煩，根據金正耀的觀點，這是時代相對比較早的甗。[125] 另一件是現藏美國聖路易美術館（Saint Louis Art Museum）的〈川方罍〉（09760，H=62.5 cm），這件方罍除了扉棱也比較誇張之外，其正面接近圈足的半環上，以及兩側半環上都飾以巴掌形角的犧首。石鼓山 M3K3 的〈川卯卣〉也具有族名「川」，同時又有私名「卯」。其他知道出土地點的「川」器還有陝西涇陽的〈川甗〉（00773），與山西翼城鳳家坡出土的〈川甗〉（00772）。傳世品則有〈川卣〉（04804）。以往訂年都集中在殷墟末期到西周早期。如果「川」是西周重要的族氏，按理說此種族氏符號應該持續的出現，而不會集中在西周初期很短的一個時段中，也會在傳世文獻中留下蛛絲馬跡。因此筆者認為「川」與「戶」或「鼎」一樣，是商貴族的族徽。沒有銘文的五件有四件較大，另外一件則製作品質甚高，筆者以為可能是王室器物。

---

[123] 黃銘崇，〈最早的「天可汗」——季歷〉，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最早的天可汗季歷/，2021.04.16）。

[124] 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西周篇上》，頁 40-41，No. 210。

[125] 金正耀，〈商末至西周早期銅甗工藝的演變及其意義〉，陝西省考古研究院、上海博物館編，《兩周封國論衡：陝西韓城出土芮國文物暨周代封國考古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 544-550。

除仿作品一件外，其餘 7 件中 2 件有銘文，可能是商貴族族徽。陶範在安陽孝民屯鑄銅作坊出土，器物僅出土於西周最早期的墓葬。綜合以上現象，筆者認為此種直棱紋鼎也是殷墟末期的特徵之一，此種直棱紋鼎雖有西周時期的仿作，但品質不佳，容易辨識，可能就是關中地區在商鑄銅工匠移入之前的作品。其後並未流行，也未進一步發展。

七・直棱紋鳥紋尊與卣（圖版 5）

傳世的〈犅劫尊〉（05977，圖版 5：1），銘文「王征禁，賜犅劫貝朋，用作朕高且寶尊彝」，器形上段敞口與下段圈足皆為素面，僅在接近中段處各有兩道弦紋，中段則為兩道鳥紋，中間夾著直棱紋。由於陳夢家認為「禁」是商盍或商奄，所以一向被認為是西周早期的銅器。連帶地也將同類器全部訂為西周早期。現藏於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的〈犅劫卣〉（05383，H=17.8 cm，圖版 5：2）與〈犅劫尊〉是尊、卣的套器，尊、卣銘文內容相同但卣銘多外框「亞」字。其器身分上下兩段，下段垂腹，飾以直棱紋。器身上段與圈足則飾以走鳥紋。頂蓋圓形捉手，兩側有上翹的鳥喙，蓋緣飾以走鳥紋，蓋鼎上段直棱紋，下段亦為走鳥紋。[126] 明顯地同銘的卣與尊具有相同的紋飾母題，即鳥紋夾直棱紋。

近年出土與現世的一些證據顯示，與〈犅劫尊〉相關的器類究竟是西周早期或商代晚期，應該重新思考。首先是〈犅伯誃卣〉的出現，因為與「犅劫」同為「犅氏」，故再度引起討論。〈犅伯誃卣〉是以饕餮紋為主要紋飾，提梁雙扣的犧首為巴掌形角犧首，形制紋飾完全相同的大小兩件套卣。大〈犅伯誃卣〉（NA1588，H=42.6 cm）為北京保利博物館典藏。小〈犅伯誃卣〉（未收，H=29 cm），原屬玫茵堂，轉贈給法國巴黎基美博物館。[127] 銘文：「庚寅，犅伯誃作又丰寶彝，在二月生。亞。」銘文同樣很短，幾位古文字學家的解讀與年代推斷卻有相當大的歧異。「犅」是一個國名，它的君主稱「伯」，這對於晚商與西周早期而言是相同的，指的是由「他者」所組成政體的君主，相對地屬於我者的分封國君則稱「侯」。也就是說犅伯家族並非商貴族，但是卻取得為他訂做的商式銅器。犅氏的兩組器的銘文都有「亞」的外框，筆者以為「亞」當是「姻亞」的

---

[126] 高解析度照片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網站：“Ritual wine vessel (you) with lid” (https://searchcollection.asianart.org/objects/5445/)。

[127] Tsao, *Trésors de la Chine ancienne bronzes rituels de la collection Meiyintang*, pp. 60-61, No. 36.

意思，根據《爾雅・釋親》：「兩婿相稱為亞。」可能是外族因為具有一定政治影響力而與商或周的王室有某種的婚姻關係。至於其地望，筆者以為除非考古出土，或利用甲骨文資料的空間繫連，否則難以憑空論斷。年代上，各大家大體上認為是殷墟末期到西周早期，因與本文討論無相違之處，為免冗長，此處不贅。〈犅伯[illegible]卣〉的出現，讓〈犅劫尊〉與〈犅劫卣〉是否一定是西周早期，而非殷墟末期，出現變數。裘錫圭就認為是商代晚期。[128]

此外，殷墟孝民屯作坊出土了兩件與〈犅劫尊〉紋飾完全相同的尊範，說明這類尊始於商代晚期而非西周早期，所以把這種直棱紋尊一律訂在西周早期並不妥當。[129] 而且，河南安陽殷墟劉家莊北地 2010～2011 年發掘在一座窖藏坑 H2498 中出土一件〈亞㠱疑父癸尊〉（NB0174，H=24.1 cm，圖版 5：3），[130] 其紋飾同樣為直棱紋夾在兩道鳥紋帶間，與〈犅劫尊〉在形制與紋飾上的差別，僅在鳥紋帶以外上下並無各兩道弦紋。何毓靈認為劉家莊北地的兩座窖藏坑，原本作為食物或其他物品的貯藏之用，其中之所以埋了六件青銅禮器與一件仿銅陶罍，與周人克商，商貴族把貴重物品藏起來以免被奪取有關。鄰近的殷墟 IV 期建築物都有燒毀的痕跡，說明了克商以後，曾經對殷墟進行縱火與劫掠。[131] 換言之，〈亞㠱疑父癸尊〉是本文所討論的「殷墟末期」標準器類之一。考古出土類似的尊還有山東滕州前掌大 M121 出土〈史父乙尊〉（NB0408，H=25.3 cm，圖版 5：4），器身中段的裝飾同樣是上下兩段走鳥紋中間夾直棱紋。與〈犅劫尊〉的差別是圈足的部位有一圈走鳥紋。前掌大墓地的報告將這座墓訂為西周早期早段，筆者曾經在討論分器的文章中，在表格上針對前掌大墓地的分期，闡述個人的意見；對於該報告將墓葬分為三期沒有意見，但是三期當中唯有第一期為商代，第二期與第三期分別為西周早期早段與晚段則有不同看法。前掌大墓地的分期之問題在於採用涇陽高家堡、房山琉璃河、鶴壁龐村、長安張家坡、寶雞𢐗國

---

[128] 王世民，〈犅伯卣〉，保利藝術博物館編，《保利藏金（續）》（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1），頁 128-135；馬承源，〈論犅伯卣〉，《保利藏金（續）》，頁 240-243；李學勤，〈犅伯卣考釋〉，《保利藏金（續）》，頁 250-251；裘錫圭，〈犅伯卣的形制和銘文〉，《保利藏金（續）》，頁 244-249。

[12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殷墟新出土青銅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8），頁 43，圖 7:5。

[130] 何毓靈、唐際根、岳占偉、牛世山，〈河南安陽市殷墟劉家莊北地 2010～2011 年發掘簡報〉，《考古》2012 年 12 期：26-42。

[131] 何毓靈，〈殷墟劉家莊北地青銅窖藏坑性質探析〉，頁 96-100。

等墓地的銅器資料為比對參考座標。[132] 這些墓葬中，有不少正好都是「典型分器墓」或「局部分器墓」，所以滕州前掌大報告的斷代並不具有碳十四的年代依據，在相對年代上如果依據「分器」的概念，滕州前掌大 M121 是殷墓應當屬於殷墟末期。

最近鶴壁劉莊西大坡墓地，就是屬於鶴壁辛村（過去稱濬縣辛村）遺址的一部分，重啟調查與發掘，此一墓地區是中階貴族的墓葬區，M3 出土一尊、一爵、一觶，其中〈直棱紋鳥紋尊〉（H=26 cm，圖版 5：5），[133] 其形制、紋飾與〈犅劫尊〉相同，但鳥紋部分有雲雷底紋。同出的爵有銘文（ ▲），是商式銘文。爵與觶的形制與紋飾也基本上屬於殷墟末期。這座墓被盜掘過，但是從殘存青銅器知是一座西周早期的分器墓。由以上數例可知這種直棱紋鳥紋尊的年代可早到商代晚期。

另外與〈犅劫尊〉配對的〈犅劫卣〉提供一些線索，例如與〈犅劫卣〉形制與紋飾最接近的〈王作娘弄卣〉（05102，H=20.2 cm，圖版 5：6），年代為商代晚期。其造型與紋飾與〈犅劫卣〉相近，都是明顯的直棱紋器身，上有鳥紋，唯〈王作娘弄卣〉蓋之捉手為半南瓜形，蓋緣無「鳥喙」，蓋緣也沒有紋飾，年代稍早。[134]《博古圖》9.14 著錄一件〈爻母辛卣〉（05001，H=20.6 cm，圖版 5：7），造型與〈犅劫卣〉相近，唯蓋鈕不同，且蓋的兩側無「鳥喙」。[135] 另《日本蒐儲支那古銅精華》著錄的太田貞造舊藏〈直棱紋鳥紋卣〉（H=20.9 cm，圖版 5：8），同樣是直棱紋與鳥紋的主題，周身有四道扉棱，蓋的前後兩側有上翹的「鳥喙」，且提梁的方向就在卣的正面。[136] 此器林巳奈夫訂為殷後期。四件直棱紋卣的形制相近，其年代應該也相近。這種直棱紋卣出現於殷墟末期，進入西周之後就不再出現。

與〈犅劫尊〉形制基本相同的尊，還有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的〈作彭史從

---

[13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頁 270-273，彩版 40-4。

[133] 高振龍等，〈河南鶴壁辛村遺址 2014 年度西大坡西周墓地發掘簡報〉，《華夏考古》2020 年 3 期：3-22。本文圖版由高振龍先生提供，特此致謝。

[134] Bagley,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p. 381, fig. 65.3.

[135] 王黼等，《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卷 9，頁 14。

[136] 梅原末治，《日本蒐儲支那古銅精華・一》（大阪：山中商會，1959），No. 69；林巳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一・圖版》（東京：吉川弘文館，1984），頁 262，卣 61。

尊〉（05810，H=25.9 cm，圖版 5：9），銘文「作彭史從尊」，[137] 器中段的紋飾與〈犅劫尊〉相類，但〈犅劫尊〉在主紋飾上下各有兩道弦紋，而〈作彭史從尊〉則上下各有一道。銘文的風格在晚商到西周早期之間，從內容上看並非商貴族，可惜為傳世器無更多脈絡以進一步判斷。

更重要的是陝西寶雞竹園溝 M13 出土了〈直棱紋鳥紋尊〉（H=25.4 cm，圖版 5：10），[138] 此器與鶴壁西大坡村出土的〈直棱紋鳥紋尊〉相近，只有兩個鳥紋帶上兩鳥相對之處的篦形紋改為一外捲角的犧首。這件尊有配對的大〈直棱紋鳥紋卣〉（H=33.3 cm，圖版 5：11）與小〈直棱紋鳥紋卣〉（H=27 cm，圖版 5：12），兩件直筒卣形制完全相同，但高度不同。其紋飾為兩道直棱紋中間夾一道空白帶，上下兩道則為鳥紋帶，鳥紋帶的正中心飾以外捲角犧首。頂蓋圓形捉手上段是放射狀的直棱紋，下段是鳥紋帶。[139] 竹園溝 M13 是典型分器墓，共有 22 件青銅禮器，其中有銘文者 9 件，全部是不同族氏的商貴族所鑄造。雖然這三件器沒有銘文，但是他們與其他酒器放在一個漆禁上，禁的寬約 45 公分，長約 90 公分。置於禁上與出土於禁附近的銅器也都是酒器。其餘包括一爵（覃。父癸）、一觚、一觶（冉癸）與一斗。這組酒器可與「鼎」禁組相對照，也是一尊與大小兩卣，置於一禁上。不過，其紀念性遠不如前述三套禁組。與之搭配的爵、觚、觶同樣是湊配的。

此種在漆盤或漆禁上置酒器的例子還有寶雞竹園溝 M7 的「伯各組」，其銅器時代明確屬西周早期。竹園溝 M4 的「强季組」，時代又略晚於前組與湖北隨州葉家山 M28 的「曾侯諫作媿組」。以上三組漆盤或漆禁均置一尊二卣，卣一大一小，形制相同。[140] 顯見西周早期，這種漆盤上的一尊二卣仍然持續生產，但到了西周早期偏晚或西周中期早段以後，酒器進一步被制度性排除，因此就完全消失了。在商周之際，原本這種一尊二卣的組合更多，有些殷墟末期生產的組合在「分器」過程中被拆開分給不同的有功將士。

傳世也有直棱紋尊與卣的組合，可從銘文得到配對線索。現藏於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Celevland Museum of Art）的〈作父戊尊〉（05830，H=25.2 cm，圖

---

[137] 林巳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一・圖版》，頁 228，觚形尊 62。

[138] 盧連成、胡智深，《寶雞强國墓地》，頁 61-62，彩版 9-1。

[139] 盧連成、胡智深，《寶雞强國墓地》，頁 63-64，彩版 8-1。

[140]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隨州葉家山 M28 發掘報告〉，頁 3-57。

版 5：13），[141] 銘文：「作父戊寶尊彝。」器身中段同樣有直棱紋，上下夾以走鳥紋。下段圈足部分飾以饕餮紋。器身上段底部為走鳥紋，上段外張部分則裝飾著藏有面向上的饕餮紋的蕉葉紋。器的斷面分為四份，交接處都有淺扉棱。〈作父戊尊〉有一件同銘〈作父戊卣〉（05160，H=31.9 cm，圖版 5：14），[142] 現藏日本神戶白鶴美術館。白鶴〈作父戊卣〉為直筒卣，也有直棱紋。卣身有兩道直棱紋，將器身隔出三個紋飾帶，三帶均為面對器正中央線的走鳥紋，上層中央有一犧首，中層素平，下層則有篦形紋。蓋有圓形捉手，紋飾兩層，上層放射狀直棱紋，下層鳥紋。提梁兩端為茸角犧首。德國 H. G. Oeder 舊藏〈作父戊卣〉（05159，H=24.7 cm，圖版 5：15），形制紋飾與白鶴〈作父戊卣〉同，[143] 為一套大小直筒卣，推測原本可能有漆盤或禁與一件斗構成整套器組。白鶴〈作父戊卣〉傳為洛陽北窯鎮出土，可見西周初期在洛陽的商遺貴族仍然製作並使用此種器群。

傳世還有另外一組，尊是潘祖蔭舊藏的〈亞㠱疑作母辛尊〉（03689，H=25.5 cm，圖版 5：16），銘文「亞㠱疑作母辛彝」。曾經出現於紐約蘇士比（Sotheby）的拍賣圖錄，[144] 其形制與紋飾的安排與前述〈作父戊尊〉完全相同。與這件尊搭配的有兩件同銘文的卣，一為〈亞㠱疑作母辛卣〉（05292，H=29.2 cm，圖版 5：17），典藏於弗利爾藝廊，稍大。另一為〈亞㠱疑作母辛卣〉（05294，H=23.8 cm，圖版 5：18），藏於東京出光美術館，體量略小。[145] 這兩件卣與前述〈作父戊卣〉幾乎完全相同，只有器身中央的紋飾帶，由相對的走鳥紋換成相對的顧首龍紋。這三件器，構成一尊二卣之套器，直筒卣也是一大一小，原本亦可能有漆禁或漆盤與銅斗構成一組靜置酒器。

總結地說，這種直棱紋尊與直筒卣，以及一尊兩直筒卣的配套，最早都出現於商代晚期，一直到西周最早期洛陽作坊還鑄造了一些，但商王朝的飲酒禮儀與文化進入西周以後就先被限制（針對商遺貴族），然後又被禁止（針對周系貴族），因此西周早期早段以後就消失了。[146]

---

[141] 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網站："Wine Vessel (Fu Wu Zun)" (https://www.clevelandart.org/art/1938.13)。

[142] 白川靜，《白鶴英華》，頁 22-23，No. 5。

[143] Bagley,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p. 387, fig. 67.1.

[144] Sotheby, New York, 2013.09.17, lot 5. 此件《集成》編號在簋部，是一個錯誤。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已修正，見 https://bronze.asdc.sinica.edu.tw/rubbing.php?03689。

[145] 出光美術館，《中國の工藝》，圖 74。

[146] 見前引黃銘崇，〈從考古發現看西周墓葬的「分器」現象與西周時代禮器制度的類型與階段〉。

八．直棱紋簠（圖版 6）

北京故宮博物院有一件傳世的〈直棱紋簠〉（圖版 6：1），全器分蓋與器兩部分，形狀大體相同，母子口相合，器口長方形圓角，器（蓋）身斜收至長方形的圈足（捉手）。蓋的捉手有明顯的方唇，捉手部位垂直，四面均以篋形紋為中心，左右各有一夔龍紋。斜面部分橫分為三段，上段與下段同樣為篋形紋與左右夔龍紋，中段則為直棱紋，由於蓋的斜面上小下大，且邊緣為圓角逐漸轉方角，所以此處的直棱紋，不甚規整。蓋為母口，有兩公分左右的垂直緣。器身則由斜面與長方形的圈足構成，同樣由圓角收為方角。圈足的收邊先彎曲外撇，再垂直與器身接。紋飾為篋形紋與左右夔龍紋，斜面同樣橫劃分為三段，上下兩段同為篋形紋與左右夔龍紋，中段則為直棱紋。在蓋上時，所有六套夔龍紋的上下方向全同。器的直棱紋與蓋類似，不甚規整。器身的兩側原來可能有附耳，現已殘。全器通高 37 公分，長 55.8 公分，重 17.5 公斤，過去被訂為西周早期，且認為是唯一早到西周早期的簠形器，與其他簠形器年代（西周晚期到春秋）相差甚遠。[147] 本文以陝西扶風雲塘窖藏被民眾取出後由考古單位徵集到的西周晚期〈伯公父簠〉（04628，圖 6：4）為例相比較，晚期的簠器形較小，高僅 19.9 公分，口寬僅 28.1 公分。它的器與蓋基本上相同。器蓋均呈斗形，圈足外侈，器與蓋的短面的斜面中心左右各有一圓環。器身方唇以下紋飾分兩段，上為重環紋，下為波帶紋，圈足則飾以並排的鱗片紋。兩者口對口放置，但蓋的四邊中心皆有一牛形獸首作為扣，使器蓋相合時不位移。[148] 兩者比較，早期與晚期的簠差別甚大，但卻又能夠確認為同一器類。

2013 年寶雞石鼓山 M4 的 8 號壁龕出土兩件直棱紋簠，其中〈大直棱紋簠〉（808，圖版 6：2，共三個角度）與北京故宮〈直棱紋簠〉大同小異，同樣分蓋與器兩部分，器身有一對馬蹄形的附耳，器的前端中央繫有一鈴，母子口相合，器口呈長方形圓角，器（蓋）身斜收至長方形的圈足（捉手）。蓋的捉手與器的圈足幾乎完全相同，最外有垂直的唇部，四邊微微曲線外撇，捉手或圈足上有兩條弦紋。蓋的斜面橫分三段，上下段為篋形紋與左右各兩組夔龍紋，紋飾的方向，在器蓋起來時，夔龍方向倒置。中段則為直棱紋，是相當規整的平行線。器身的

---

[147] 李學勤主編，《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青銅器（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182，No. 200；故宮博物院，《故宮青銅器圖典》，頁 86，No. 64。

[148] 曹瑋主編，《周原出土青銅器》（成都：巴蜀書社，2005），頁 2158-2164。

斜面上紋飾的使用與蓋相同，但夔龍紋的方向是正的。此器與北京故宮簠比較，其體量略小，通高 34.5，器口長 45.4，口寬 34.8，圈足長 23.8，圈足寬 16.5 公分，重 12.7 公斤。從直棱紋的規整度與器形紋飾間的整合程度推斷，此器的製作年代當晚於北京故宮〈直棱紋簠〉，但應該不會相去太遠。

石鼓山同一壁龕出土的第二件簠為〈 簠〉（NB1936，803，圖版 6：3），此器分蓋與器兩部分，器身有一對馬蹄形的附耳，器蓋以母子口相合。器身上段為收入的斜面，下段為長方形的圈足，圈足的四壁平直。斜面橫分三段，上下段為篦形紋與左右夔龍紋各一，中段為直棱紋，直棱紋的施作較整齊。蓋的形制與前兩件不同，下段為斜面，斜面上為一圓角方形的平台，平台四角有四勾形扁足，方向為 45 度角。此器通高 19.5，器口長 25.6，口寬 18.8，圈足長 13.2，圈足寬 9 公分，重 3.9 公斤。[149] 圈足內底部有凸線雙勾銘文「 」字，字比一般銘文大很多，因此肉眼不易辨識。此字一般認為同於「 」，就是「光」，為晚商族氏的族徽。此一銘文的識別相當重要，說明這件器可能亦屬於分器的所得。在戴家灣石鼓山會議中岳占偉就指出殷墟孝民屯鑄銅作坊早就出土過此種簠的陶範，不過因為缺乏相關器物的訊息而未比對出。在石鼓山 M4 的兩件簠出土以後，就發現孝民屯其實出土不少此種直棱紋簠的陶範。[150]

根據〈 簠〉銘文與安陽孝民屯出土此種器物的陶範，且西周早、中期未流行此種銅器，由這三個訊息判斷，此種直棱紋簠是殷墟末期的發明，但尚未普及，即因改朝換代而未再持續，一直到西周晚期才又出現類似的器形。問題是為何此種器形能夠間隔數百年再度出現？筆者以為其原型當為一種漆木器，雖然商代滅亡以後青銅簠暫時消失，但原型的漆木器仍延續使用，所以一、兩百年後同樣器形得以再度出現，並且開始流行以青銅製造。

九・棘羽（散羽）鳳鳥紋器（圖版 7）

寶雞戴家灣出土的銅器中有數件青銅器有「棘羽鳳鳥紋」，這是一種相當搶眼的紋飾，紋飾前面的一小段為鳥首、鳥身、鳥足，眼部凸出，尾部很長，棘羽狀。頭部的羽冠也很長，同樣棘羽狀，此處棘羽陳昭容稱為「散羽」，本文稱「棘羽」是指鳥羽的描繪沿著主脈出棘刺狀羽（圖版 7：1，此為圖版 7：6 的拓片）。

---

[149] 王占奎等，〈陝西寶雞石鼓山商周墓地 M4 發掘簡報〉。

[150] 這是根據岳占偉在戴家灣石鼓山會議上的發言。

具有出土地點的棘羽鳳鳥紋銅器，第一件為〈〰方鼎〉（01242，H=22.8 cm，圖版 7：2），出自寶雞戴家灣，現藏寶雞青銅器博物院。[151] 器形為豎耳方鼎，足部細長外側飾以下垂的蕉葉紋。四角與每面的中心有厚實規整的扉棱。四面紋飾基本相同，下段為棘羽鳳鳥紋，上段為走鳥紋。器壁上有銘文一字「〰」，可能為商貴族族徽。

第二件出現於包含天津歷史博物館大禁的照片中，亦出自寶雞戴家灣，現藏美國國家亞洲藝術博物館的〈棘羽鳳鳥紋方座簋〉（H=34.5 cm，圖版 7：3）為一有蓋的方座簋，無銘文。[152] 其方座每面裝飾相對的棘羽鳳鳥紋，圈足飾以上捲尾走鳥紋，正面相對，側面尾對尾。器身分上下兩段，下段較寬，飾以棘羽鳳鳥紋，上段中央有犧首，其餘飾以下捲尾的走鳥紋。簋蓋有圓形捉手，蓋面飾以棘羽鳳鳥紋。左右附耳上為半立體的茸角幼獸，彎曲以及耳垂刻以鳥紋，整體呈獸首鳥身狀。器物整體的視覺焦點為其棘羽鳳鳥紋，非常耀眼。

有出土地點的第三件為寶雞石鼓山 M4K8 出土的〈棘羽鳳鳥紋有蓋簋〉（H=22 cm，圖版 7：4），[153] 這件簋的器與蓋整合成一個上小下寬的扁圓形，蓋有圓形捉手，四分，每份飾以棘羽鳳鳥紋。器身分上下兩段，上段較窄，中有虎耳犧首，左右飾以夔龍紋，夔龍的角為鹿角比較特殊。下段較寬飾以棘羽鳳鳥紋。圈足飾以尾部上捲的走鳥紋，共四組。

第四件是隴縣圖書館 1998 年徵集的〈棘羽鳳鳥紋方座簋〉（H=27 cm，圖版 7：5）。[154] 隴縣在汧水中游，沿汧渭之會上溯約 40 公里，這裡在先周與西周早期有周的重要分封國「虞」。下部的方座紋飾為直棱紋＋鳥紋、夔龍紋，器身主紋飾為棘羽鳳鳥紋，主紋以上為鳥紋飾帶，圈足紋飾亦同。雙耳作成犧首鳥身，犧首角部豎起，羊角，耳垂方塊上刻鳥尾與鳥足。與此器方座相同的範曾經在孝民屯作坊出土。

同屬食器的傳世品則有上海博物館藏的〈棘羽鳳鳥紋簋〉（H=15.6 cm，圖

---

[151]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 6‧西周 2》，頁 145，No. 149；陳昭容，《寶雞戴家灣與石鼓山出土商周青銅器》，頁 280-283。

[152] 高解析度照片見國家亞洲藝術博物館網站：“Food vessel (*gui*)” (https://asia-archive.si.edu/object/S1987.3a-b/)，為賽克樂藏品；又見 Rawson, *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Vol. IIB*, pp. 360-367。

[153]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周野鹿鳴》，頁 108-111，No. 21。

[154] 陝西省博物館編，《三秦瑰寶：陝西新發現文物精華》（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1），頁 22。

版 7：6），[155] 雙耳簋，下段外撇。耳呈羊角獸首鳥身。圈足飾以龍紋，器身上段中為犧首，兩側為尾羽下垂的走鳥紋，一段兩隻，以犧首為中心相對。器身下段較寬，飾以棘羽鳳鳥紋。[156] 倫敦的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也藏有一件〈棘羽鳳鳥紋鼎〉（H=32.2 cm，圖版 7：7），[157] 鼎身的上段有紋飾，為棘羽鳳鳥紋，下腹素面。三足飾以蕉葉紋。

在酒器方面陝西韓城梁帶村 M27 出土過一件〈棘羽鳳鳥紋卣〉（H=25.4 cm，圖版 7：9），[158] 器的造型與前述鳳鳥紋卣相同，但是紋飾母題不同。其主體紋飾為棘羽鳳鳥紋，蓋頂的紋飾也是，但因外框形狀限制而稍微簡化。器身的口沿部分與蓋的口沿部分均為走鳥紋，圈足部分則是交龍紋。器身與蓋上的紋飾皆剔地起凸，沒有地紋（雲雷紋）。此器不但製作品質不佳，紋飾不精，且部分提梁為舊補，補的次數還可能不只一次，修補處的品質較原器製作品質更差。比較特殊的是提梁末端的犧首是巴掌形角犧首，與其他同樣的犧首比較顯得呆板。陳小三認為這件銅器也是春秋時代的仿製品，同墓出土與墓中隨葬品時代不合的三件：〈棘羽鳳鳥紋卣〉、〈饕餮紋角〉與前述〈帶出戟蓋饕餮紋尊〉，其紋飾的施作都比較簡略，卣與尊都無地紋，紋飾的線條也不俐落，角則是凸線紋主紋飾下有底紋，但底紋的施作潦草，他推測這幾件均是春秋時代「復古」的作品。[159] 筆者認為陳小三的觀察敏銳，不過「復古」的解釋說服力不足。筆者認為如果是春秋時代的「復古」，首先製造者必須見到原件，在春秋時代，商末周初的器已經十分罕見，而且以關中作坊當時的水準，復古之作的品質會更好，至少主紋飾規整且底紋完整。筆者推測這三件是仿作芮國家族成員參與克商相關戰役所獲得的戰利品，所以每一件器物，原來都有其「原件」，原件的品質比仿製件要高。仿製的期間大約在克商以後十幾年間；參與克商因為分器而取得「原件」。芮國貴族要求工匠複製，但芮國所在的關中地區僅有周方原有的工匠，因此做出來的

---

[155] 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西周篇上》，頁 106-107，No. 240。

[156] 這件簋的雙耳垂內的泥芯可以利用廉海萍的方法進行檢測。下一件鼎的鼎耳內，以及鼎腿內的泥芯可以利用廉海萍的方法進行檢測。

[157] Jessica Rawson, *Chinese Bronzes: Art and Ritual*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87), p. 24; Rawson, *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Vol. IIB*, p. 366, fig. 38.8.

[158] 孫秉君、蔡慶良，《芮國金玉選粹》，頁 256-259。

[159] 陳小三，〈韓城梁帶村 M27 出土卣、尊的年代辨析〉，頁 26-31；陳小三，〈再談韓城梁帶村 M27 出土一組銅器的年代及相關問題〉，頁 45-56。

作品普遍地與原件差距甚大。此一現象亦見於寶雞石鼓山 M4 墓葬的兩件鼎，丁岩在寶雞開會期間介紹兩件銅鼎時曾經討論過此一現象。後來李龍俊還有系統地討論此一現象。因此，推測此一仿作應當還是在西周初期，當時關中地區的工匠，還在學習掌握精製青銅容器的技術中。所以，這件器雖然是周王朝關中工匠仿作，筆者還是要將這件卣放在圖版 7 上，讀者必須想像它有品質更好的「原件」。在春秋時代由於各地鑄銅工匠均已掌握精製銅器的方法，「復古」而粗糙是難以被贊助者接受的。但是自祖上傳下的粗糙「古董」則可以入葬。

非常幸運地，與前件相似的銅卣最近在江西南昌西漢末年的海昏侯墓中出土，〈子畯父乙卣〉（未收，尺寸不詳，圖版 7：8），銘文「子畯父乙」，器蓋同銘，讓我們得以一窺梁帶村〈棘羽鳳鳥紋卣〉「原件」的形制。這件器原本從腹部斷裂為上下兩截，但可以修復完整。修復以後紋飾的內容與梁帶村〈棘羽鳳鳥紋卣〉相同，但器身與蓋上的紋飾都有精緻的雲雷紋為底。提梁上的雙首斜角夔龍紋以及兩端的巴掌形角犧首也都是完美的晚商形制。[160] 從銘文看來，此器的作器者明顯為商貴族，筆者認為此器當為殷墟末期器而非多數學者所認定的西周初期。此件同樣只要找到有泥芯處，例如蓋的鳥喙處即可驗證是否為安陽製品。

《西清古鑑》也著錄了一件〈棘羽鳳鳥紋卣〉（H=29.7 cm，圖版 7：10），器身與器蓋的主要紋飾為棘羽鳳鳥紋，其提梁兩端亦為巴掌形角的犧首，《西清古鑑》中的圖像係從側面角度繪製，所以顯得較瘦，其整體造型與梁帶村和海昏侯墓出土者相同，唯紋飾亦沒有雲雷地紋，與梁帶村出土者更接近。[161] 或許這也是一件西周初期的仿製品，其仿製的對象也與〈子畯父乙卣〉類似。

2013 年北京的中國國家博物館新入藏了一件〈士尊〉（NB1769，H=24 cm，圖版 7：14），其銘文「冊劦竹。士作父癸彝」，器形是觚形尊，紋飾在器腹中主紋飾為棘羽鳳鳥紋，有雲雷底紋。此器因為與本段討論的諸器紋飾相同，故亦被訂為西周初期。[162] 同一家族器亦曾出現於寶雞戴家灣出土的一件〈冊劦竹祖

---

[160] 江西省考古研究所、首都博物館編，《五色炫曜：南昌漢代海昏侯考古成果》（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頁 62-63；孫明，〈商周縱置提梁銅卣賞析〉，頁 9-14，卣斷裂的上半部見頁 14；周艷明，〈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墓出土的鳳鳥紋提梁卣及相關問題〉，《文博》2016 年 5 期：30-36。

[161] 清・梁詩正等編纂，《西清古鑑》（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卷 17，頁 21。

[162] 田率，〈國家博物館新入藏的兩周青銅器管見〉，《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5 年 5 期：135-142；呂章申主編，《中國國家博物館百年收藏集粹》（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2014），頁 64-65。

癸角〉（08848），銘文「冊劦竹。祖癸」，[163] 是與鼎式禁組同出的酒器之一。扶風召李 M1 也曾出土同一家族的一件壺（05158）。筆者認為這幾件器都是殷墟末期的青銅器。「冊劦竹」這個族氏也是晚商在大邑商的重要族氏，也是被劫奪銅器的受害者。

具有「棘羽鳳鳥紋」的酒器，除了上述諸器外，尚有現藏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的〈中子箕 觥〉（09298，H=31 cm，圖版 7：11），其銘文「中子箕 作文父丁尊彝。鑊臤」。[164] 這是一件底座為方形，但是蓋的尾部卻保持橢圓形的觥。觥蓋頭部為茸角獸，獸口咧齒。觥蓋尾部為獸口含鳥，鳥喙露出，上翹。器的尾部有把手，製作得十分誇張，其造型為羊角獸下含一鳥。蓋脊的兩側飾以棘羽鳳鳥紋。器身分為三段，上段隨著蓋的造型變化，前端高起，後端平，都是橢圓形。中段與下段的圈足都是方形。器身中間微鼓，圈足外撇。器身的四角與每面的中線都有扉棱，相當厚實，上端有兩處凸起，不算太誇張。此器最吸引目光之處在其紋飾，器身的上、中、下三段皆飾以棘羽鳳鳥紋，隨著每一個框的形狀而調整鳥紋。另有一件外觀幾乎完全相同，現藏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Princeton University Art Museum）的〈 文父丁觥〉（09284，H=31.3 cm，圖版 7：12），銘文「 。文父丁」，[165] 其外觀與前件比較僅觥首嘴部咧齒較窄。〈中子箕 觥〉與〈 文父丁觥〉是否為戴家灣出土並無證據，但是與〈中子箕 觥〉相關銅器包括寶雞戴家灣出土的〈鑊臤父丁鼎〉（01852，鑊臤。父丁）與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的〈 鼎〉（02318， 作文父丁鬻。鑊臤）。這三者的族徽均為「臤」，受祭者均為「父丁」，且〈中子箕 觥〉與〈 鼎〉的作器者皆為「 」，三器原本應是「臤」族氏為其「父丁」所作，基本上是同時代的產品。臺北故宮的〈 鼎〉與這兩件棘羽鳳鳥紋觥一向被訂為商代晚期，包括戴家灣出土的〈鑊臤父丁鼎〉，應當都是殷墟末期安陽製造，以下會進一步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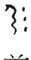
棘羽鳳鳥紋一直被認為是西周早期銅器的特徵之一，甚至被認為是寶雞地區的特色。不過，2000 年在山西臨汾龐杜發現數座殷墟 III 期的墓葬，其中較大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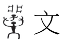
[163] 陳昭容，《寶雞戴家灣與石鼓山出土商周青銅器》，頁 188-191。

[164] 陳昭容，《寶雞戴家灣與石鼓山出土商周青銅器》，頁 474-477。

[165] 高解析度照片見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網站："Pouring vessel with dragon-head lid (guang), late 11th century BCE" (https://artmuseum.princeton.edu/collections/objects/29713)；陳昭容，《寶雞戴家灣與石鼓山出土商周青銅器》，頁 478-481。

一座（M2）出土了一件〈息冊父丁方彝〉（未收，圖版 7：13），其銘文「息冊父丁」。器形罕見，像方彝但有兩耳，無蓋或失蓋，所以被稱為「方簋」（此器實為方彝，下節會有說明）。[166] 其器身四面分上下兩段，上段較窄飾以面對中線的第 II 類鳳鳥紋。下段較寬，則飾以棘羽鳳鳥紋。圈足部分較高，紋飾帶內束，飾以兩頭龍。耳的部分與前述〈中子箕觥〉的耳相同，但樣式更為古樸，兩角呈版狀，斜出在獸首的兩側，而非在獸首頂上面向前方。此器足可證明棘羽鳳鳥紋是殷墟 III 期即有的，而非寶雞地區的地方特色。

以上討論了 14 件棘羽鳳鳥紋器，其中 7 件有銘文，都是商貴族銘文。當出土的脈絡清楚時，有的出自商墓、或出自西周前期的典型分器墓，也有仿製品出自西周後期的墓葬，以及西漢末海昏侯墓中的收藏品。上述所有棘羽鳳鳥紋器的年代，即便用舊的斷代，亦都侷限在西周早期早段。如果這是周貴族喜好的紋飾，為何沒有在西周早期早段以後繼續流行？從這種戛然而止的現象，以及商式銘文等，故筆者認為，棘羽鳳鳥紋相關器極可能都是商末器，而且其原件均屬殷墟 III～IV 期。有一、兩個仿製件其原件為商器，而模仿時間則出現在西周前期，關中作坊「起飛」——也就是商工匠遷入關中以前。

Rawson 曾經試圖解釋棘羽鳳鳥紋的來源，認為與南方有關。西周早期出土銅器之精緻使得不少西方學者認為「先周」（pre-dynastic Zhou）的青銅工業已經相當發達，可以製作精緻的青銅禮器。Max Loehr 則認為出戟組的卣與棘羽大鳥紋的觥分別為「晚商」與「先周」（克商以前的周方），也就是認定周克商以前就有技術非常高的鑄銅作坊。[167] Virginia Kane 也以為〈文父丁觥〉是克商以前周方鑄銅作坊的作品。[168] 其實，這些論點都沒有證據。基於「分器」理論，筆者認為「棘羽鳳鳥紋」與前述幾種鳳鳥紋都是相關的，從安陽出土的陶範、此種紋飾最早的時代、銘文內容、以及銅器最終的分布，基本上都指向可能是安陽製

---

[166] 筆者數度嘗試聯繫臨汾市文化局，試圖參訪丁村博物館以觀看這群出土器物，皆未成功。此為更早之前李永迪參訪時的攝影。出土此器的臨汾龐杜墓葬共出七件青銅禮器，包含：兩爵、兩觚、一方彝、一卣、一鼎。此乃根據田建文所撰寫的報告。後來因為本論文拖延，報告終於出版，見狄跟飛等，〈山西臨汾龐杜墓地 M1、M2 發掘報告〉，《文物季刊》2022 年 4 期：9-14；韓炳華，〈息父乙冊簋及相關問題〉，《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 年 2 期：68-73。

[167] Loehr, *Ritual Vessels of Bronze Age China*, No. 41, pp. 98-100; No. 50, pp. 116-117.

[168] Virginia C. Kane, “The Independent Bronze Industries in the South of China Contemporary with the Shang and Western Chou Dynasties,” *Archives of Asian Art* 28 (1974-1975): 77-107.

造的。與前述六牛首耳簋一樣，本節銅器也包括兩件方座簋，所牽涉到的一個很重大課題是方座簋是否能早到殷墟時期？前文已經舉出殷墟 III 期有帶蓋方座有肩尊。孝民屯作坊出土過類似方座周圍的鑄範，但也有可能是禁範。不過因為這種紋飾在西周前期早段嘗試仿作以後就消失，筆者認為最可能的狀況是棘羽鳳鳥紋器都是商代晚期的器物（殷墟 III～IV 期），而且可以被科學地證實或否定，其方法就是廉海萍所用的泥芯檢測。因為根據 CT 掃描，方座簋、鼎、卣等器類，都會有兩、三處殘存或完全包覆的泥芯，[169] 都可能檢測而確定其生產地點，學術界如果對此一問題有興趣，未來可以進行系統的檢測與研究。

十・從棘羽鳳鳥紋觥、方彝所引發的問題（圖版 8）

前節討論了以棘羽鳳鳥紋為主要裝飾的〈息冊父丁方彝〉（圖版 8：1）是一個帶有雙耳的方彝，過去僅三見，其一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的〈亞醜方簋〉（本文稱〈者姤方彝〉，原因下詳；03098，H=20.7 cm，圖版 8：2），《商周彝器通考》與《故宮商代青銅禮器圖錄》中均稱為「方簋」。[170] 此器現在目視可見的銘文為「亞醜」兩字，但是透過器底的 X 光片，我們可以看出目前目視可見的銘文是另外焊接上去的，器底至少有三種銘文被切割與焊接修補，只有一種與原器相連是原始的銘文「亞醜。者姤以大子尊彝」，因破損而有缺字。推測原有銘文的器底可能在出土時脫底破損，只剩下邊緣，銘文也被鏽所掩蓋無法目視。盜掘時應當還有同時盜出的器物與碎片，古董商就以目視可見「亞醜」兩字的碎片焊接，放在器底中心，以提高銅器的售價。在修補器底時還用到一些目視無法見到銘文的破片，所以器底修補以後，共三種銘文，僅有「亞醜」目視可見。其原始銘文為「亞醜。者姤以大子尊彝」的殘留，以下我們將逕稱此器為〈者姤方彝〉。此器的造型可以說是〈息冊父丁方彝〉的進一步發展，器身的腹部與頸部相接處收束，使每個段落更為明顯，且扉棱不再相連，口部外侈。腹部鼓出，圈足呈弧線外撇，不再有折角。器身與圈足的四角與每側的中線各有扉棱。雙耳

---

[169] 從泉屋博古館銅器的透視掃描，我們可以觀察到各種銅器有泥芯的部分。泉屋博古館等，《青銅器の內部を探る——X 線 CT スキヤナによる中國古代青銅器の構造技法解析》（京都：泉屋博古館，2012）。此書有中譯本，泉屋博古館等，《泉屋透賞：泉屋博古館青銅器透射掃描解析》（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No. 10。中譯本的圖像比較完整。

[170] 陳芳妹，《故宮商代青銅禮器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8），頁 576-581。

（把手）同樣做成羊角饕餮口中含有一鳥，鳥首在饕餮口中，僅露出眼與上翹的喙，耳的下段為鳥身，垂的部分為鳥足與鳥尾。器身中段的紋飾為饕餮紋，上段與圈足為走鳥紋。

為何我們認為這件「亞醜方簋」原來當為〈者姤方彝〉，因為這件器有一件與之成套的觥。簋為食器，不可能與酒器觥成套，但方彝卻可以。日本東京出光美術館的〈者姤觥〉（09295，H=31 cm，圖版 8：2b），銘文為「亞醜。者姤以大子尊彝」。此器不僅圈足與器身的下段為方形，與蓋連接的上段之器與蓋的尾端也做成了方形（見圖版 8：2b 左起第 3 張蓋內部照片），所以從〈者姤觥〉的尾部與〈者姤方彝〉的一側觀看，兩者一模一樣。[171] 由於觥的器身上段必須配合蓋的形狀，所以變成了曲線，但是器身下段與圈足，包括耳（把手）兩者幾乎是一模一樣。

另兩件帶耳方彝是容庚《商周彝器通考》287 著錄的一件〈饕餮紋方簋〉（H=11.3 cm，圖版 8：3，第 5 排左一），現藏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172] 根據內田純子參訪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時所拍的照片，其銘文為「仲追父作宗彝」，即《殷周金文集成》著錄的〈仲追父方彝〉（09882）。[173] 另一件則是著錄於《寧壽鑑古》的〈周宗寶方彝〉（未收），銘文「作宗寶尊彝，其孫孫子子永用」，從《寧壽鑑古》的線圖看來，〈周宗寶方彝〉與〈仲追父方彝〉外型的相似度極高。[174]〈周宗寶方彝〉與〈仲追父方彝〉應當都如《寧壽鑑古》題名為方彝。由於〈仲追父方彝〉的雙耳或經修復，崎川隆懷疑雙耳後加，不過比對〈息冊父丁方彝〉與〈者姤方彝〉可知有些方彝是有雙耳的。有雙耳的方彝到目前為止都未見蓋，筆者認為雙耳方彝應該有蓋，不過未來需要出土資料進一步確定。〈周宗寶方彝〉與〈仲追父方彝〉的饕餮紋比較特殊，有醒目的內捲角，角的捲度特大，是此類器物的視覺焦點。其時代應該屬於西周前期偏晚。此器的形

---

[171] 出光美術館，《中國の工藝》，No. 77；杉村勇造，《中國古銅器》（東京：出光美術館，1966），頁 64-73。

[172] 杉村勇造，《中國古銅器》，頁 64-73；高解析度照片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網站：“Kuei” (https://www.clevelandart.org/art/1974.265)。

[173] 崎川隆，〈關於西周時期飾有「上卷角獸面紋」的青銅器〉，《青銅器與金文》第 1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頁 388-405。

[174] 清・乾隆敕撰，《寧壽鑑古》（上海：商務印書館，1913），卷 6，頁 11；國立國會圖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https://dl.ndl.go.jp/en/pid/1919976/1/17）。由於兩者相似度高，本文圖版不另置〈周宗寶方彝〉圖像。

制與山西絳縣橫水墓地出土的〈 爾方彝〉相似但多兩耳。〈 爾方彝〉（NB0867，H=35.8 cm，圖版 8：4， 爾作父丁尊彝，孫孫子子其永寶，戉）是一套器中的一件，它有與之同銘文成套的〈 爾觥〉（NB0869，H=29.8 cm，圖版 8：4b）與〈 爾方尊〉（NB0868，H=27.6 cm，圖版 8：4c）。[175] 以上討論諸器之視覺焦點為特殊的內捲角饕餮紋，與陝西扶風齊家村出土〈作文考日己方彝〉（09891，H=38.5 cm，圖版 8：5，作文考日己寶尊宗彝，其子子孫孫萬年永寶用。天）的饕餮紋亦同。不過，前述三件方彝的器身略鼓，但是〈作文考日己方彝〉器身平直，蓋緣有垂直段，且蓋的斜坡較小與前述諸器不同。同樣地，〈作文考日己方彝〉也有同出的〈作文考日己觥〉（09302，H=33.5 cm，圖版 8：5b）與〈作文考日己方尊〉（05980，H=29 cm，圖版 8：5c）為一套器。作文考日己組的年代略晚，其方觥的尾部變成誇大的馬尾狀。以上這幾組器物應該足夠說明在西周前期偏晚有方彝、觥與尊成套的現象。[176]

具有完整的尊、方彝、觥組合的除了上述「 爾」與「作文考日己」兩組以外，還有傳世的「丏甫組」與陝西扶風莊白窖藏出土的「作冊折組」。「丏甫組」的〈丏甫方彝〉（09844，H=27.6 cm，圖版 8：9）與〈丏甫觥〉（09252，H=21.8 cm，圖版 8：9b）在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丏甫方尊〉（05576，H=22.7 cm，圖版 8：9c）在美國明尼亞波里斯藝術博物館，銘文均為「丏甫」。方彝的器身部分還維持上下兩段，下段較高的型態。饕餮紋中間的篦形紋與角紋合一，也不如前述幾組搶眼。蓋斜度較陡，蓋面紋飾分上下兩段，以下段為主。從風格上判斷，其年代早於 爾組。「作冊折組」是扶風莊白微史家族器物群的一組，〈作冊折方彝〉（09895，H=41.6 cm，圖版 8：8），與〈丏甫方彝〉形制類同，但鼓腹較圓，蓋頂較陡，有四組誇張的扉棱。〈作冊折觥〉（09303，H=29.2 cm，圖版 8：8b），特色同樣是扉棱誇張。〈作冊折尊〉（06002，H=32.8，圖版 8：8c）則為圓尊，饕餮紋為羊角饕餮。由上例可見方彝、觥、尊的組合中，尊不一定要方尊，圓尊亦可。此組是比較典型西周早期「炫麗風格」的青銅器。以上這些器物，只要有銘文，或有族徽，且有受祭者時均

---

[175] 湖北省博物館，《晉國寶藏：山西出土晉國文物特展》（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頁 65-71；李進增主編，《晉國瑰寶：山西出土晉國文物精華錄》（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11），頁 44-46；大連現代博物館、山西博物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晉國雄風：山西出土兩周文物精華》（瀋陽：萬卷出版公司，2009），頁 58-62。

[176] 崎川隆，〈關於西周時期飾有「上卷角獸面紋」的青銅器〉，頁 388-405。

有日名，可以推測作器者為商遺貴族。原本是商遺貴族整套放在禁上，以為祖先獻祭的器物。到了西周前期偏晚，也有周系貴族使用，如前引〈仲追父方彝〉。

由於有不少傳世器物雖然並無尊、方彝、觥的完整組合，但是有三件中之兩件，可以與上述完整組合器並觀，而得到此種器物組合更好的年代架構。例如，傳出於河南洛陽馬坡，西周最早期的〈作冊夨令方彝〉（09901，H=34.1 cm，圖版 8：11，銘文長不錄，受祭者有日干，族徽「鳥丙冊」），現藏弗利爾藝廊。〈作冊夨令方尊〉（06016，H=28.6 cm，圖版 8：11c），現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原本或有觥，現已不存。作器者作冊夨令的長官——「明公」（周公子明保）為成周的行政長官，故此組器可能是西周早期洛陽北窯鑄銅作坊的產品。

「 組」包括現藏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館的〈 方彝〉（09885，H=29 cm，圖版 8：10， 作父辛寶尊彝。幸），[177] 與弗利爾藝廊的〈 觥〉（09292，H=22.9 cm，圖版 8：10b）。[178] 這兩件器仍然是商式的饕餮紋，《殷周金文集成》將〈 方彝〉時代訂為西周中期，卻將〈 觥〉訂為西周早期，應當是〈作冊夨令方彝〉銘文出現「康宮」，根據唐蘭的「康宮（康王之廟）說」把許多同類器物年代往後移所致，筆者認為從觥與方彝的風格演變上看，扉棱仍然相對簡單，西周早期才是正確的，甚至不排除為殷墟末期，其年代早於「作冊夨令組」。這組器有另一組同銘拓片，《殷周金文集成》列於方彝（09884），不過，如是方彝應該有器與蓋兩個拓片，但此器卻只有一拓片，當為方尊之拓片，其器形見於《懷米山房吉金圖》，此器缺上半段喇叭口部分，推測盜掘出土時上部被壓壞，古董商鋸掉上段販售（圖版 8：10c）。[179] 所以 組是完整的，只是方尊目前所藏不詳。

「叔 組」包括傳河南洛陽馬坡出土，現藏洛陽博物館的〈叔 方彝〉（09888，H=33 cm，圖版 8：12，叔 賜貝于王姒，用作寶尊彝），[180] 與弗利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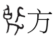
---

[177] 泉屋博古館編集，《泉屋博古・中國古銅器編》（京都：泉屋博古館，2002），頁 46-47。

[178] 高解析度照片見國家亞洲藝術博物館網站："Square lidded wine ewer (*fangguang*) with taotie, dragons, and birds" (https://asia-archive.si.edu/object/F1949.10a-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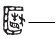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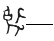
[179] 清・曹載奎，《懷米山房吉金圖》拓本，「史語所數位典藏資料庫整合系統——青銅器拓片資料庫」（https://ihparchive.ihp.sinica.edu.tw/ihpkmc/ihpkm_op?!!NO^4441303030303037343238，瀏覽 2024.07.05）。

[180]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 5》，No. 132。

藝廊的〈叔方尊〉（05962，H=27 cm，圖版 8：12c），[181] 器開始變得矮胖，扉棱也更誇張，從風格上判斷，要略晚於作冊夨組。

與「叔 組」約略同時代的還有傳為洛陽出土的「榮子組」，包括〈榮子方彝〉（09880，H=32.8 cm，圖版 8：13，榮子作寶尊彝）現藏美國芝加哥美術館（Art Institute of Chicago）。同套的〈榮子方尊〉（05843，H=27.7 cm，圖版 8：13c）現藏日本神戶白鶴美術館。[182] 另外在日本東京根津美術館藏另一件〈榮子方彝〉（09881，H=26.2 cm，圖版 8：13-2），比芝加哥美術館者要小，但形制、銘文完全相同。[183] 所以，此似為一尊與大、小方彝配套。榮子家族是商遺貴族，可由「榮子旅」器的受祭者為「父戊」而確定。

靜置酒器組合的另一例是「盠組」，是陝西眉縣李村出土，現藏陝西歷史博物館。同樣有一尊：〈盠方尊〉（06013，H=17.4 cm，圖版 8：6c，銘文長不錄，受祭者為文祖益公，已無法確定為商遺貴族）；[184] 二方彝：〈盠方彝甲〉（09899，H=22.8 cm，圖版 8：6-1，銘文同方尊）、〈盠方彝乙〉（09900，H=18 cm，圖版 8：6-2，銘文同方尊）。[185] 此組器的特徵是正面主紋飾為冏紋，兩側長出「耳」，像一個象鼻。大小方彝基本相同，但是小〈盠方彝〉（即〈盠方彝乙〉）器身內部中央有隔板，區分成兩空間，其正面有兩孔，可以放兩件斗。這是一尊兩方彝：一大、一小的組合，與「榮子組」的狀況相同。可見，靜置酒器有不同組合。[186]

以上方彝、觥、尊的組合，我們大致依據相對年代，從左到右，從上到下進行排列，大體上是—作冊夨令—叔—榮子—折—丏甫— —作文考日己組的順序，盠組則在丏甫之後另成一系。筆者認為方彝、觥、尊的組合應當是確定的，而且在西周早期殷周雙軌制度中被允許使用的商遺貴族為身分較高者。至於方彝、觥、尊何時開始？筆者所知年代最早的一套觥、方彝搭配為現藏北京故宮博

---

[181] Pope et al., *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 Vol. 1 Catalogue*, pp. 110-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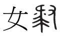
[182] 白川靜，《白鶴英華》，頁 32-33，No. 10。

[183] 根津美術館編，《龍虎の世界》（東京：根津美術館，1986），No. 1；根津美術館編，《根津美術館藏品選・工藝篇》（東京：根津美術館，2001），No. 13。

[184]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吉金鑄華章：寶雞眉縣楊家村單氏青銅器窖藏》（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頁 245-249。

[185]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吉金鑄華章》，頁 250-261。

[186] 馮峰，〈論西周青銅器中的尊、方彝（尊、方彝、觥）組合——兼談其與尊、卣組合的關係〉，《三代考古（八）》（北京：科學出版社，2019），頁 281-307。關於尊、方彝、觥的組合，這篇文章的收集比本文詳細，讀者可以參考。

物院的〈王之女 方彝〉（NA1636，H=29.5 cm，圖版 8：7），[187] 與著錄於《西清古鑑》32.9 的〈王之女觥〉（09287，圖版 8：7b）。[188] 雖然此組器的觥為橢圓形圈足，並非長方形圈足，但是兩器的紋飾均為無底紋的几字形角饕餮紋。亦即在殷墟 III 期之際，可能由於兩者都屬酒器，而且有比較明顯的陳列功能，因此，已經開始有將方彝與觥進行配套的作法，雖兩者器型皆保持原來型態，但紋飾互相搭配。開始改變銅器的基本造型，讓器物彼此間看起來更像同一套的東西究竟何時開始？

關於此一課題，具有「亞醜。者姤以大子尊彝」銘文的青銅器十分重要，是殷墟末期青銅器的重要指標之一，共有一甗、一爵、二方尊、二觥、一方彝、二方罍。前面我們已經建立了其中一件方彝與觥之間成套的關係，仔細觀察分別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者姤方尊〉（05936，H=45.5 cm，圖版 8：2c）[189] 與藏於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的〈者姤方尊〉（05935，H=45.7 cm，圖版 8：2c-2），[190] 兩者幾乎完全相同。它們與〈者姤方彝〉與〈者姤觥〉間的關係有數端：銘文相同、方形器、弧形外撇的圈足、主體紋飾為几字形角的饕餮紋、搭配的紋飾多為鳥紋等。相對地，在殷墟 II 期，原本方尊常與方罍一起出現，但是北京故宮的〈者姤方罍〉（09818）的主要紋飾卻未與〈者姤方尊〉搭配。因此，筆者認為〈者姤方彝〉、〈者姤觥〉與〈者姤方尊〉是成套的，而且原來很可能有兩套。在端方的《陶齋吉金錄》中，還著錄第二件〈者姤觥〉（09294，H=32.8 cm，圖版 8：2b-2），[191] 但因為清代圖錄上的線繪圖有些扭曲，且不排除此器可能在被盜掘之後，被古董商修補整形過，所以看起來與出光美術館的〈者姤觥〉並不完全相同，可惜目前所藏不詳，無法驗證。由於此處的尊為有肩尊，而西周流行的方彝、觥、尊的組合是以觚形尊，由此可見商代晚期的有肩尊與觚形尊，在商貴族的概念中是同一種器。

方彝與觥在器形上互相搭配，與觥這類器的發展有關：在殷墟 II 期，以哈佛藝術博物館典藏的〈 雨觥〉（09254，H=25 cm，圖版 8：14）為例，[192] 器形為

---

[187] 故宮博物院，《故宮青銅器圖典》，頁 61，No. 42。

[188] 梁詩正等，《西清古鑑》卷 32，頁 9。

[189] 故宮博物院，《故宮青銅器圖典》，頁 46，No. 30。

[190] 陳芳妹，《故宮商代青銅禮器圖錄》，頁 512-521。

[191] 端方，《陶齋吉金錄》卷 3，頁 34。

[192] 高解析度照片見哈佛藝術博物館網站：“‘Gong’ Covered Ritual Wine Vessel with Tiger and Owl Decor” (https://hvrd.art/o/303630)。

橢圓形圈足，鼓腹，後有把手。器與蓋間有側看為 S 形的接口。蓋的前方為虎首，後方為鴞首，器身的主紋飾搭配蓋，後方為鴞的翅膀，前段則飾以虎身。圈足的紋飾延續器身，前有虎尾，後有鴞足。此種器的製作，基本上是一種雕塑，完成整體造型以後再進行分範與切範，需要相當高的製作技巧，且不易多人聯手合作。殷墟 II～III 期之間，起了一些變化，可以山西靈石旌介村商墓出土的〈饕餮紋觥〉（H=30 cm，圖版 8：15）為例，[193] 為了降低鑄造時的技術門檻，這件觥很明顯地區分為圈足、腹與頸三段，腹與頸之間為水平分範的段落，兩者中間有一段無紋飾的空白帶，腹以下平直且上下切面均為橢圓，容易製作垂直的四分範，如此分段只要掌握頸腹交接處的基本尺寸，腹部與頸部甚至圈足部可以分開處理，由兩、三個團隊同時製作圈足與上、下兩段的陶範。大約在殷墟 IV 期，主流的觥又起了變化，可以美國西雅圖藝術博物館（Seattle Art Museum）的〈癸萬觥〉（09265，圖版 8：16）為例。[194] 這件器只存器身，不過，此一階段的變化就出在器身。這一階段新出現的觥圈足由橢圓形變為長方形，從頸部以下，包括圈足，是完全的長方形器，更容易製作，頸部以上處理的方式與上一階段基本相同。注意這件觥的器口，其尾部仍近於橢圓形，維持著觥蓋既有的造型。再下一階段，我們可以陝西延長岔口出土的一件〈 父丁觥〉（NB0770，H_b=17.6 cm，圖版 8：17）為例，[195] 其形制與出光的〈者姤觥〉相同，最重要的變化是其器與蓋接口的尾部圓角做成了方形。筆者認為此一改變是為了與新出現的帶有雙耳的方彝搭配成套。由於這件觥可能是分器而來到關中地區，未來或許可能發現與它搭配成套的雙耳方彝也在關中某座分器墓中出現。

這種方彝、觥、方尊的配套關係延續到西周早期與中期，比方傳世的「 組」、陝西扶風莊白微史家族窖藏中的「作冊旂組」、傳世的「丏甫組」、山西絳縣橫水墓葬的「 爾組」、陝西扶風齊家村窖藏出土的「作文考日己組」也是成套的。不過，方彝也不一定要有雙耳，觥的尾部也就不需要做成方尾以配合方彝。尊也不一定要是方尊，圓尊也可配套。似有一個從較嚴格的器形與細部與紋飾搭配，到較寬鬆的器類與紋飾搭配即可。

殷墟末期開始，青銅酒器中的靜置器開始形成不同器組合成套，最經典的是

---

[193] 海金樂、韓炳華，《靈石旌介商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頁 162-166。

[194]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海外遺珍・銅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5），No. 30。

[195] 曹瑋主編，《陝北出土青銅器》第 2 卷（成都：巴蜀書社，2009），頁 172-173。

尊—大卣—小卣在禁上，或方彝—大卣—小卣在禁上，其次是方彝—觥—尊的組合，以及尊—大方彝—小方彝的組合等。其中尊—大卣—小卣的組合比較簡單，常放置在漆盤或漆禁上。因此不排除方彝—觥—尊與尊—大方彝—小方彝也可能放置在漆盤或漆禁上。

這種靜置器組合成套的出現，顯示殷墟末期商王朝在禮儀上的變化，原本以飲酒器為核心的爵、觚搭配飲酒中服務用的斝、尊、罍的組合，其背後是動態的飲酒禮儀。改變成禁組，或一尊兩卣置放在漆盤上，以及方彝、觥、尊的組合等，都顯示靜態的展示與祭祀的需求增加。這些組合有些在西周時代流傳下來，有些則否。希望孝民屯以及其他殷墟鑄銅作坊材料發表更多以後，或許有進一步的資訊可以了解晚商銅器與禮儀相關的變化。

結論：分器墓——窺探殷墟末期的青銅器的一扇窗

在石鼓山戴家灣會議舉辦期間廉海萍針對大〈戶卣〉芯土的測試報告，成為關鍵的「風向球」，在她的報告以前，還有不少學者認為石鼓山墓葬的青銅器，包括製作精美的各種炫麗銅器，例如「戶禁組」與粗疏的乳釘紋簋與鼎都同樣是關中製造的。也就是認為周在克商以前即有很高的鑄銅技術，但個別工匠間手藝的精粗差異很巨大。廉海萍的報告指出戶禁組的銅器中的大〈戶卣〉蓋上鳥喙的盲芯屬於安陽芯土，而非關中或侯馬芯土。換言之，寶雞恐有大量的炫麗銅器顯然是安陽製造的。這對筆者的「分器說」形成了很重要的另一個支柱。猶未死心的論者，將問題轉向，變成殷墟的作坊是否延續到牧野之戰以後，也就是說這轉向認定牧野戰後殷墟作坊持續運作，這些炫麗青銅器是在牧野戰後到作坊轉移到成周與關中這一段期間製作的。所以，筆者在此有必要再對牧野之戰進行一些討論。牧野之戰是一場規模極大的戰爭，不僅雙方動員人數極多，而且最終商王朝的死傷非常慘重，可能的死亡人數超過十七萬人，[196] 當時整個大邑商人口推估也不過五十萬以內。[197] 周方在牧野戰後，大軍曾經由牧野（在河南淇縣）往北

---

[196] 關於牧野之戰參戰人數討論，見屈萬里，〈讀周書世俘篇〉，氏著，《書傭論學集》（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69），頁 412-432；黃銘崇，〈「殷周革命」新論——邁向「人文的」國家〉，黃銘崇主編，《中國史新論・古代文明的形成分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6），頁 307-378，討論見頁 346-347。

[197] 關於大邑商的人口計算的討論，見黃銘崇，〈晚商王朝的政治地景〉，黃銘崇，《中國史新論・古代文明的形成分冊》，頁 165-305，討論見頁 196-207。

至大邑商，可能劫掠並縱火焚燒商都城，殷墟末期的建築留下燒灼的痕跡，且將銅器埋入窖藏或擲入井裡以避免被周人劫掠。[198] 周方還盜掘王陵區大墓以及不少容易辨識位置的貴族墓葬區，因為商貴族墓上有祭祀建築稱「宗」，成為盜掘的指標。盜掘以後，並未回填，四處都有被掘的墓坑以及廢土堆，任憑風吹雨打。[199] 數年之後，箕子由燕國附近，要往成周與宗周拜見周天子時，路過殷墟，眼見一片荒蕪，因此有「麥秀」之詩（《史記‧宋微子世家》）。可以想像，戰後的大邑商應當慘不忍睹，即使有青銅器作坊持續運作，恐怕也只會專注於軍需，也就是為周王朝鑄造兵器以補充戰損。有不少人，特別是商貴族階級逃亡至他處，甚至遠達湖北、湖南，以避此大劫難。由於鑄銅工匠有很大的利用價值，可能原本就未在被徵召參戰之列，因此多數倖免，但是大戰完畢，聚落嚴重受損，要想立即恢復青銅器的生產，訂單還來自關中與其他封地，需要設法將銅器運到關中與其他封地，在這一個騎馬與驛站都未建立的時代，筆者以為此一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從當時整個歷史進程看，牧野戰後不到兩年，周方很快即面臨武王去世的重大事件，所有的高級貴族都捲入內部權力鬥爭以及對外戰役中，應當也無暇、無心製作精美的銅器以自娛。而且，四處奔波的大貴族們，在兵馬倥傯之際，還可以分心向位在安陽的作坊下青銅器訂單，並且需要大費周章運回關中，實在匪夷所思。在七年（1037 BCE）以後，周公東征大致底定，營建成周於洛陽，就把還居住在殷墟地區的殷遺民，遷徙到成周、關中以及其他封國。其中成周與關中就包括大量的工匠，特別是銅器鑄造的工匠。洛陽北窯的成周新作坊因為屬於全新規劃，規模宏大，其面積達 20 萬平方公尺，[200] 是孝民屯作坊規模的 4 倍。開工之際，作坊的風格與殷墟末期完全一樣，因為都是同一批工匠，而且一開始周王朝對於青銅禮器的使用，沒有明確的規範與限制，所以成周作坊早期的產品與殷墟末期大邑商的產品風格相同，此點可以從少數紋飾比較清楚的殘存陶範略窺其端倪（圖版 9：1）。也可以取幾組同類器物互相比較，第一組：洛陽西周北窯墓葬出土的〈鼓母方罍〉（09780，H=50.3 cm，圖版 9：

---

[198] 何毓靈，〈殷墟劉家莊北地青銅窖藏坑性質探析〉，頁 96-100。

[199] 何毓靈，〈殷墟王陵早期被盜年代研究〉，《考古》2014 年 6 期：92-100；井中偉，〈殷墟王陵區早期盜掘坑的發生年代與背景〉，《考古》2010 年 2 期：78-90。

[200]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1975-1979 年洛陽北窯西周鑄銅遺址的發掘〉，《考古》1983 年 5 期：430-441, 388。

2），[201] 與日本東京出光美術館收藏的一件〈亞醜方罍〉（09765，H=45.5 cm，圖版 9：3）。[202] 前者可能是洛陽作坊產品，後者可能出自山東青州蘇埠屯，年代為殷墟晚期。有趣的是林巳奈夫等學者純粹從形態學斷代，將〈鼓母方罍〉訂為殷墟晚期。其實洛陽地區在晚商時期的遺址很少，出土青銅器更少，〈鼓母方罍〉出自洛陽北窯龐家溝 M6，基本上是西周早期墓葬，而整個洛陽北窯出土的基本上是西周時代的器物。次為洛陽北窯 M37 出土的〈王妊簋〉（03344，圖版 9：4），[203] 與香港思源堂舊藏，現藏瑞士玫茵堂的〈耒簋〉（02969，圖版 9：5），[204] 前者為西周早期洛陽作坊產品，後者為殷墟晚期。洛陽西周北窯 M37 出土的〈白懋父簋〉（NA0334，圖版 9：6），[205] 墨書「白懋父」三字；與美國國家亞洲藝術博物館的〈肆簋〉（04144，圖版 9：7），[206] 是晚商少數的長銘文器。前者為西周早期洛陽作坊產品，後者屬於殷墟晚期。以上三例雖然有限，但可以看得出來，除非是從考古發掘的脈絡或銅器銘文提供訊息，否則即使最厲害的青銅器專家也很難分辨殷墟末期安陽生產與西周前期洛陽生產的銅器。這就是為何西周早期銅器斷代如此困難，因為洛陽作坊是安陽作坊的延續，而且兩者在風格上是延續的，沒有斷層。

筆者提出的「分器論」為區分安陽與洛陽作坊提出了一個系統的方法：在「典型分器墓」中，僅有安陽作坊以及關中先周作坊的作品。先周作坊製作的銅器，只有乳釘紋盆式簋、弦紋盆式簋、素面盆式簋、以及簡化饕餮紋鼎等主要類型，還有大量軍需兵器與工具。其他製作較精緻的銅器，基本上都是「分器」所得，也就是安陽製造。在「局部分器墓」中，有分器所得，也有關中作坊的仿製品，也有遷移至關中與洛陽的大邑商工匠的作品，必須依賴銘文以及製作的精粗區分。依據此一大原則，既然能夠大體區分安陽製造的青銅器，我們就可以回頭過來討論「殷墟末期」的青銅器。換言之，分器墓的銅器研究，提供我們窺探殷墟末期青銅器的一扇窗。本文就是利用這一扇窗，討論一部分殷墟末期青銅器。

---

[201]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北窯西周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彩版 7。

[202] 出光美術館編，《中國古代の美術》（東京：平凡社，1989），No. 82，解說頁 205，拓本 61a-b。

[203]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北窯西周墓》，彩版 4。

[204] 李學勤，《中國青銅器萃賞》（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2000），頁 56-57；Tsao, *Trésors de la Chine ancienne bronzes rituels de la collection Meiyintang*, p. 108, No. 65。

[205]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北窯西周墓》，彩版 5。

[206] Bagley,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pp. 520-536.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選取了直棱紋作為主軸，它是殷墟 III 期開始出現的一種新型紋飾。殷墟工匠發現以直棱紋搭配鳳鳥紋等，可以創造青銅器的炫麗性，加上誇張的扉棱、出戟、與把手等等，形成了高強度紀念性的新配方。這些器類都有以下特徵：

一、只在西周早期的分器墓或殷墟 IV 期的墓或殷墟 IV 期其他考古遺址中出現。

二、若有銘文，銘文都是商貴族銘文，也就是包含族徽與日干等商貴族名號特徵。

三、陶範在安陽孝民屯的作坊出現。

四、有些銅器的泥芯進行分析，其三種稀有元素的三維比例落在安陽區塊，而非關中或侯馬區塊。

五、同類器物的演化斷點在西周前期的早段，不再繼續演化。

本文討論的直棱紋鳳鳥紋卣、直棱紋觶、四耳乳釘紋簋、直棱紋附耳鼎、直棱紋鳥紋尊與卣、直棱紋簠、棘羽鳳鳥紋器等，都大致具有上述特徵，大多數器類或紋飾，在進入西周以後就不再製造，有少數進入西周在洛陽作坊還有生產，但很快地，因為西周王朝的銅禮器政策與周貴族美學抬頭而停產了。

以上，我們從西周早期的分器墓中出土的銅器，搭配殷墟孝民屯出土的陶範，殷墟劉家莊北地等出土的殷墟 IV 期銅器窖藏，以及殷墟以外的晚商遺址出土的銅器，企圖勾勒殷墟末期的青銅器的某些樣貌。分器墓中的銅器讓我們看到一些殷墟末期銅器的形制、紋飾、風格，甚至深入討論器物的組合與背後相應的禮儀的改變。例如禁組的出現、一尊兩卣放置在禁或方盤上、以及方彝、（方）尊與觥組合的出現，都顯示殷墟末期，在禮制上靜態擺設變得重要。原有強調動態的飲酒器爵、觚，搭配直接與飲酒有關之斝、罍、尊等組合雖然沒有消失，但是靜置組合在高級貴族之間的需求大增。這背後，當然是殷墟末期商王朝在禮儀、禮制上有質變，未來還可以再深究。

分器的結果使得許多晚商銅器進入西周早期的墓葬中，所以墓葬的分期與銅器的分期並不一致，因此西周早期銅器的斷代，必須重新調整。Rawson 過去認為周在克商以前已經有很強的鑄銅工業，生產高品質的青銅禮器。現在看來，周方在克商以前，鑄銅可能主要聚焦於「軍需」，打造兵器、工具與戰車的配件。鑄造青銅禮器主要以乳釘紋盆形簋、弦紋盆形簋、素面鼎與變形饕餮紋鼎等，滿足周方自己的禮制需求為主，其品質不佳，特別是紋飾施作水準不高。西周前期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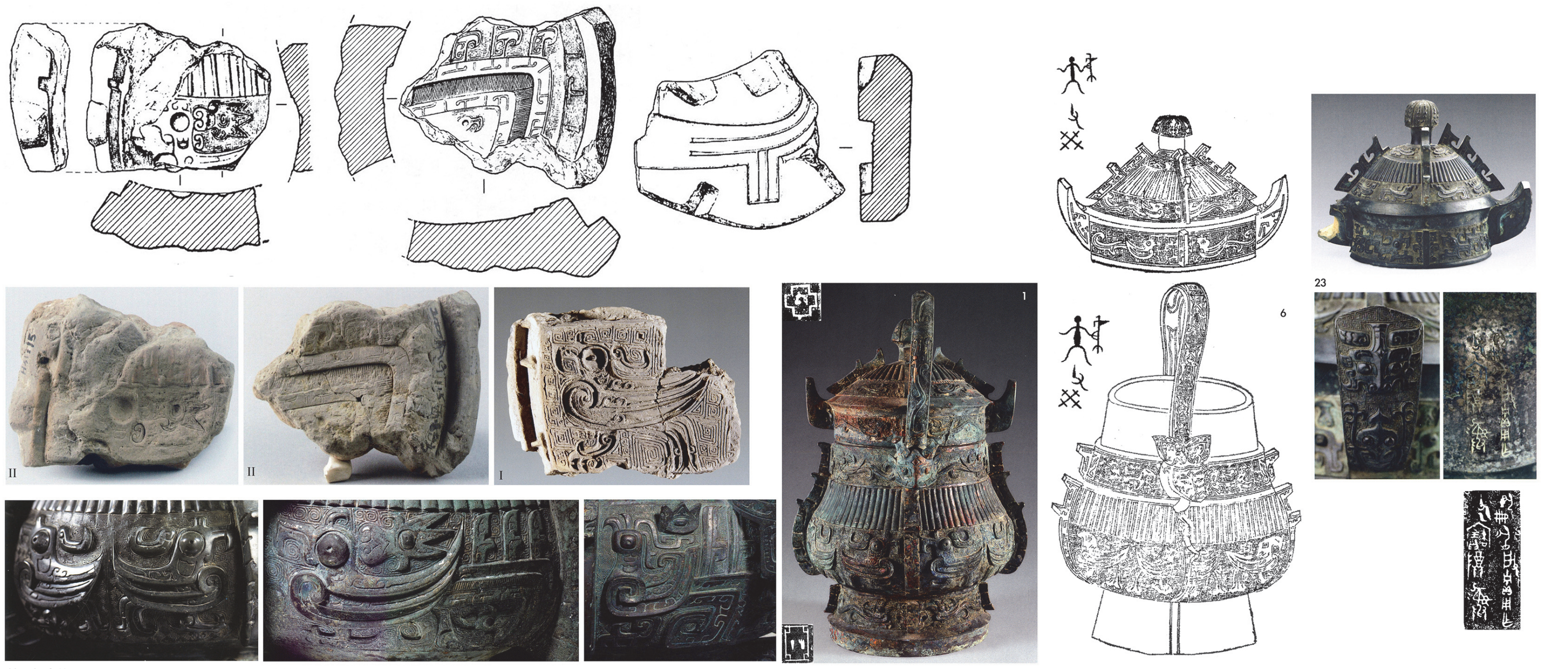
段墓葬裡的高品質青銅禮器，絕大多數都是殷墟生產，作為戰利品而進到關中的周貴族墓中。Rawson 也認為寶雞禁組不可能從同一脈絡出土，因為有些屬於「保守風格」有些屬於「炫麗風格」。但是石鼓山 M3K3 出土證明她的詮釋是錯誤的，保守的與炫麗的銅器在同一壁龕中出土。比對石鼓山 M3K3 與柉禁（鼎氏禁組）包括附屬的其他酒器，鼎氏禁組與歸屬一起的其他酒器，很可能是寶雞戴家灣一座西周初期的分器墓出土的。以上討論的銅器絕大多數是比較炫麗的，還有更多屬於保守風格的銅器，從銘文上判斷也是晚商安陽作坊的產品。筆者認為炫麗與保守，主要是鑄造銅器者的階級高低以及不同的使用需求所致，而非不同作坊或不同區域性風格的影響。

本文只揀選一些證據較多的器類與紋飾來討論，筆者認為還有更多殷墟末期的青銅器，未來可以從殷墟青銅作坊的陶範或模，或殷墟出土的銅器，或者從銅器殘存或包覆的泥芯檢測而得到證實。Rawson 也認為區域性鑄造傳統，特別是南方鑄造傳統對於西周青銅器的影響，筆者認為這個論點也不能成立。很多學者喜歡討論南方傳統，但往往是根據銅器出土的地點而論。筆者認為在商末周初南方鑄造青銅器的確有一個或兩個很強的工藝——就是鑄造大鐃與鎛的技術傳統，它們是在中商時期，商王朝對於鑄銅工業控制鬆脫時，鑄銅工匠離散而流出的。大銅鐃與銅鎛的鑄造要到西周前期的後段，才影響到周王朝的樂器鑄造。目前討論南方鑄造傳統的很多論點，特別是禮容器方面，至今都沒有證據，特別是作坊的證據。本文中一再強調廉海萍檢測泥芯的方法，是一個可以系統性採用的方法，能夠檢測銅器的生產地，雖然只限於有泥芯的器物，但是普遍地檢測，可以科學地釐清青銅器的產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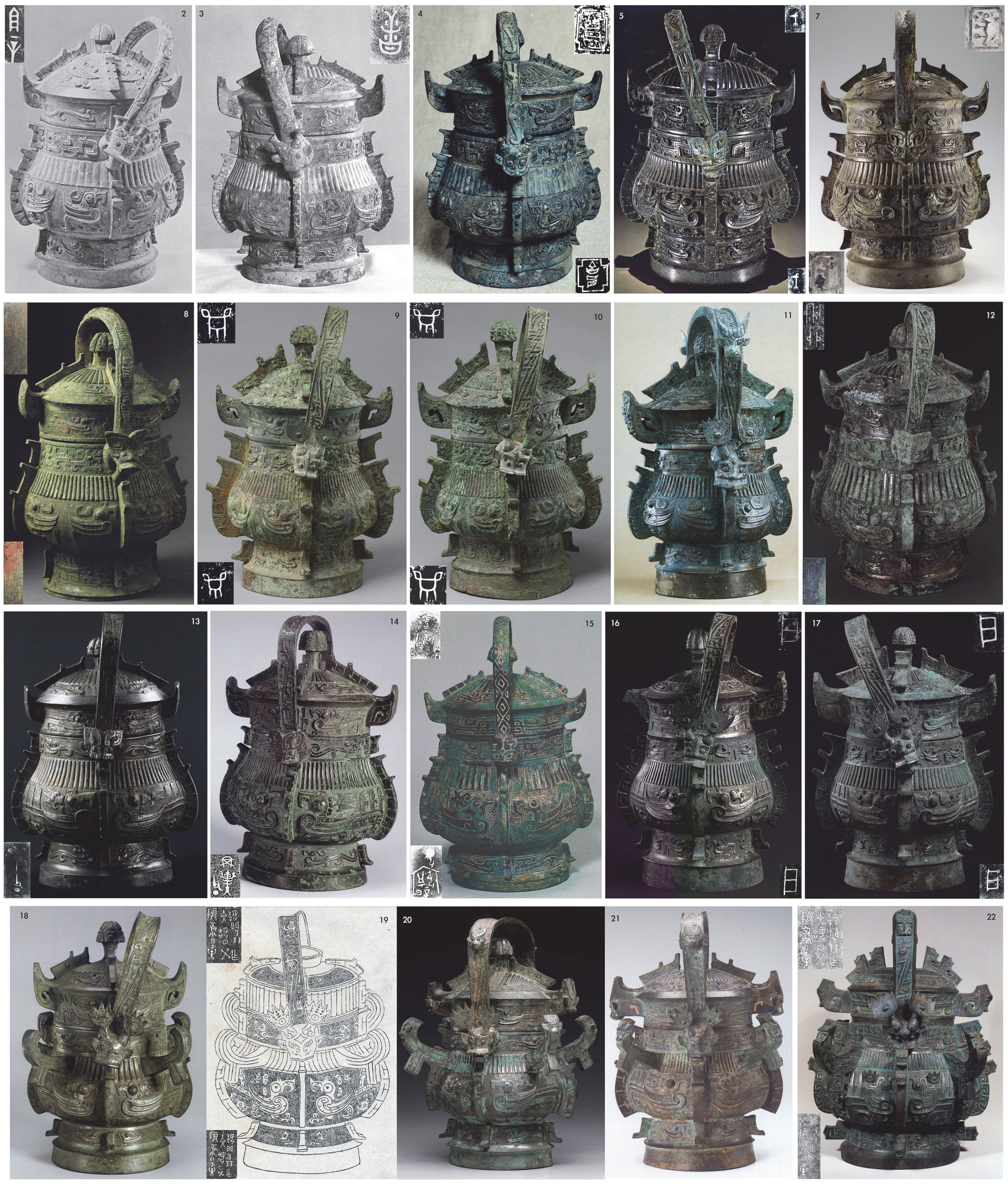
從青銅器的鑄造與使用來看，殷墟末期是東亞青銅時代的頂峰。然而，我們無法在殷墟出土的殷墟 IV 期的青銅器中看到此種「炫麗性」與燦爛輝煌的程度，因為殷墟在克商戰役後戰利品的掠奪下被掏空了；所以，殷墟考古出土屬於殷墟末期（殷墟 IV 期）的銅器、玉器卻相當罕見。如果沒有考古材料搭配傳世與出土文獻綜合地討論，有很多問題無法得到合理的解釋。

（本文於民國一一一年元月七日收稿；一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通過刊登）

圖版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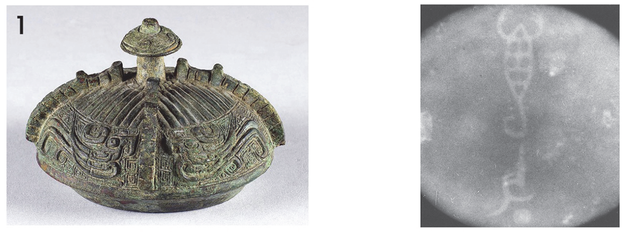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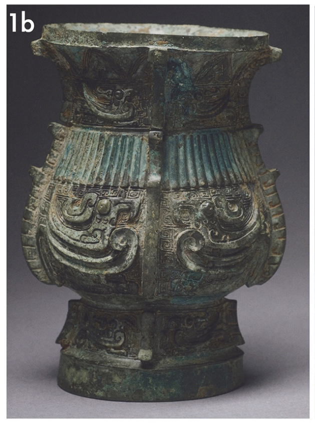
第 I 類鳥紋　第 II 類鳥紋　第 III 類鳥紋


2
3
4
5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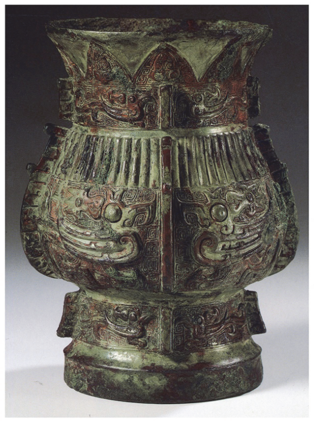
圖版 2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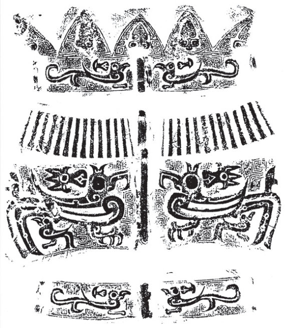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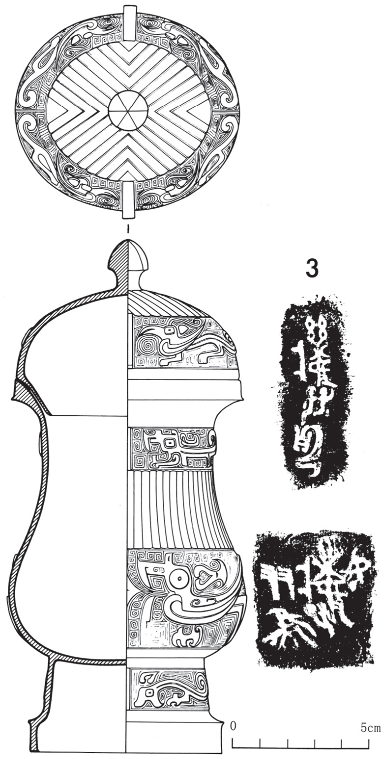


斯德哥爾摩 東方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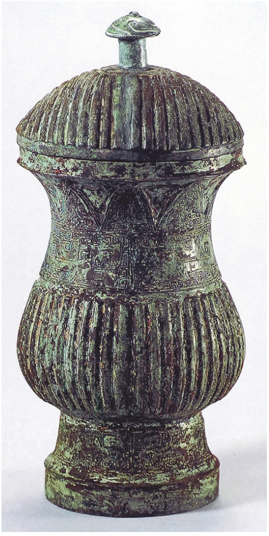


柏林 東方藝術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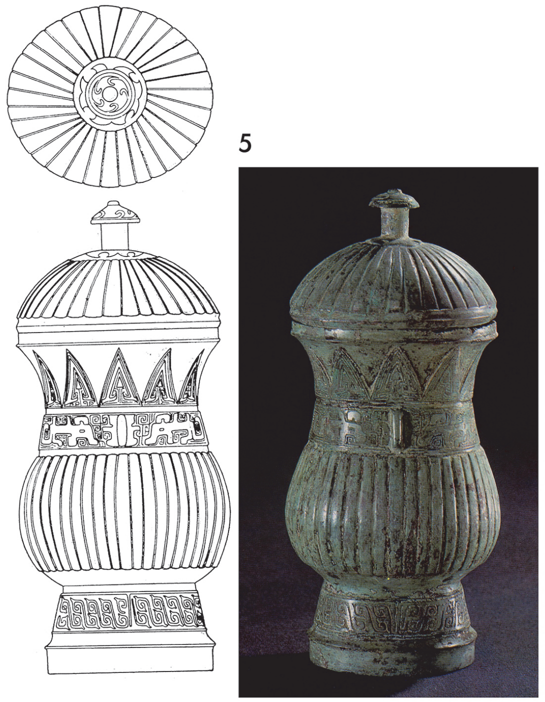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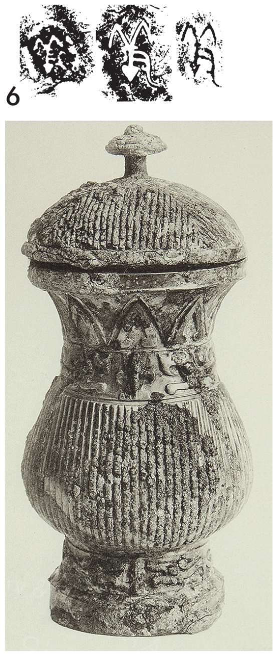
滕州前掌大 M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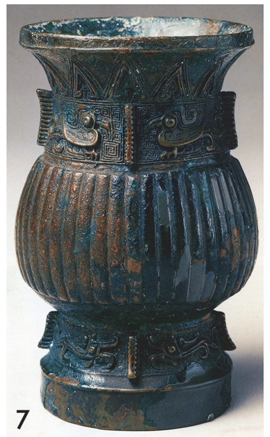
孝民屯南地 M907: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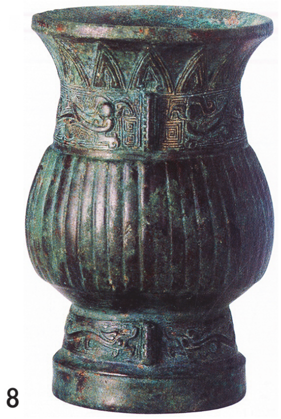
孝民屯南地 M90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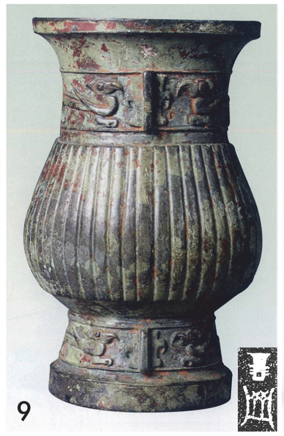
金澤 東馬三郎舊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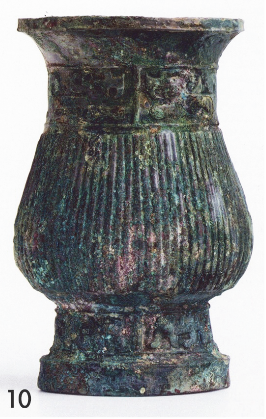
台北故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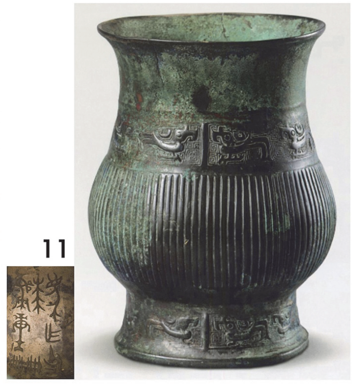
千石唯司舊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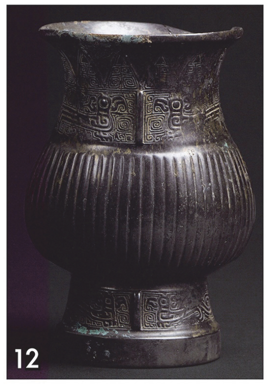
流散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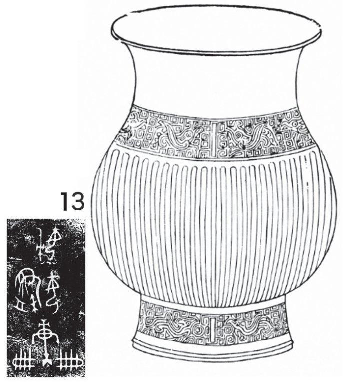
玫茵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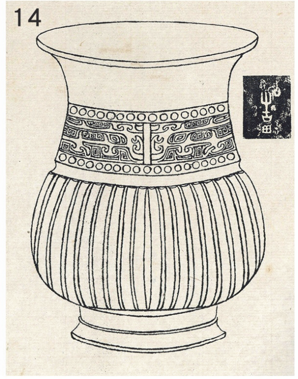
竹園溝 M7



石鼓山 M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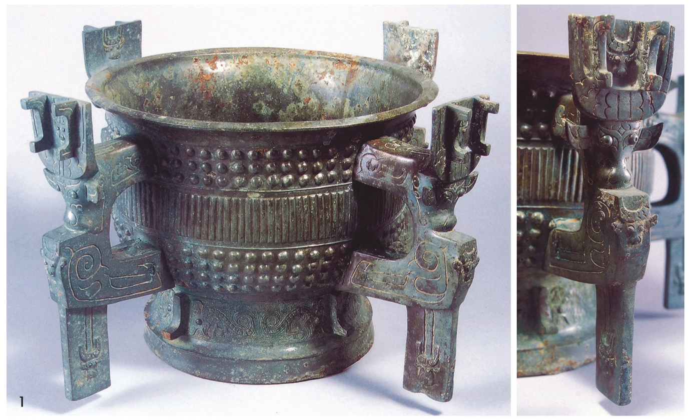


《長安獲古編》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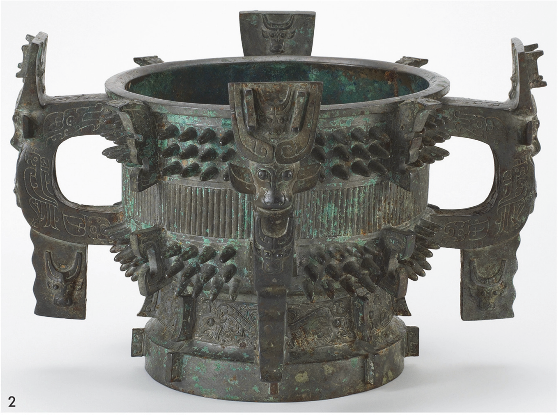


《陶齋吉金錄》3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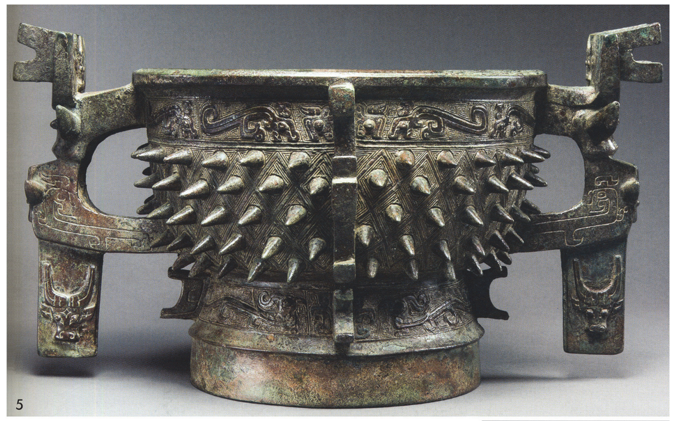
圖版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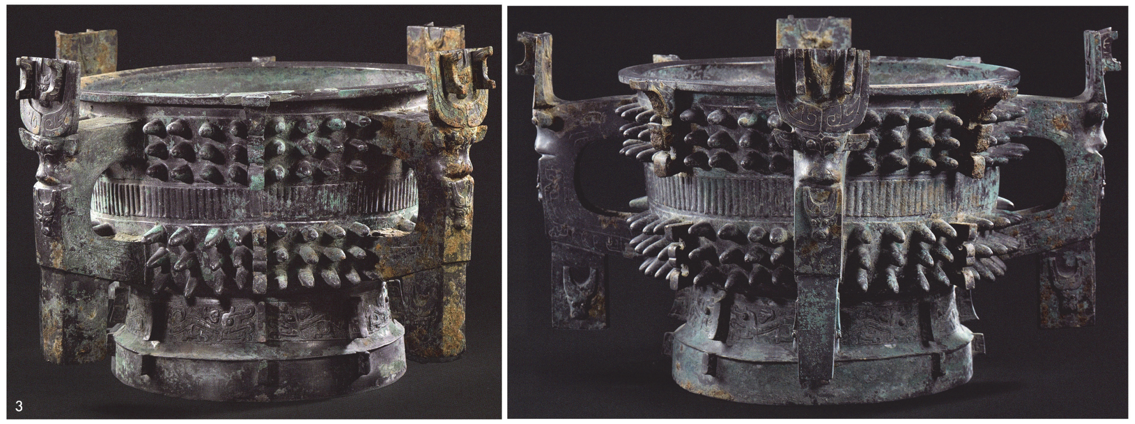
寶雞紙坊頭M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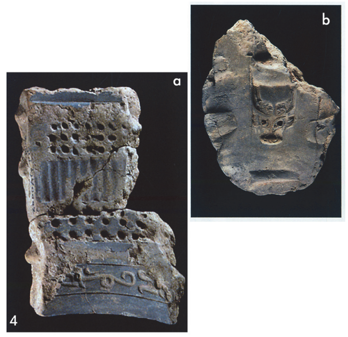
華盛頓特區·弗利爾藝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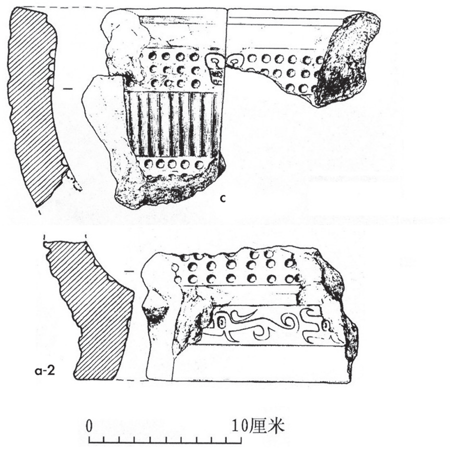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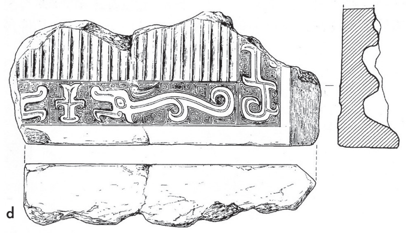
巴黎·基美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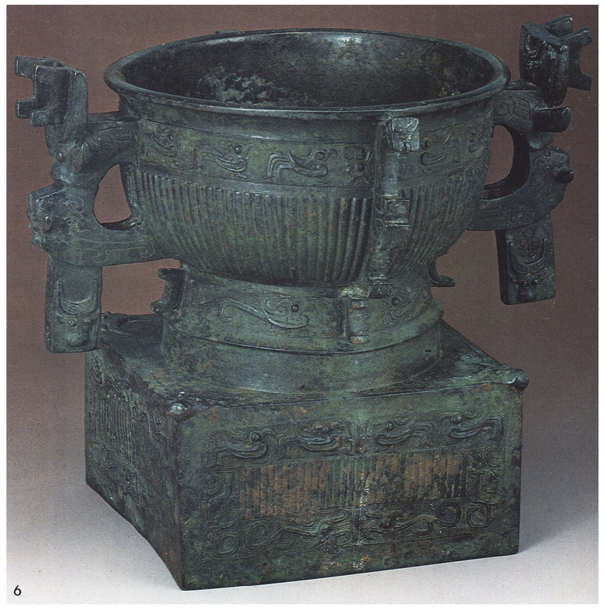
寶雞石鼓山 M4 K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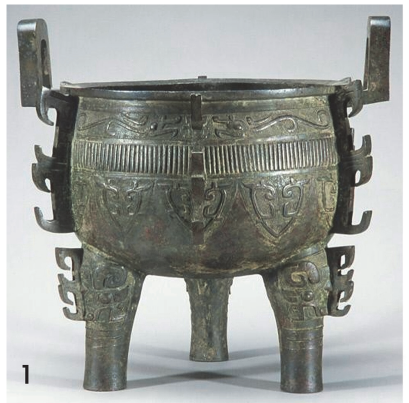


安陽孝民屯鑄銅作坊出土陶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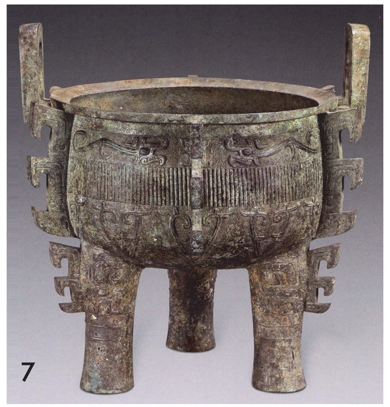
台北·故宮博物院

圖版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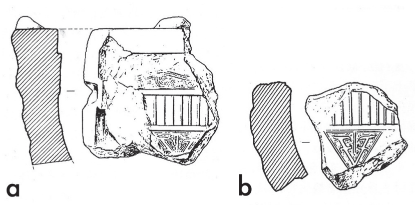
1

亞洲藝術博物館·舊金山
寶雞戴家灣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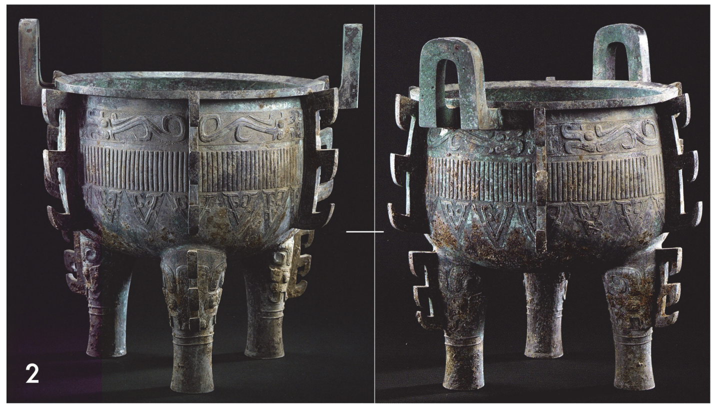


7

遼寧喀左小波汰溝窖藏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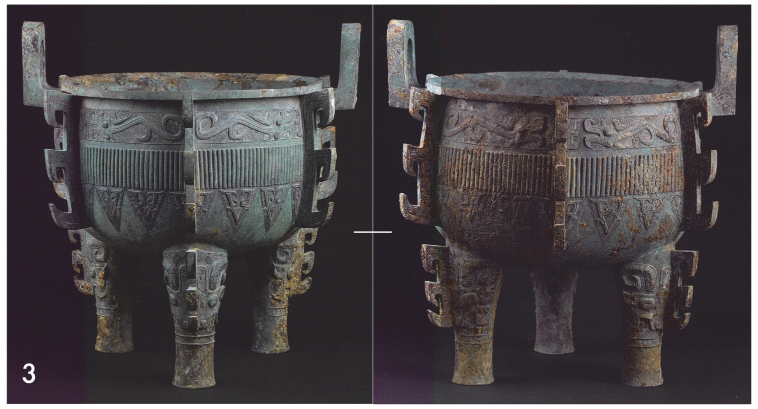


孝民屯鑄銅作坊出土的
直棱紋鼎陶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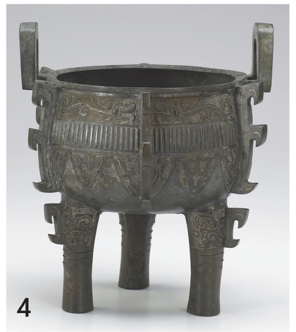
2

寶雞石鼓山M4K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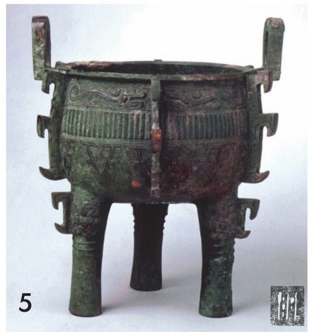
3

寶雞石鼓山M3K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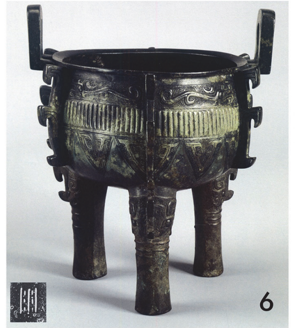
4

賽克樂藝廊·華盛頓特區
寶雞戴家灣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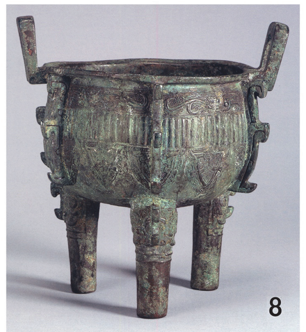
5

北京·故宮博物院
寶雞戴家灣出土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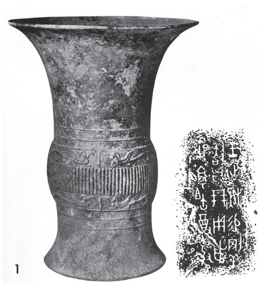
上海博物館
寶雞戴家灣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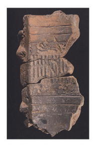
8

上海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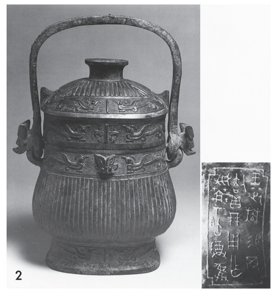
圖版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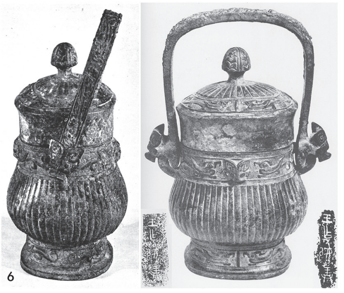
〈㓜劫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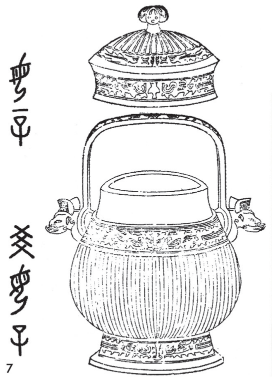
孝民屯陶尊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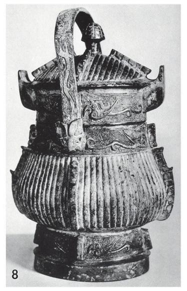
〈㓜劫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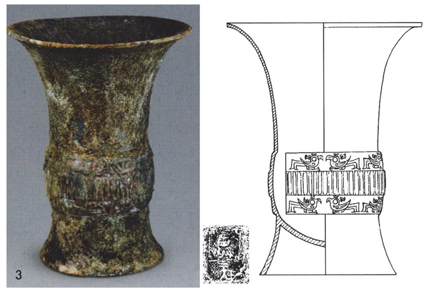
〈王作姛弄卣〉正、側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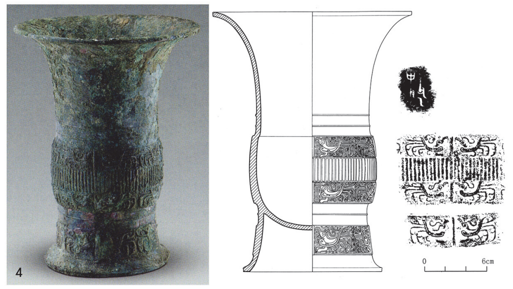
〈夊母辛卣〉，《博古圖》9.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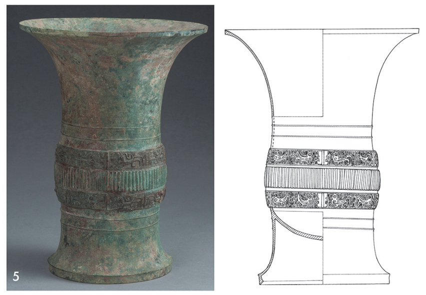
〈直稜紋卣〉太田貞造舊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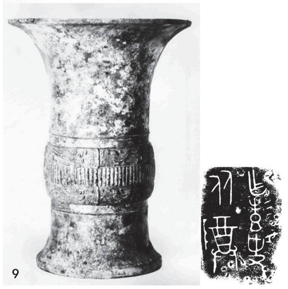
〈亞㠱疑父癸尊〉，安陽劉家莊北地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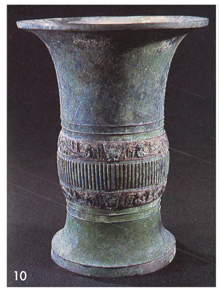
〈史父乙尊〉，滕州前掌大M121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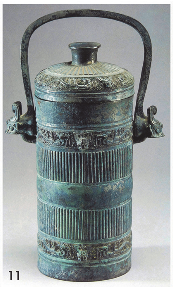
河南鶴壁劉莊西大坡墓地M3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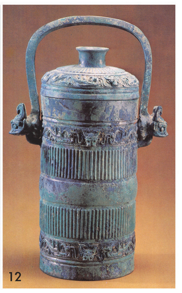
〈作彭史從尊〉，黑川古文化研究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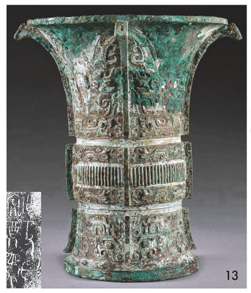
〈直稜紋鳥紋尊〉竹園溝M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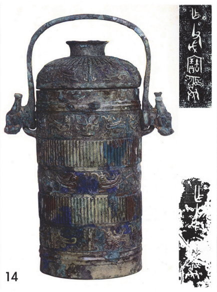
〈直稜紋鳥紋卣〉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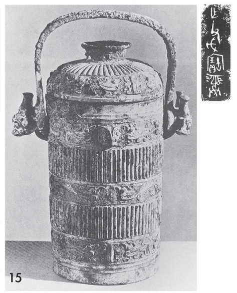
〈直稜紋鳥紋卣〉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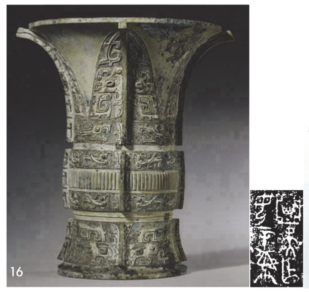
〈作父戊尊〉，克里夫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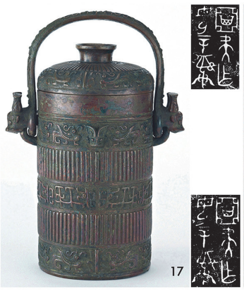
〈作父戊卣〉，白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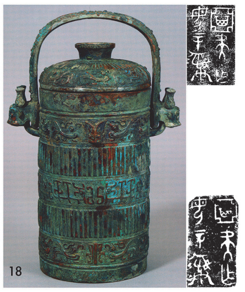
〈作父戊卣〉，Oeder舊藏



〈亞㠱疑作母辛尊〉，蘇士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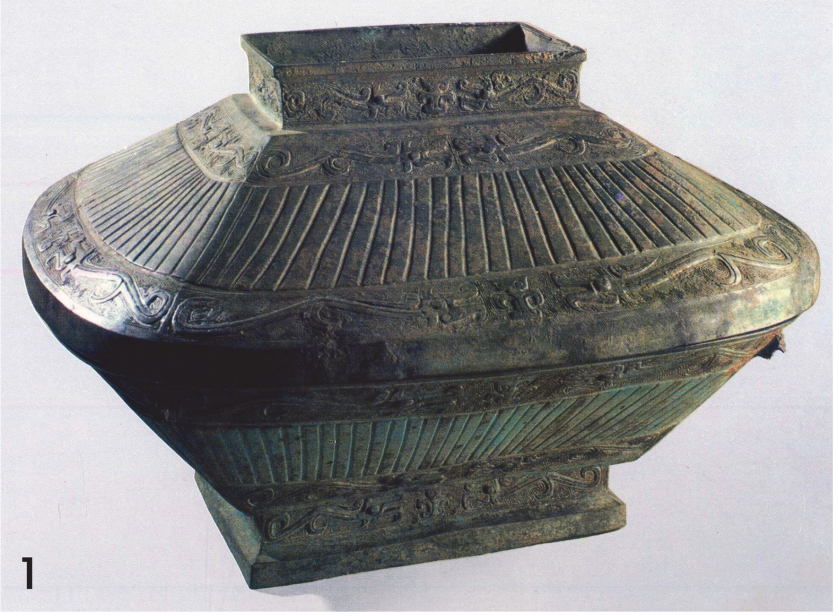


〈亞㠱疑作母辛卣〉，弗利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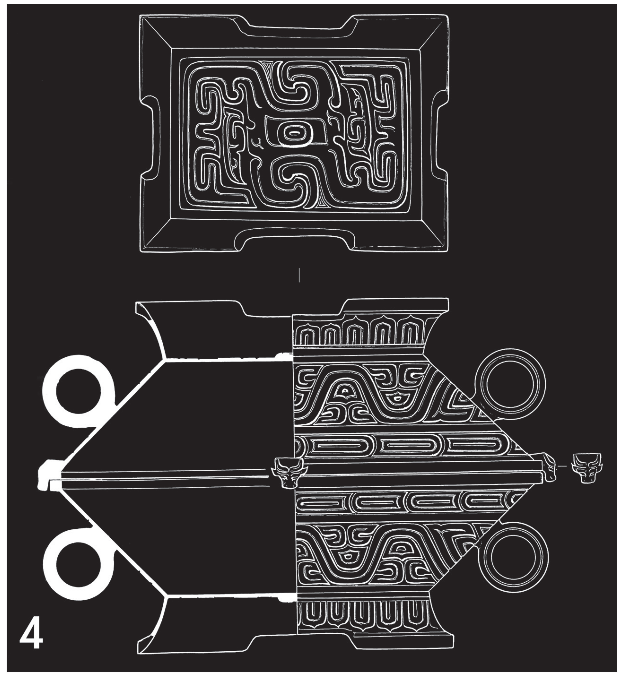


〈亞㠱疑作母辛卣〉，出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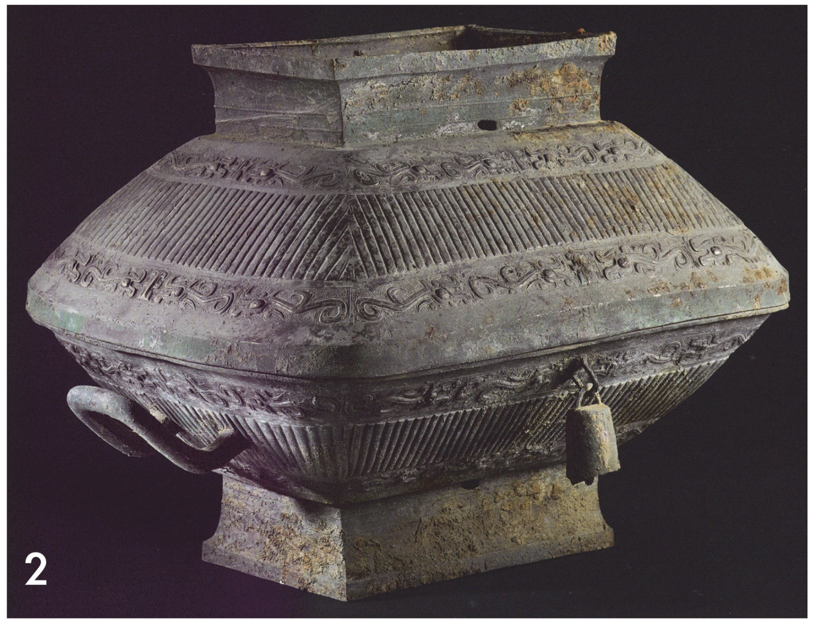
圖版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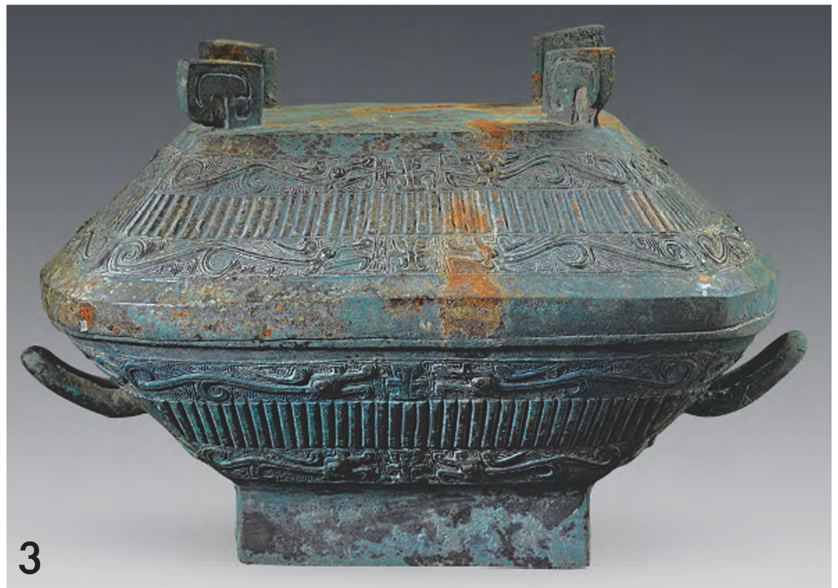


北京·故宮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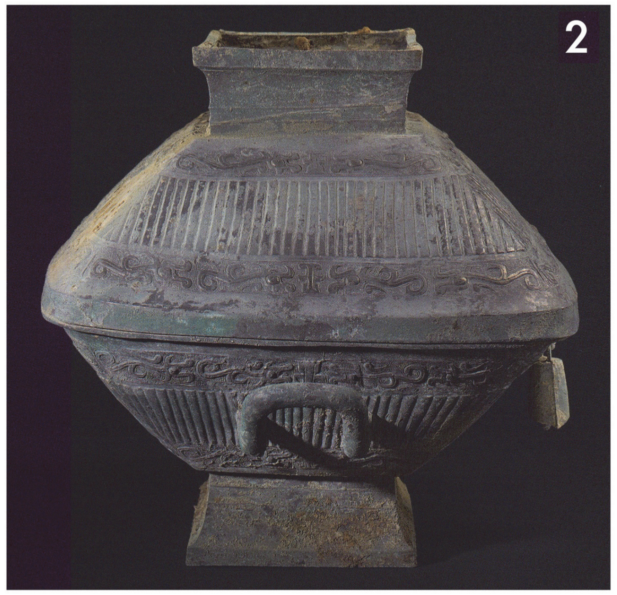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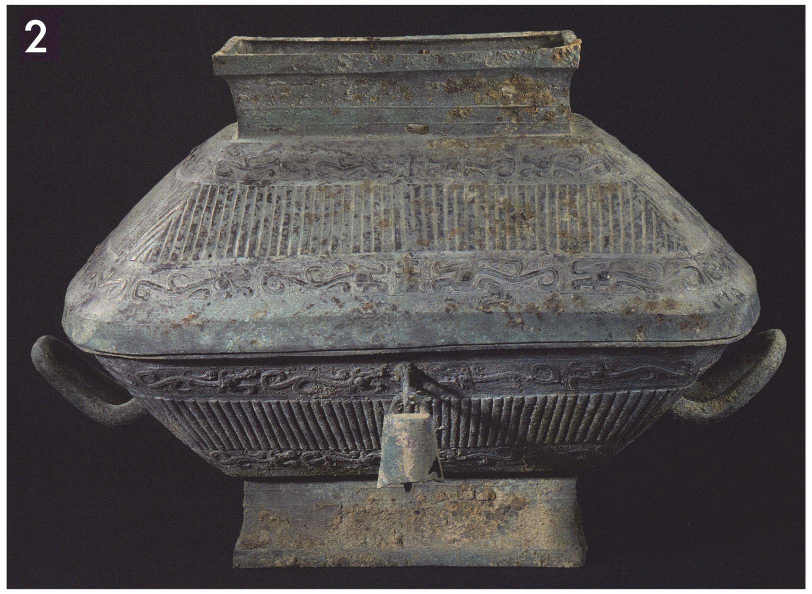
扶風雲塘窖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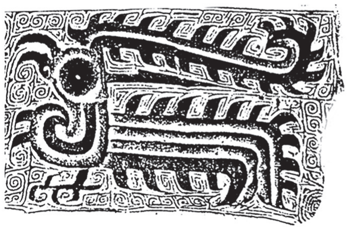
寶雞石鼓山M4K8-8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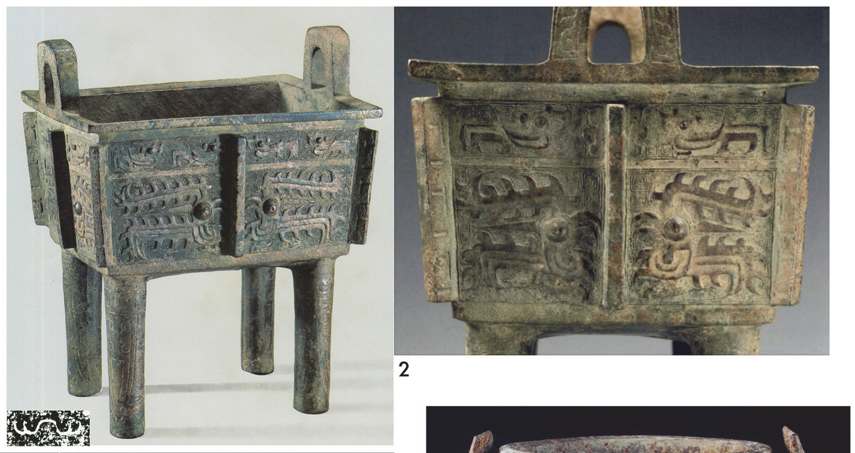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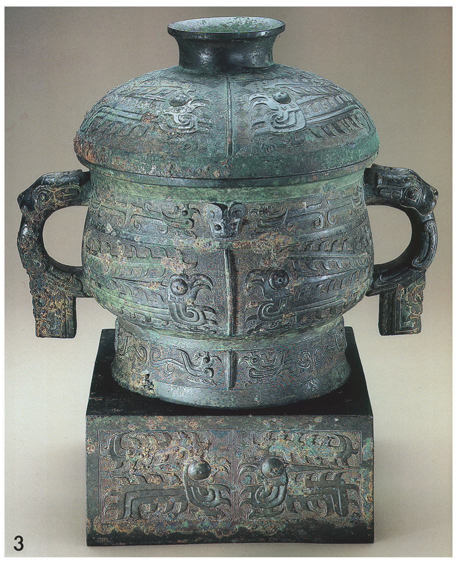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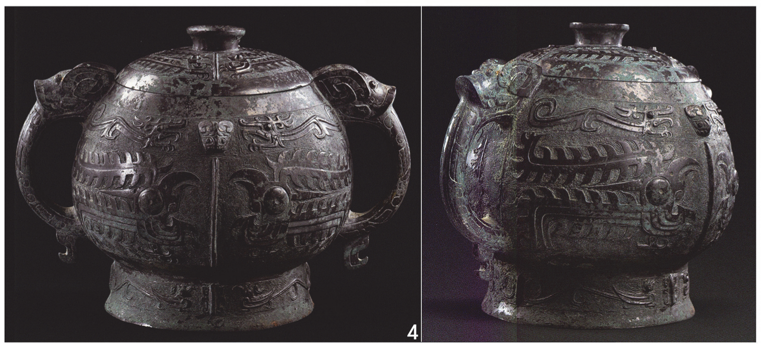
寶雞石鼓山M4K8-8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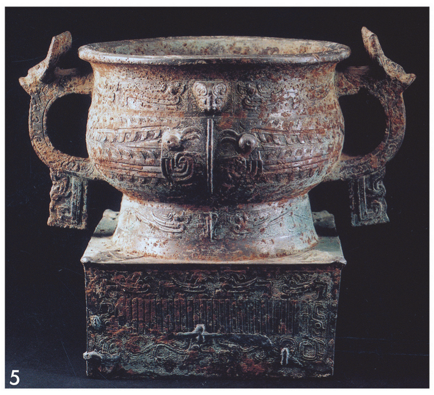
圖版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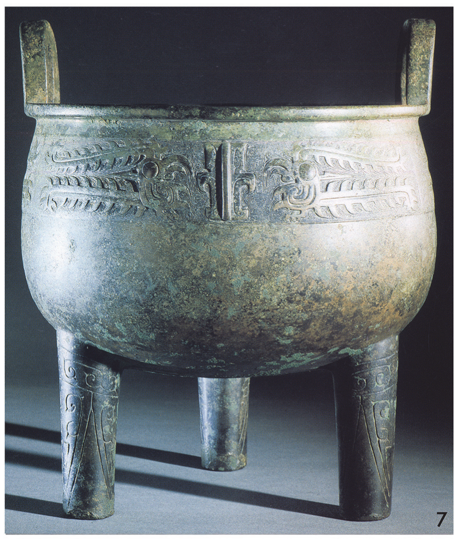

棘羽大鳥紋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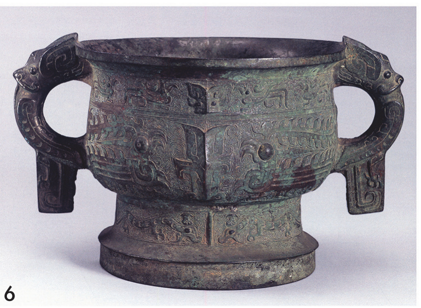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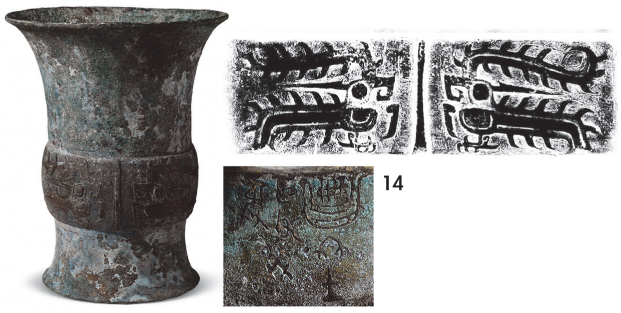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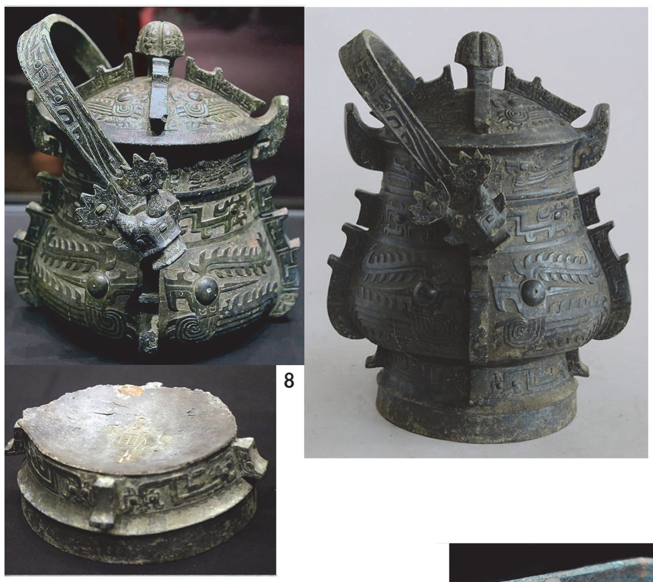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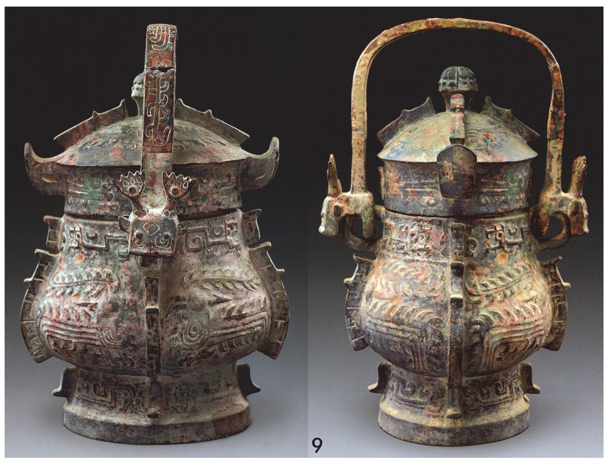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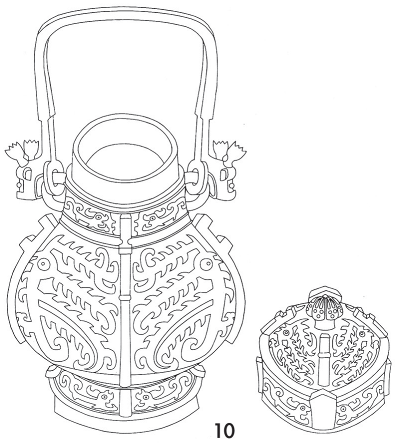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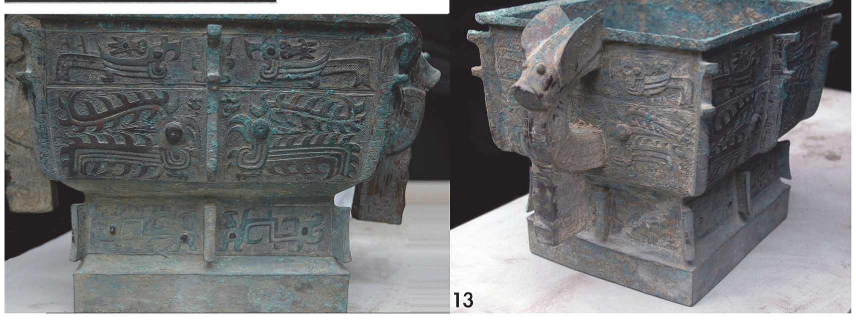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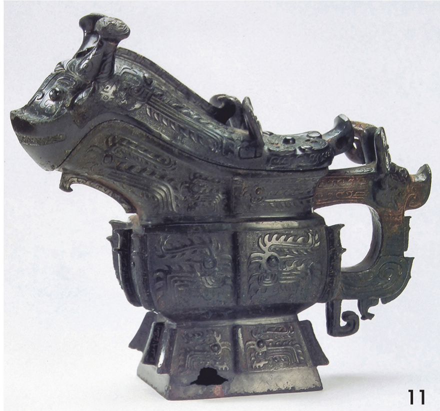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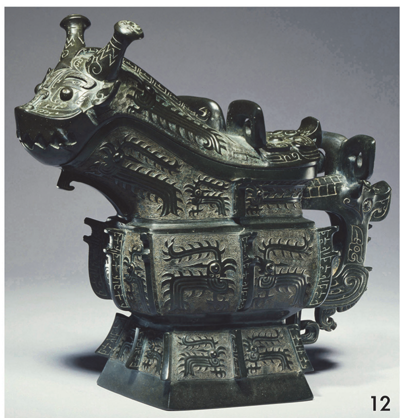

8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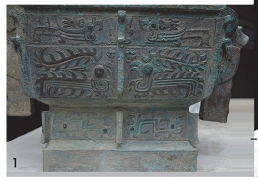

10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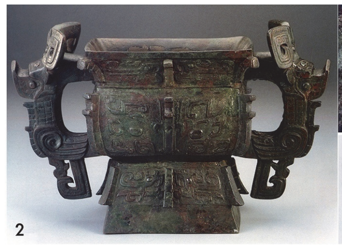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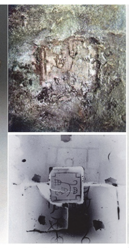

12

圖版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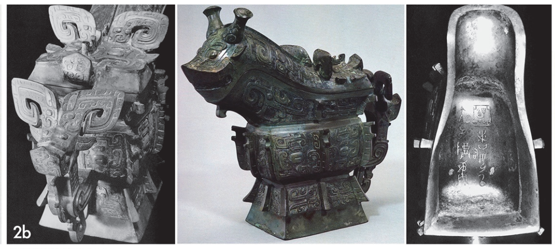

1 山西臨汾龐杜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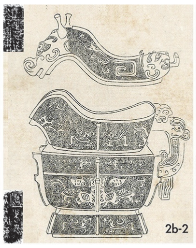
側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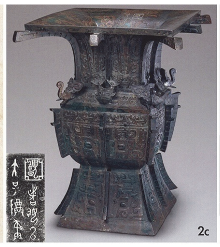

2 國立故宮博物院·台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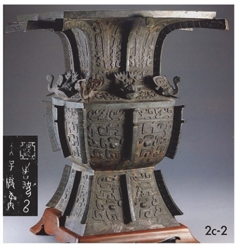

X 光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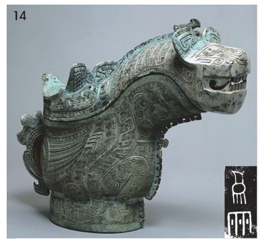
側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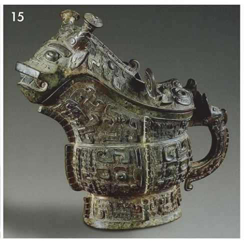

2b 出光美術館·東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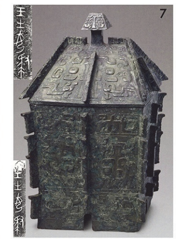

2b-2 端方舊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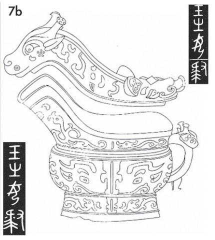

2c 故宮博物院·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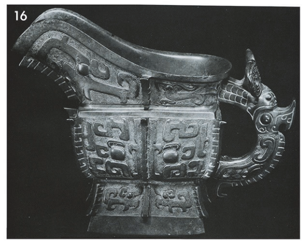

2c-2 國立故宮博物院·台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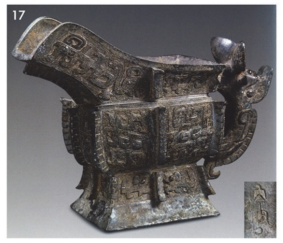

14 哈佛大學賽克樂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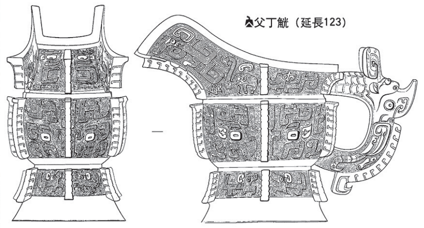

15 山西靈石旌介村出土


7 故宮博物院·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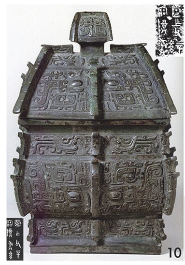

7b 清宮舊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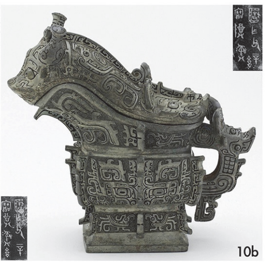

16 西雅圖藝術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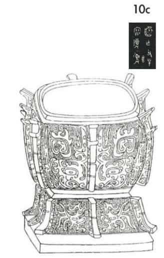

17 陝西延長岔口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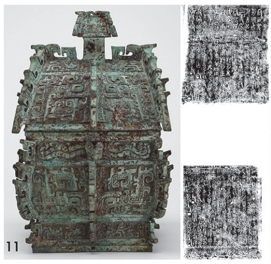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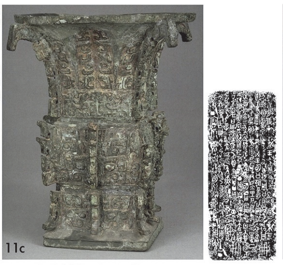
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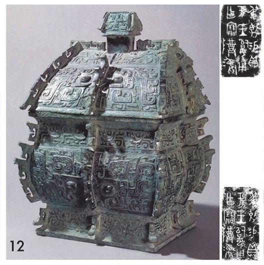

10 泉屋博古館·京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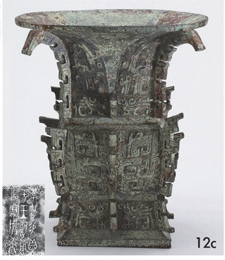

10b 弗利爾藝廊·華盛頓特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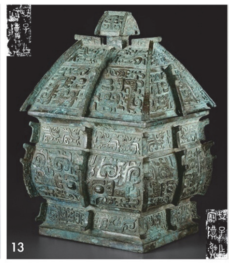

10c 方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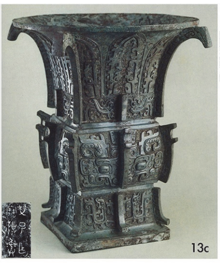

11 弗利爾藝廊·華盛頓特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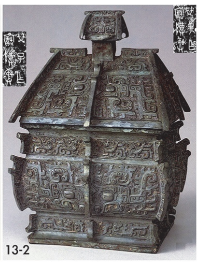

11c 國立故宮博物院·台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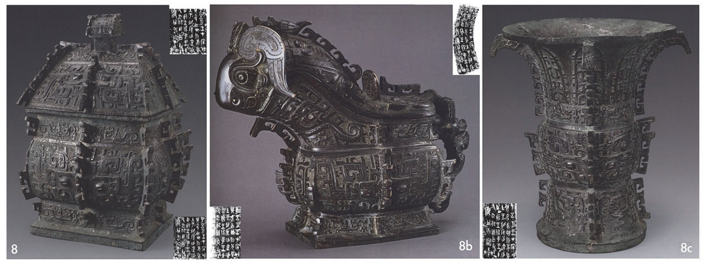

12 河南洛陽馬坡出土 洛陽市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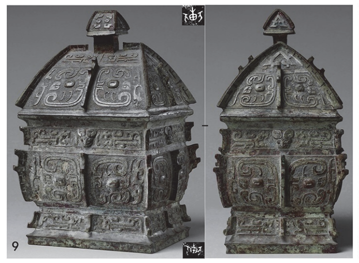

12c 弗利爾藝廊·華盛頓特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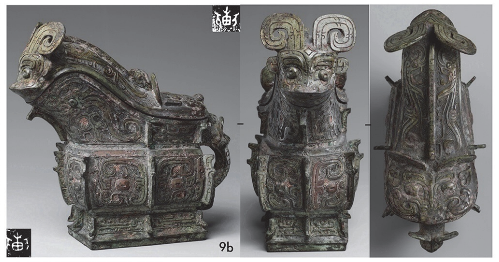

13 芝加哥美術館·芝加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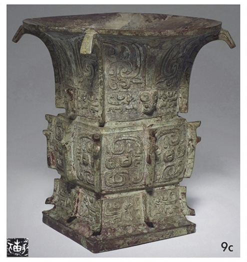

13c 白鶴美術館·神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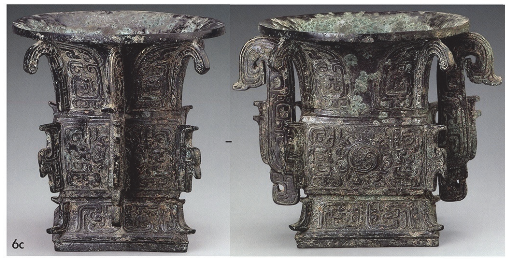

13-2 根津美術館·東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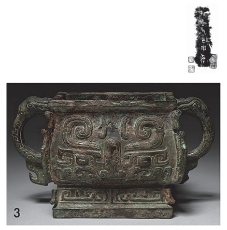

8 8b 8c 陝西扶風莊白窖藏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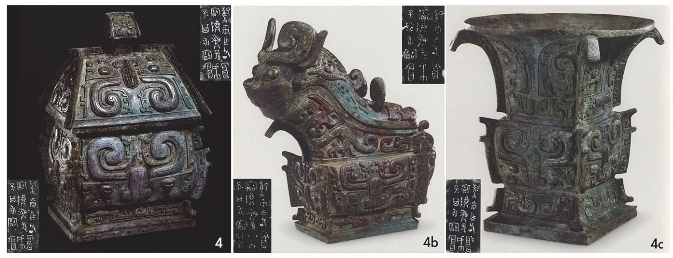

9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紐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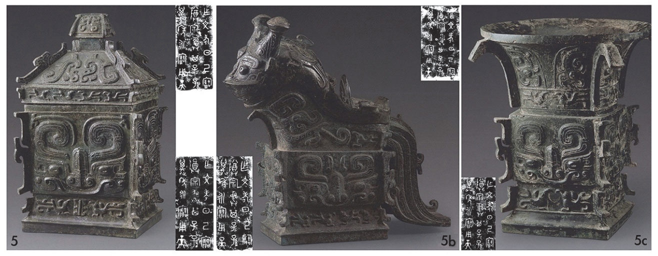

9b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紐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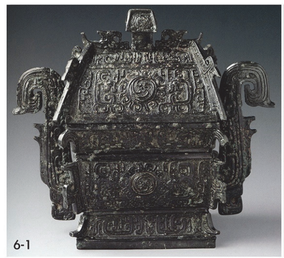

9c 明尼亞波里斯藝術博物館·明尼亞波里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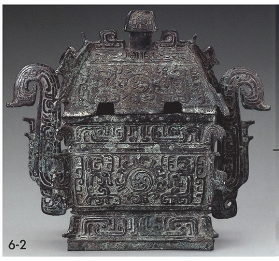

6c 陝西眉縣李村出土 現藏陝西歷史博物館「盠組」


3 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克利夫蘭


4 4b 4c 山西絳縣橫水墓地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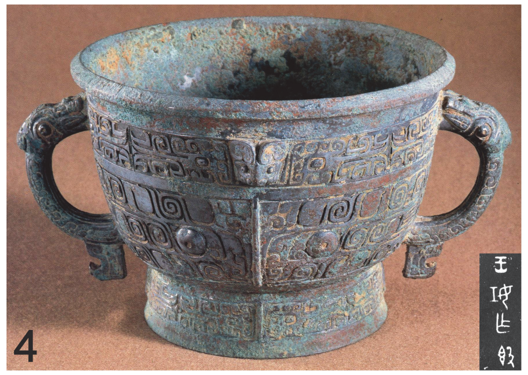

5 5b 5c 陝西扶風齊家村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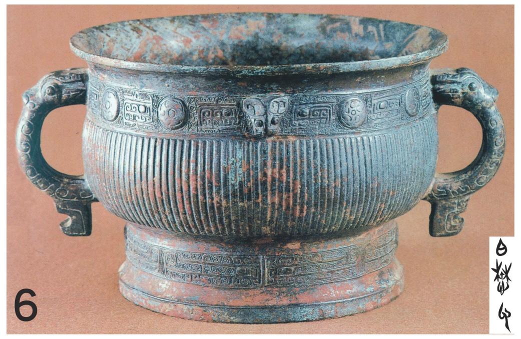

6-1 甲「盠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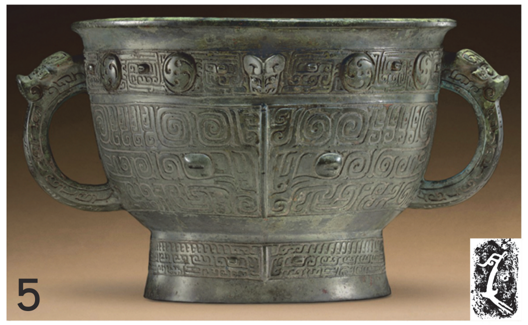

6-2 乙「盠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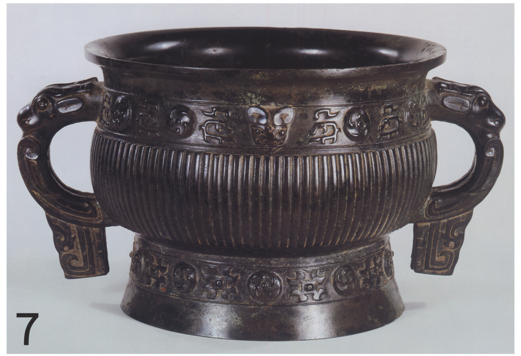
側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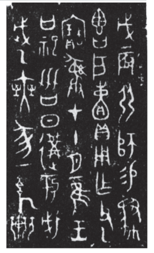
圖版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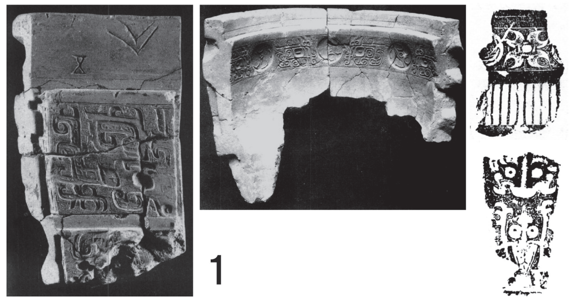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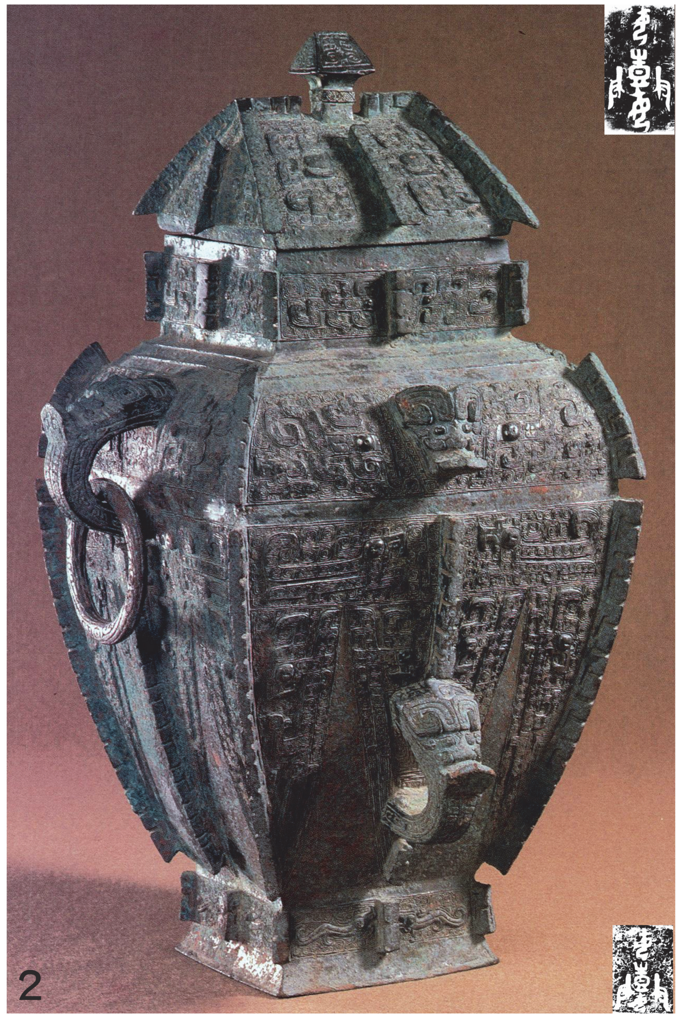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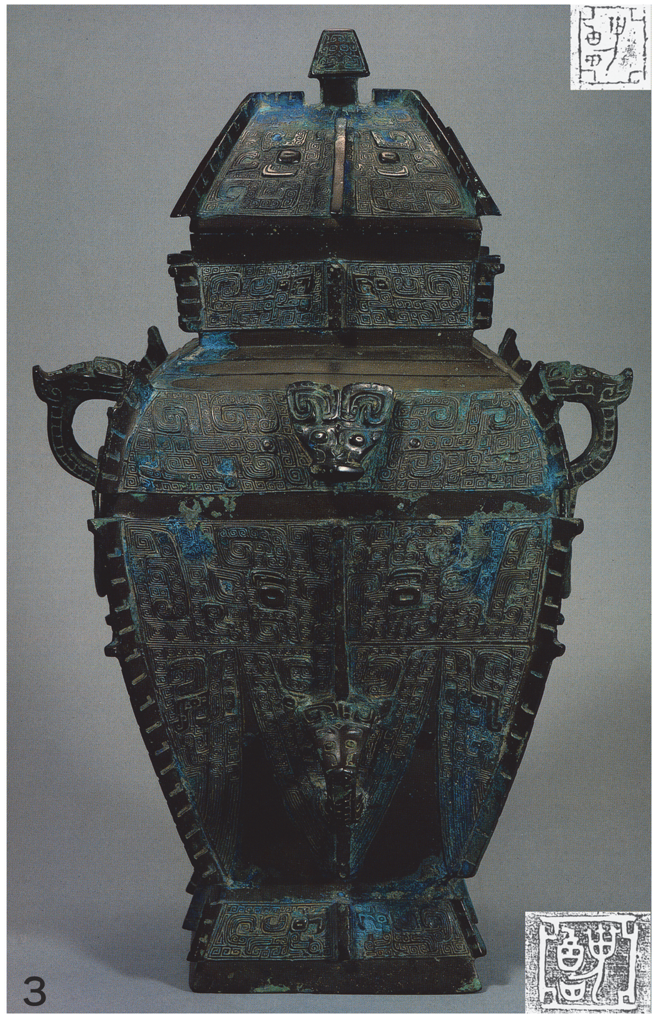

5


7




1


2


3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北宋・王黼等，《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明翻元至大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清・乾隆敕撰，《寧壽鑑古》，上海：商務印書館，1913。

清・梁詩正等編纂，《西清古鑑》，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清・端方，《陶齋吉金錄》，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正白旗滿洲端方石印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劉喜海，《長安獲古編》，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北京劉鐵雲補刊東武劉氏原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劉喜海藏，胡琨編，《長安獲古編》，民國三年（1914）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二・近人論著

丁岩、王占奎

2016　〈石鼓山商周墓地 M4 再識〉，《文物》2016 年 1 期：64-70。

大連現代博物館、山西博物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2009　《晉國雄風：山西出土兩周文物精華》，瀋陽：萬卷出版公司。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8　《殷墟新出土青銅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

1979　〈1969-1977 年殷墟西區墓葬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9 年 1 期：27-146，圖版 1-20。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

1985　《殷墟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8　《安陽殷墟郭家莊商代墓葬：1982 年～1992 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2005　《滕州前掌大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

2020　《安陽孝民屯（三）・殷商遺存・鑄銅遺物》，北京：文物出版社。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

1996　《中國青銅器全集 5・西周 1》，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7　《中國青銅器全集 6・西周 2》，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8　《中國青銅器全集 4・商 4》，北京：文物出版社。

井中偉

2010　〈殷墟王陵區早期盜掘坑的發生年代與背景〉，《考古》2010 年 2 期：78-90。

王世民

2001　〈犅伯卣〉，保利藝術博物館編，《保利藏金（續）》，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頁 128-135。

王占奎、丁岩

2014　〈石鼓山商周墓第 4 號墓初識〉，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寶雞市文物旅遊局、上海博物館，《周野鹿鳴：寶雞石鼓山西周貴族墓出土青銅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頁 13-19。

王占奎、丁岩、劉軍社、辛怡華、郝明科、王小梅

2016　〈陝西寶雞石鼓山商周墓地 M4 發掘簡報〉，《文物》2016 年 1 期：4-52。

王永剛等

2007　〈陝西甘泉縣出土晚商青銅器〉，《考古與文物》2007 年 3 期：11-22。

田率

2015　〈國家博物館新入藏的兩周青銅器管見〉，《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5 年 5 期：135-149。

石鼓山考古隊

2013　〈陝西寶雞石鼓山西周墓葬發掘簡報〉，《文物》2013 年 2 期：4-54。

朱鳳瀚

2018　〈亞貘卣〉，《璀璨青銅：德能堂藏吉金》，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頁 62-67。

江西省考古研究所、首都博物館編

2016　《五色炫曜：南昌漢代海昏侯考古成果》，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何毓靈

2014a　〈殷墟劉家莊北地青銅窖藏坑性質探析〉，《南方文物》2014 年 1 期：96-100。

2014b　〈殷墟王陵早期被盜年代研究〉，《考古》2014 年 6 期：92-100。

何毓靈、唐際根、岳占偉、牛世山

2012　〈河南安陽市殷墟劉家莊北地 2010～2011 年發掘簡報〉，《考古》2012 年 12 期：26-42。

呂章申主編

2014　《中國國家博物館百年收藏集粹》，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

李永迪

2015　〈安陽殷墟孝民屯出土青銅禁範〉，發表於美國芝加哥大學、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寶雞青銅器博物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合辦，「寶雞戴家灣、石鼓山與安陽出土青銅器及陶範」學術研討會，北京：美國芝加哥大學北京中心；寶雞：陝西省考古研究院，2015.11.30-12.04。

李永迪、岳占偉、劉煜

2007　〈從孝民屯東南地出土陶範談對殷墟青銅器的幾點新認識〉，《考古》2007 年 3 期：52-63。

李永迪等

2009　《殷墟出土器物選粹》，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李伯謙主編

2018a　《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10》，北京：龍門書局。

2018b　《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20》，北京：龍門書局。

李宏飛

2021　〈論商周之際的乳釘夔紋盆形簋——關中地區先周時期銅器群探索之三〉，《四川文物》2021 年 2 期：46-56。

李進增主編

2011　《晉國瑰寶：山西出土晉國文物精華錄》，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

李學勤

2000　《中國青銅器萃賞》，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

2001　〈犅伯卣考釋〉，保利藝術博物館編，《保利藏金（續）》，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頁 250-251。

李學勤主編

1985　《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青銅器（上）》，北京：文物出版社。

李學勤、艾蘭

1995　《歐洲所藏中國青銅器遺珠》，北京：文物出版社。

李龍俊

2018 〈陝西寶雞石鼓山墓地出土銅器仿制現象研究〉，《考古》2018 年 5 期：101-108。

狄跟飛等

2022 〈山西臨汾龐杜墓地 M1、M2 發掘報告〉，《文物季刊》2022 年 4 期：3-20。

金正耀

2014 〈商末至西周早期銅甗工藝的演變及其意義〉，陝西省考古研究院、上海博物館編，《兩周封國論衡：陝西韓城出土芮國文物暨周代封國考古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544-550。

周亞

2021 〈寶雞出土青銅禁的觀察與分析〉，氏著，《周亞吉金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270-279。

周艷明

2016 〈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墓出土的鳳鳥紋提梁卣及相關問題〉，《文博》2016 年 5 期：30-36。

屈萬里

1969 〈讀周書世俘篇〉，氏著，《書傭論學集》，臺北：臺灣開明書店，頁 412-432。

岳占偉、李永迪、申明清

2017 〈試論殷墟晚期青銅禮器的兩個發展方向〉，《江漢考古》2017 年 3 期：89-108。

岳占偉、岳洪彬、劉煜

2008 〈殷墟青銅器的鑄型分範技術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殷墟新出土青銅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頁 33-54。

河南出土商周青銅器編輯組編

1981 《河南出土商周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2022 《榮陽小胡村商周墓地》，北京：中華書局。

花原

1991 〈信陽出土商周青銅器銘文介紹〉，《中原文物》1991 年 2 期：94-104。

故宮博物院編

2010　《故宮青銅器圖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洛菲編輯

2016　《吉金御賞（五）：商邑翼翼——商代青銅器》，香港：御雅居。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

1983　〈1975-1979年洛陽北窯西周鑄銅遺址的發掘〉，《考古》1983年5期：430-441, 388。

1999　《洛陽北窯西周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孫明

2018　〈商周縱置提梁銅卣賞析〉，《收藏家》2018年1期：9-14。

孫秉君、蔡慶良合著，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震旦藝術博物館編

2007　《芮國金玉選粹——陝西韓城春秋寶藏》，西安：三秦出版社。

容庚

1936　《善齋彝器圖錄》，北平：燕京學社。

1941　《商周彝器通考》，劍橋：哈佛燕京學社。

海金樂、韓炳華

2006　《靈石旌介商墓》，北京：科學出版社。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

1979　《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寶雞市文物旅遊局、上海博物館

2014　《周野鹿鳴：寶雞石鼓山西周貴族墓出土青銅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

2008　《吉金鑄華章：寶雞眉縣楊家村單氏青銅器窖藏》，北京：文物出版社。

陝西省博物館編

2001　《三秦瑰寶：陝西新發現文物精華》，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

馬承源

2001　〈論𤞷伯卣〉，保利藝術博物館編，《保利藏金（續）》，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頁240-243。

高振龍等

2020　〈河南鶴壁辛村遺址2014年度西大坡西周墓地發掘簡報〉，《華夏考古》2020年3期：3-22。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

1985　《海外遺珍・銅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崎川隆

2017　〈關於西周時期飾有「上卷角獸面紋」的青銅器〉，《青銅器與金文》第 1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388-405。

張天恩主編

2016　《陝西金文集成・8》，西安：三秦出版社。

張昌平

2015　〈關於商周之際的長梁青銅器〉，《南方文物》2015 年 2 期：170-175。

張懋鎔

2002　《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北京：科學出版社。

2010　《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第 3 輯，北京：科學出版社。

張懋鎔等

2009　〈西周重食文化的新認識——從甘泉縣閻家溝新出青銅器談起〉，《考古與文物》2009 年 1 期：32-38。

曹瑋主編

2005　《周原出土青銅器》，成都：巴蜀書社。

2009　《陝北出土青銅器》第 2 卷，成都：巴蜀書社。

郭妍利

2009　〈斜方格乳釘紋簋類型及其相關問題〉，《中國歷史文物》2009 年 3 期：46-59。

郭沫若

1935　《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東京：文求堂書店。

陳小三

2011　〈韓城梁帶村 M27 出土卣、尊的年代辨析——附論扇形鉞與特殊的鳳鳥紋飾〉，《文博》2011 年 1 期：26-31。

2020　〈再談韓城梁帶村 M27 出土一組銅器的年代及相關問題〉，《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20 年 5 期：45-56。

陳佩芬

2004a　《夏商周青銅器研究・夏商篇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b　《夏商周青銅器研究・西周篇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陳芳妹

1985　《商周青銅粢盛器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1998　《故宮商代青銅禮器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陳昭容

2015　〈寶雞出土青銅禁及其相關問題〉，李宗焜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 4 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頁 291-336。

陳昭容主編

2015　《寶雞戴家灣與石鼓山出土商周青銅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陳夢家

1962　《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4　《西周銅器斷代》，北京：中華書局。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2013　〈湖北隨州葉家山 M28 發掘報告〉，《江漢考古》2013 年 4 期：3-57。

湖北省博物館

2012　《晉國寶藏：山西出土晉國文物特展》，北京：文物出版社。

馮峰

2019　〈論西周青銅器中的尊、方彝（尊、方彝、觥）組合——兼談其與尊、卣組合的關係〉，《三代考古（八）》，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281-307。

黃銘崇

2007　〈商人日干為生稱以及同干不婚的意義〉，《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8.4：705-754。

2012　〈「饕餮紋」的再思考：一個方法的省思〉，《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32：1-102。

2012-2013　〈從考古發現看西周墓葬的「分器」現象與西周時代禮器制度的類型與階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3.4：607-670；84.1：1-82。

2013　〈晚商王朝的族氏與族氏政治〉，《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東亞考古的新發現》，臺北：中央研究院，頁 1-94。

2021　〈最早的「天可汗」——季歷〉，歷史學柑仔店 https://kamatiam.org/最早的天可汗季歷/，2021.04.16。

黃銘崇主編

2016　《中國史新論・古代文明的形成分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廉海萍

2015　〈陝西寶雞石鼓山西周墓葬 M3「戶」組銅器製作地探討〉，發表於美國芝加哥大學、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寶雞青銅器博物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合辦，「寶雞戴家灣、石鼓山與安陽出土青銅器及陶範」學術研討會，北京：美國芝加哥大學北京中心；寶雞：陝西省考古研究院，2015.11.30-12.04。

董作賓

1977 〈王孫舌考〉，《董作賓先生全集》，臺北：藝文印書館，頁1177-1185。

裘錫圭

2001 〈犅伯卣的形制和銘文〉，保利藝術博物館編，《保利藏金（續）》，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頁 244-249。

賈連敏等

2015 〈河南滎陽小胡村墓地商代墓葬發掘簡報〉，《華夏考古》2015 年 1 期：3-13, 25。

鄒衡

1980 〈論先周文化〉，氏著，《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297-356。

劉雨、汪濤

2007 《流散歐美殷周有銘青銅器集錄》，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歐潭生

1989 〈河南信陽縣溮河港出土西周早期銅器群〉，《考古》1989 年 1 期：10-19。

盧一等

2024 〈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出土漆器整理與研究〉，《江漢考古》2024 年 1 期：50-59。

盧連成、胡智深

1988 《寶雞弜國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

韓炳華

2020 〈息父乙冊簋及相關問題〉，《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 年 2 期：68-73。

蘇榮譽

2015 〈論西周初年的牛首飾青銅四耳簋〉，陳昭容主編，《寶雞戴家灣與石鼓山出土商周青銅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頁 513-523。

出光美術館編

1989a 《中國の工藝：出光美術館藏品圖錄》，東京：平凡社。

1989b 《中國古代の美術》，東京：平凡社。

白川靜監修，中村純一編集

1978 《白鶴英華》，神戶：白鶴美術館。

杉村勇造

1966　《中國古銅器》，東京：出光美術館。

奈良國立博物館編集

2002　《阪本コレクション中國古代青銅器》，奈良：奈良國立博物館。

2005　《奈良國立博物館藏品圖版目錄・中國古代青銅器篇》，奈良：奈良國立博物館。

松丸道雄

1977　〈殷周銅器と陳夢家氏の研究〉，陳夢家編，松丸道雄改編，《殷周青銅器分類圖錄》，東京：汲古書院，頁 1-14。

林巳奈夫

1984a　《殷周時代青銅器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

1984b　《殷周時代青銅器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一・圖版》，東京：吉川弘文館。

武者章

1989　〈先周青銅器試探〉，《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09：155-184。

泉屋博古館編集

2002　《泉屋博古・中國古銅器編》，京都：泉屋博古館。

泉屋博古館等

2012　《青銅器の內部を探る——X 線 CT スキヤナによる中國古代青銅器の構造技法解析》，京都：泉屋博古館。中譯本見《泉屋透賞：泉屋博古館青銅器透射掃描解析》，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

根津美術館編

1986　《龍虎の世界》，東京：根津美術館。

2001　《根津美術館藏品選・工藝篇》，東京：根津美術館。

梅原末治

1933　《杦禁の考古學的考察》，京都：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

1940　《河南安陽遺寶》，京都：小林寫真製版印刷所。

1959a　《日本蒐儲支那古銅精華・一》，大阪：山中商會。

1959b　《日本蒐儲支那古銅精華・二》，大阪：山中商會。

陳夢家編，松丸道雄改編

1977　《殷周青銅器分類圖錄》，東京：汲古書院。

樋口隆康監修，飯島武次編集

1998　《故宮博物院・第十二卷・青銅器》，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

難波純子（內田純子）

2004　《中國王朝の粹》，姬路：北星社。

Ackerman, Phyllis

1945 *Ritual Bronzes of Ancient China*. New York: The Dryden Press.

Bagley, Robert W.

1980 "Vessels of the Early Western Zhou Period." In *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An Exhibition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ited by Fong Wen.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pp. 200-202.

1987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utz, Herbert

1993 *Frühe chinesische Bronzen aus der Sammlung Klingenberg*. Berlin: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Ch'en Fang-mei（陳芳妹）and Mette Siggestedt（石美德）

2009 "The Collection of Shang Period Bronzes in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a Catalogu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77: 75-230.

Eskenazi, Daniel M.

2005 *Eskenazi: Ancient Chinese Bronzes and Sculpture*. London: Eskenazi.

Kane, Virginia C.

1974-1975 "The Independent Bronze Industries in the South of China Contemporary with the Shang and Western Chou Dynasties." *Archives of Asian Art* 28: 77-107.

Loehr, Max

1968 *Ritual Vessels of Bronze Age China*. New York: Asia House Gallery.

Pope, John Alexander et al.

1967 *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 Vol. 1 Catalogue*.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ublication.

Rawson, Jessica

1987 *Chinese Bronzes: Art and Ritual*.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0 *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sao, Huei-Chung, ed.

2013 *Trésors de la Chine ancienne: bronzes rituels de la collection Meiyintang*. Paris: Musee Guimet.

Wang, Tao（汪濤）

2009 *Chinese Bronzes from the Meiyintang Collection*. London: Paradou Writing.

三・網路資訊

清・曹載奎
《懷米山房吉金圖》拓本，「史語所數位典藏資料庫整合系統——青銅器拓片資料庫」https://ihparchive.ihp.sinica.edu.tw/ihpkmc/ihpkm_op?!!NO^4441303030303037343238，瀏覽 2024.07.05。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
https://bronze.asdc.sinica.edu.tw/qry_bronze.php。

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Cleveland Museun of Art）
https://www.clevelandart.org/。

明尼亞波里斯藝術博物館（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
https://new.artsmia.org/。

哈佛藝術博物館（Harvard art Museums）
https://harvardartmuseums.org/。

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https://www.metmuseum.org/。

國立國會圖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
https://dl.ndl.go.jp/en/pid/1919976/1/17。

國家亞洲藝術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Asian Art）
https://asia.si.edu/。

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Princeton University Art Museum）
https://artmuseum.princeton.edu/。

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Asian Art Museum）
https://asianart.org/。

Bronze Vessels in Relation to Vertical Ribs and Phoenix Bird Motifs of the Late Sha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nqi* (Divided up Booty)

Ming-chorng Hwa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e present article is a follow-up study based on the author's previous argument (2012, 2013) on the phenomenon of *fenqi* 分器 (divided up booty) regarding early Western Zhou bronze vessels. It aims to inf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te Shang bronze artifacts by examining bronze vessels excavated from early Western Zhou tombs in the Guanzhong region.

First, the author focuses on three currently known *jin* 禁 (altar) sets and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study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chuji jin* 出戟禁 (protruding *ji* halberd altar) set. The study then examines the *you* 卣 vessel with vertical ribs and phoenix bird motifs on top of the altar and all other vessels, not just limited to *you*, with the same motifs from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nd museum collections, including the *zhi* 觶 with vertical ribs and phoenix birds, the four-handled *gui* 簋 with *ruding* 乳釘 (boss) motif, the *ding* 鼎 with vertical ribs and handles, the *zun* 尊 and *you* with vertical ribs and birds, the *fu* 簠 with vertical ribs, and vessels with pointed-feather phoenix birds. It is argued that most of these vessel forms are artifacts from the late Shang period and that the use of vertical ribs and phoenix bird motifs was a method to create the monumentality of bronze vessels during this period.

Several pieces of evidence are expounded in this article to demonstrate that most of these vessels are from the late Shang dynasty: (1) among the same types of vessels, which can be categorized as passed down (namely being in museum collections) or excavated, the latter has been primarily found in different forms of *fenqi* tombs; (2) the inscriptions on these vessels contain elements associated with the names of Shang nobility, such as clan signs and kinship terms, as well as using day stems; (3) these vessel types first appeared in Phase III or IV of the Yin period; (4) molds or models have been discovered at the bronze workshop in Xiaomintun, Anyang; (5) scientific analyses of the core soil from key vessels reveals that its chemical composition falls within the "Anyang block," indicating them to be the product of Anyang; (6) the sudden end in the evolution of these flamboyant vessels and ornate motifs suggests a definitive end to their style by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turmoil or change of government policy. These phenomena in summation indicate that despite being excavated from early Western Zhou tombs, some of these vessels were actually produced in the late Yin period at the Shang workshops in Anyang. The concept of *fenqi* then explains how they were distributed to the Guanzhong region. The vessel types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characterized by the vertical ribs and phoenix bird motifs, mostly belong to a “flamboyant” style, but others brought to the region can be regarded as more “conservative” in style. Nonetheless,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motifs, along with other decorative elements and vessel forms such as protruding edges and certain handles, constitutes the formula for creating the monumentality of bronzes in the late Shang.

Finally, when examining the square ritual *yi* 彝 wine vessel with pointed-feather phoenix bird motif,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yi* not only forms an altar set with the large and small *you*, but also creates another combination with the *gong* 觥 and *zun* vessels. Notably, the set of *zun* with large and small *you* had originated in the Shang and continued into the early Western Zhou period. These examples demonstrate that during the late Shang dynasty, there was a gradual shift in ritual practices from dynamic drinking ceremonies to static sacrifices and displays, marking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in bronze vessel sets as the Shang drew to a close.

Keywords: *fenqi* (divided up booty); *jin* (altar) set; vertical ribs motif; phoenix bird motif; late Shang dynasty